

第四章

你敢“造谣”！

1964年，当局打造的“庄园故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推动下，开始轰轰烈烈推向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庄园参观，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可是，在庄园附近，居住有不少认识刘文彩、了解真相的居民。当局非常担心有人向参观者说出真相，于是，从1964年秋起，一场专项镇压和驱赶行动在庄园附近展开（该行动姑且称作“纯洁庄园周边阶级队伍行动”）。

“行动”先以抓人、打人、批斗、判刑为前锋，制造恐怖气氛，接着下达驱逐令，驱逐庄园周边一些当局不放心的农民。该令规定：没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等，而且工作必须当天完成！

人们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感受过“水牢”、“地牢”的恐怖，但是，他们要遭受当局怕他们说出真相而施加的恐怖。

这些被驱逐者们都被定为“坏人”，在发配地他们被歧视、挨整、克扣口粮等等。

此外，对凡是敢讲真话的人，不管是“深受迫害”的长工，还是“阶级兄弟”的贫农，中共当局一律加以“造谣”的罪名，并以铁腕镇压。



《收租院》第四部分：算账

该“行动”首先在刘文彩的近邻和亲友中展开，因为这些人最了解情况。

首当其冲的人叫刘福田。刘福田曾是抗战老兵，1937年出川抗日，抗战整整八年。后来他又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1949年随刘文辉部队起义。因他家没有田产，土改划成份时定为贫农。鉴于刘福田与刘家的关系，当局认为他最有可能说真话，便决定拿他开刀。1964年9月，刘福田被抓起来，罪名是刘文辉的“伪军官”。他先是遭到一阵暴打，然后被绑到各种会上去批斗，最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1964年10月1日，本地开大会，刘福田被当众宣布逮捕，判无期徒刑。

一个起义军官的遭遇

讲述人：刘福田

1913年生



我最初在刘湘部队里当兵，跟着他出川去打过日本人，还随国军解放了香港，抗战后回到家乡。1949年时我是24军刘文辉手下的一个连长，当年随刘文辉起义，投奔了共产党。

我是本地人，对刘文辉、刘文彩很熟悉，他们怎么一步步走出来的我十分清楚，他们的为人我当然也相当了解。

也许是太了解了，他们对我不放心。1964年他们找个理由，说我是刘文辉的伪军官，把我抓进了监狱。

那时的政策是：凡是国民党部队里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是反革命。但我是起义的军官，不应当算是反革命。可是他们不由分说，硬说我是伪军官，是反革命。

他们把我捆起来，到各种会上去批斗，然后宣布逮捕法办。

把我抓走后，我的家人也被从民安队赶走。我大儿子刘德均已经与我分家，他妻子马上就要生产（生小孩）了。因安置地连床都没有，他们哀求宽限了几天。生了孩子不到十天，他们就被赶出了家门。

我入狱后，我老婆拖着另外三个孩子，生活很艰难，刚满三岁的小儿子只

得送给了人家。

1979年后，平反冤假错案，他们觉得对我量刑过重（无期徒刑），于是把我放了，这时我已经劳改了十五年。

量刑过重不等于没有罪，现在都没给我平反。不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军区发给我一张起义证书，民政局据此每月发给我几百元的津贴。原因嘛，是因为我曾经是起义军官。

采访时间：2008年6月8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五星村

采访后记

从汶川地震灾区采访完后，我匆匆赶到安仁镇，听说刘福田已经95岁高龄，便立马赶去，路上，真担心他已经老得无法接受采访。

没料到 he 虽然耳朵有些聋，但视力仍佳，身体仍健，每天，还能骑着电动三轮摩托在乡间的路上穿来穿去。他说，当年整他的那些人，一个个都先他而去了，而他还健健康康地活着，每月，还在领取几百元生活费，享受“起义军官”的待遇。

只是，他和他的家人，从1964年起，再也没能回到他们以前的家园。



95岁的刘福田骑着三轮摩托

说真话就是造谣

讲述人：刘世柄

1936年生



陈列馆（即庄园）所在的民安大队有三个生产队，民安一队、民安二队和民安三队。我家以前就在紧靠陈列馆的民安一队。我们全家解放前有30多亩田，土改时根据人口和田地划成分，我爸爸划成地主，他根据排行叫刘元明（音）。我爸这个人，人缘很好，又是个小地主，所以，土改时没受多少苦。我只记得有一次把他和其他地主们捆到文彩中学的操场上去斗。武装队的队长刘光原（音）来捆我爸，他对我爸说，你不要怕，今天主要是要扫你们的脸（即让你们出丑）。他说了这话我爸爸就不害怕，他后来给我讲，他旁边那些地主，吓得惨，以为要杀头。

我爸爸死于1960年，是饿死的。当时一半的人都饿死了，我们生产队死得只剩下七八十个人，这个事哪个都晓得。

陈列馆搞起来后，很多人来参观，有些参观的人就要问附近的农民关于刘文彩的事，比如说水牢呀等等。我的亲叔伯哥哥刘世润是民安的党支部书记，他的老汉（爸爸）有一天坐在陈列馆外面耍，参观的人从陈列馆出来，看到老人，就问他：“你们原来这儿做了水牢没有？”老人说：“啥子水牢哟，那个地方原来就比较高，是专门用来藏贵重东西的。”

就为这句话，刘世润立马被叫到公社去挨批评，并且警告他，不准他老汉再造谣。刘世润为这事气得在屋里睡了几天。

1964年，陈列馆周围，也就是民安一、二、三队，所有戴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帽子的人统统被赶走，说是为了防止这些人说坏话、唱反调。所谓的“唱反调”就是害怕你说出刘文彩的真相。

我不是地主，但是我是地主子女，成分高，也要收我房子，强迫我外迁。我那时结婚不久，老婆刚生了娃娃，才四个月。我不走，他们就在我家的门上封上封皮（封条），我还是不干，把封皮给它撕来甩了，就不走。

很快有人给我报信，说公社党委书记孟富清（音）把一支手枪交给郑泽安（音），要他打上门来收拾我。郑泽安没文化，是个粗头粗脑的人，解放后当了武装队的队员。我得到这个消息，晓得大事不好，当即就弃家外逃，逃到外县去了。

他们打上门来，没找到我，于是强迫我爱人廖秀芳走。

廖秀芳：他们把挑筐上的棕绳抽下来，打算把我捆走，但是我娃娃不好办，于是就没捆。他们把娃娃背在我背上，用了条被子围起。我娃娃又哭又吐，在路过桫木河大桥时，我气不过，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那时人多，他们把我拉住了。

刘世柄：后来我回来，已经回不了原来的家了。妈妈、妹妹都被赶走了。我也只得走了。在那个驱逐地，住的茅棚连门都没有，我便回去在自己家中下了一扇门来挡风雨，为这事他们又扣了我四百斤谷子。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 点：安仁镇川湘路



残酷的剥削压迫，使得老人折断腰，儿孙筋骨瘦。这位老大爷背的何止是租谷，这是旧社会压在我们劳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当局宣传品配图文字）

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

收租院泥塑群象

人民美术出版社

对当年当局的这一驱赶行动，多年来一直在安仁镇调查的刘小飞作了大量的走访，下面是他记下的一些有名有姓的受害者：

廖素瑶：

被驱逐者中有一个叫廖素瑶的50余岁的寡妇，她丈夫死于1958年的大跃进。因她30几岁才嫁人，所以在被驱赶时两个女儿只有15岁和17岁。

母女三人被赶到十里外的新河，途中要踩过一段水路。15岁的小女儿刘世伦踩水时不慎扑到水里，那时她正来月经，到了新河就病了。那里条件恶劣，一个月后刘世伦死在了新河。死后廖素瑶把小女抬回庄园边的墓地安埋。当局说廖素瑶把女儿埋回家乡是向共产党示威，立即派民兵把廖素瑶抓来批斗。



廖素瑶唯一活下来的女儿刘世勋

陈履章：

陈履章是一个外来户，当过民办教师，其妻刘世英出身贫农，他们也被驱逐。这家人走得最晚，是当年阴历10月23日才被扫地出门的。走时儿子陈贵伟未满三岁。小贵伟原本长得很胖，邻居都叫他小法海。驱赶时他受到惊吓，到了新的地方，恶劣的环境增加了他的恐惧，没几天他就病了。当时全家一贫如洗，直到孩子病重了才借了10元钱到县医院去。医生说要住院，需要60多元，陈履章夫妇只得又把孩子抱回来。小贵伟在腊月28那天去世。死前他一直哭喊：“我要回去！”



残废了的刘世英

王玉清、刘元富：

长年在老公馆居住过的刘文彩亲人中，当时活着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五

姨太王玉清，一个就是刘元富。他们两人是庄园的活见证。当局怕他两人说出实情，也要把他们赶走。刘元富先被抓起来游街批斗，然后把他押到“不明真相”的乡下去监督劳动。

对王玉清也采取了相同的手法。

王玉清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展览馆布置出来后，她公开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对当局宣传“阶级斗争”很不利。于是，他们赶紧临时编了一个“王玉清用鸭蹼调人奶吃”的故事栽在她头上。故事编出后，当局便以此



王玉清

为理由，同对刘元富一样，把她押到乡下——也是“不明真相”的乡下——去监督劳动。王玉清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回到她的家乡安仁镇。

（注：以“专吃鸭脚中间那一点‘蹼肉’”以展示地主阶级骄奢淫逸的故事在当年广为流传，笔者从小就受到这个故事的教育，印象极深。）

刘元金和刘世海：

在刘文彩与刘文辉两个公馆之间，住了一家人，这家人是刘文彩父亲刘恭占的二哥刘恭敬的后人。刘恭敬就是刘湘的爷爷。这家的主人叫刘文礼，是刘湘的么爸。

土改时刘文礼已经病入膏肓，躺在床上眼睛都睁不开。他妻子是个小脚女人，当时身体也很差，因此两人都无法出去做义工——即罚地主做苦工。于是，他们就把他小儿子刘元金抓去顶替。刘元金当时只有15岁多，是文彩中学的学生，按共产党的政策他还不够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政策规定要满18岁）。由于他父母不能去做苦工，就把他作为地主对待，一开斗争会，就把他五花大绑起来四处去批斗。

到了1964年，刘文彩的故事要向全国推出，在“净化”庄园周边环境的行动中，他们把刘元金捆到大邑县关押起来，审了几个月，实在找不到他任何过错，干脆给他戴个“坏分子”的帽子，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

刘文礼有个孙子叫刘世海（1935年生），是文彩中学高中毕业的学生，他比较活跃，也就是说比较喜欢说话，而且外语很好。此事让当局知道了，他们非常担心他用外语向老外讲出真相，于是把他抓走关进了高山劳教农场。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中国的政治发生了变化，他才被放出来。但是，出来

时他已经疯了，每天在街上到处走，四处嚷嚷。

当局怕他“乱说”。于是，一天夜里，一辆公安系统的巡逻车把他拉走了。从此，刘世海在安仁镇消失了。

几十年过去了，刘世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刘子君夫妇

民安三队的贫农刘子君夫妇和他们12岁的大女儿也在去后不久饿死在八管区。8岁的小女儿刘淑芳侥幸活了下来。民安一队的贫农刘月如不久也饿死在那里。



刘子君之女刘淑芳

刘直君夫妇：

民安一队的贫农刘直君夫妇被驱赶后不久就双双饿死在八管区。死时两个儿子还小，由他人领养，一个去了温江养鱼塘，一个去了崇州中和场。

刘体忠：

民安一队的刘体忠是个起义人员，发配到八管区三个月就饿死在那里。他死后家里更艰难，年仅10岁的小女刘世英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弄了一根生产队的甘蔗吃，被生产队长打死。



邓秀芳

发配到八管区的人家至少有十余户，除上面提到的死者，还有刘用箴和刘福田怀抱里的一对双胞胎。

被驱逐者中有一人叫刘德均，此时他的新婚妻子邓秀芳马上就要生产了，因发配地床都没有，他们哀求宽限几天。阴历九月二十五日，极度惊恐紧张的邓秀芳产下了孩子，接着上面就来催逼，生产不到十天的产妇就被赶出了自己的家。

在此次“行动”中，打手们还威胁说要大开杀戒，于是，有些人吓得远走他乡，如陈建中和刘世伟等。

1965年，为创作《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乡下去“访贫问苦”。

在安仁附近的虹桥村，他们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不料，吕忠普却说了相反的话。艺术家们败兴而去，转而找到吕忠普对面的谷能山家，他也是刘文彩的长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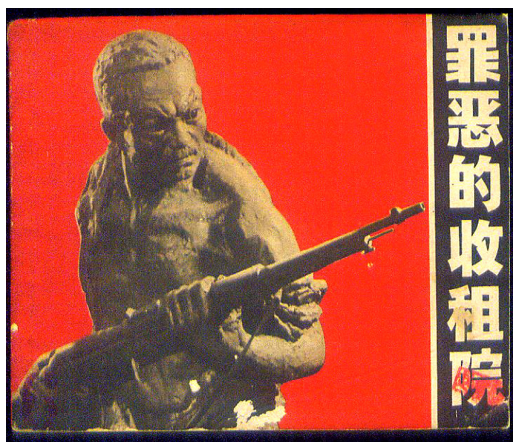
谷能山身躯魁梧，目光炯然，充满阳刚之气。川美的艺术家们一下子来了兴致，立刻围着他画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

在这之前，四川美院所在的重庆市已经推出了一本发行量达几百万册的小说《红岩》。《红岩》里面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江姐——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收租院》作品中会不会产生一个江姐式的泥塑英雄形象呢？据说，当局已经设计好了一套刘文彩的酷刑，如果谷能山来充当酷刑下宁死不屈的好汉，将产生很大的震撼力和煽动性。于是，艺术家们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启发他，给他作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当局看到谷能山的房子十分破败，就许愿给他一座好房子和其他许多好处，但要他加入“家史讲演组”，述说刘文彩如何迫害他、对他施以酷刑，而他又如何带领长工反抗刘文彩的剥削压迫等等。可惜，谷能山不仅坚决拒绝，反而大谈刘文彩的好。

这样，原本准备塑造成英雄角色的谷能山变成了刘文彩的帮凶——在《收租院》中被塑造成了帮刘文彩收租的“风风匠”。《收租院》解说词说：“在这个院子里就放着6台风谷机，并有专门的‘风风匠’来摇，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拼命地摇啊，摇啊，真是摇得佃户浑身发冷，摇得佃户发抖……”（见《轰天绝唱收租院》第299页）。

至于谷能山本人，则被民兵抓走，关押在“文彩中学”达半年之久……

如今，谷能山已经去世，2013年1月，我在谷能山乡下的院坝里和安仁镇刘文彩的庄园里，采访了谷能山的儿子谷金成和孙子谷永良。



重庆的作家、艺术家们，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年代，为“政治”贡献了两部惊天动地的作品。

不要编白话（谎话）说

讲述人：谷金成

66岁



我爸给刘文彩当长工，干了十多年，给刘文彩抬滑竿。他个子高大，性子很直，也很刚烈。当年来采访他，他实事求是地说，当初（在刘文彩家）是吃的饱饭。来的人说，刘文彩咋个咋个的。他就说，是咋个的就是咋个的，莫得这回事，不要编白话（谎话）说。来的人同他话说得不对，（双方）就顶起来。要打拚的话我爸凶得很，他力量大，体格又好，比我儿子还高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公社把他弄去学习一两个月，说他帮刘文彩，是刘文彩的狗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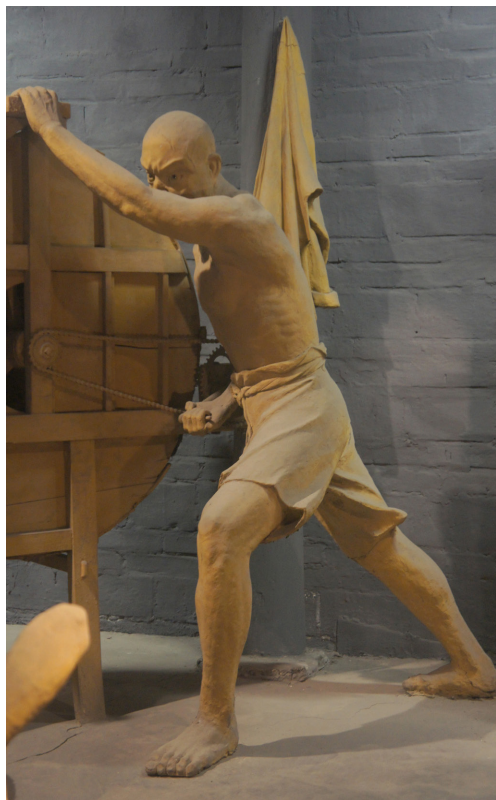
采访后记

66岁的谷金成已经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前来采访，他所经历的也较丰富，在他的采访中，感觉到：一，他已经很不愿意再讲这事；二，在他不多的语言中，他十分谨慎。

他儿子仿佛也有这种顾忌。

不肯配合当局宣传的刘文彩长工谷能山在《收租院》中被塑造成了刘文彩的帮凶。

“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拼命地摇啊，摇啊，真是摇得佃户浑身发冷……”《收租院》解说词。



“你就是拉我去枪毙， 我也说他好”

讲述人：谷永良



我今年38岁，爷爷去世时我20多岁了。（19）65年抓他时我还没有出生，但80年代他们来我家时我就知道了。他们来了好幾次。好像是中央那儿来的记者，一个在这儿问，一个就在照像。他们叫我爷爷说刘家对他不好。他不說。他们一年来两次，两三年间，共来了三、四次，我爷爷一直不说，他们就没有再来了。

我爷爷给我说，六几年（65年）来抓他，来了二三十个人，背着枪。为啥来这么多人？因为我爷爷身体很强壮，三、五个人近不了他身。他们叫他说，刘文彩咋个剥削他们，爷爷说：“你就是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好。”这下把他们惹冒火了，第二天就把他抓走了。把他抓去关了半年。就关在文彩中学里。我爷爷在苏场街上有两间铺面，被他们没收了，至今没有还给我们。



2013年1月，谷氏父子在庄园里默默注视着《收租院》里“谷能山”的塑像。

谷能山被抓后，同样不肯配合当局的长工吕忠普见事不对，吓得连夜步行几十公里，躲到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去了（他有个儿子在那里）。我在乡下吕忠普家外的小路边遇到了吕忠普的儿子吕洪林。

吓得连夜离家逃走

讲述人：吕洪林

49岁



我爸爸当年在刘文彩家做饭，他不仅饭菜做得好，而且为人十分实在，他在庄园里进进出出，从来不乱动刘家的一针一线，更不用说贵重钱物了。他曾说，他能接触到刘家的金银，但他从来不动一丁点坏念头。他教育我们，不是自己的东西莫要，不是事实的话不要乱说。他自己一辈子都是清清白白做人。但是，他胆子比较小，有些怕事，不像谷能山敢说敢打。因此，他看到谷能山说真话被抓走，吓得连夜离家逃走了。



当年给来安仁参观的人作忆苦思甜报告的诉苦“明星”中，除了冷月英、罗二娘外，还有一个王大妈（本名禹淑华），她同罗二娘一样，控诉的是刘文彩强迫挤她的奶吃。笔者到安仁采访时，王大妈已经去世，下面是同王大妈熟识的安仁个体饭馆老板刘明忠的讲述。

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讲述人：刘明忠

安仁镇个体饭馆老板，52岁



我在安仁街上开饭馆，同王大妈很熟习，王大妈长得白白净净的，就是这条街上的人。

当年外面来人参观，特别是有记者、学生来，总是找那几个女人去诉苦，一个是冷妈妈，一个是罗二娘，还有一个就是王大妈。

王大妈诉苦时说，当年刘文彩强迫挤她的奶吃，又不给钱，剥削她、压迫她。

但是，一些老人们给我讲，刘文彩这个人很对，去交租，都请吃饭，大人小娃都可以去吃。交不起租子，他一挥手，免了！穷人过年吃不起饭的，他还叫人拿给他几斗米、几块腊肉过年。

王大妈来饭馆吃饭，我当面问她：“你去讲阶级教育课，说刘文彩怎样坏，你真正是哪个看的？”她亲口给我讲，她说的全部是假话。她还说，我也是没得办法，要讨碗饭吃，如果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她还对我说，冷月英说她生了小孩后几天被刘文彩拉到他家去坐水牢，这可不可能？

我们当地风俗，生了孩子正在坐月的月母子是绝对不能迈入别人家门的（否则这家人就要倒霉），在封建社会，就是一般人家对此都要忌讳。刘文彩同她（冷月英）有多大的矛盾，要把一个刚生了小孩的月母子拉进家门？在提到她本人讲给刘文彩喂奶的事时王大妈说：刘文彩那么大的家产，不可能来剥削你的

奶吃？但是当时必须要这样讲。如果不这样讲，她也要被戴尖尖帽，挨批斗。她还说，每次她们讲了（忆苦思甜）课之后，政府就请她们去吃顿饭。

龟儿子（骂人的话）编些谎言！完全是栽诬（诬陷）人的，王大妈自己就说她是栽诬刘文彩的。

我还晓得一件事。有一次有记者来参观庄园，上面叫刘元树（音）的妈去上阶级教育课，刘元树当时是队长（他现在还在），他对他妈说：“你千万不要说刘文彩对（好）哟，你要按上面的要求说，你要是说了真话我就要下台，乌纱帽要被整脱。”他一再要他妈按当局的要求说假话。

当年你只要说了真话，说刘文彩好，就要整你，把你打成“地富反坏右”，要拿个尖尖帽子（高帽子）给你戴起，让你跪瓦渣子，所以，当时那些人，一个个都不敢说真话。

王大妈本人就亲口对我说，她不敢说真话。

采访时间：2010年7月25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这个孩子眼看这么多好谷被吹出来，脱下衣服想包一点回家，狗腿子一看，举起弹簧钢鞭就打。老大爷忍不住气愤，捧着吹出来的谷子向前质问：“这吹出来的都是好谷子，你们为什么说不能顶租？为什么又不让我们拿走？！”

这些年幼的孩子永远也忘不了这世世代代的苦，祖祖辈辈的仇！
（当局宣传品配图文字）

泥塑《收租院》大获成功后，庄园里又出现了“泥塑雇工院”；继“泥塑雇工院”之后，另一些“著名画家”又推出了“雇工生活组画”。

雇工院解说词说：“‘雇工生活组画’，与隔壁原仓房创作的‘泥塑雇工院’构成有机组合，意在形象化地展现当年庄园雇工们凄苦的生活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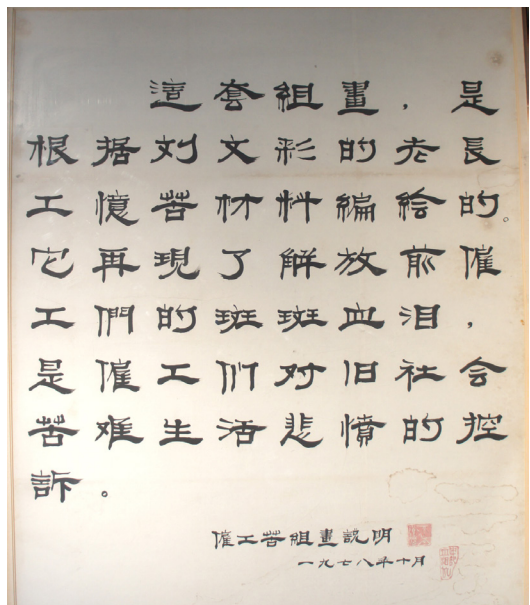
“泥塑雇工院”由顶债愤、牛娃苦、猪肥人瘦、心事重重、夺奶、苦妹、繁役、晚年难熬、灯尽油干等九尊雕像组成；组画由顶租、卖身、人牛、繁役、夺奶、牛娃、苦妹、雇工苦、逐恨等十幅构成。



泥塑雇工院之一：夺奶

当局与罗二娘联手“创作”的喂奶故事，给艺术家、文学家们带来了无尽的创作灵感。

雇工生活组画之一：夺奶



第五章

“解放后”的日子

在安仁镇的街镇和乡间，我的确听到了大量的悲苦讲述，只是这些悲苦不是发生在刘文彩年代。

不过，他们讲述时，我眼前老是出现《收租院》泥塑中那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残酷的剥削压迫，使得老人折断腰。
(当局宣传品配图文字)

我这辈子最苦的日子

讲述人：杨开玉（1926年生）

刘甫亭（1957年生）



杨开玉：我是解放前从唐场嫁过来的。冷月英也是唐场的人，在唐场徐桥，但我不认得她，只晓得她说白话（谎话）。

我老公刘国元是安仁土生土长的人，我们原来住在安仁镇民安三队，距老公馆只有150米。我亲眼见到，每到过年，刘文彩把花馍馍、粽子，推出来一户一户地散发。你要是没得吃的，去找他，他都要给。我老公是穷人，解放后我和他评的成分都是贫农，但是，我解放前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吃得饱。

我这辈子最苦的日子就是公社化后那几年，为啥苦？一天到晚做活路，又没得吃的。1959年最惨。当时我家8口人，3个大人，5个娃娃。我的娃娃全部是挨饿长大的。最先饿死的是我的婆妈。后来是我老公。

1959年，他给政府写上诉书，说：“娃儿饿得惊叫唤，大人饿得打偏偏（倒倒）……”就这样，给他定个罪，反革命分子，把他抓去劳改，抓进去没多久他就死在监牢里了。他死时才30岁，我连他的尸体都没见到，没给我们，给我也没办法抬回来，人饿得走路打偏偏。

那时，周围饿死人多，主要是娃娃，当然也有大人，刘青山（音）家里饿死的几个都是大人。

娃娃上学，没得钱，申请免学费，生产队干部说：“她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免啥子学费？”他们不给我写条子，我老大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没再读了，读不起。

直到改革开放后，平反冤假错案，才给我老公平了反。

刘甫亭（杨开玉之子）：我是1957年生的，1959年我才2岁，爸爸死时我还小，对他没得印象。平反时，是（19）84年还是85年？就给了一张纸，给我二哥的，我看都没看到。二哥想到一家人被整得这么惨，平反就一张纸条，气得当场就把纸撕了。按理说我们应当去找他们（评理），我爸应当获得（国家）赔偿。但我们是平民百姓，没得后台，没得人撑腰，说不起话。

杨开玉：老公抓走后，从此我一个人拖5个娃儿，最大的10岁，最小的才2岁。娃娃多，我做工分做不够，又没得人来照顾我。哪个敢来照顾？我是反革命分子家属。那些干部说：“反革命分子的娃儿，饿死算球了！”——不过，当年那些骂我的干部现在都死了，我还活着。

那时，我全家一天只有半斤米，生活全靠菜叶子。可是，后来又不准自己种菜，我们只得天天去挖野菜。我这几个娃娃，都是吃糠咽菜长大的。我在生产队做工分时评的十分，我样样都干：担挑、栽秧、割谷……我只有拼命干，因为娃娃多。但是，我一个人做不起全家的工分，因此每年都欠生产队的钱，分点谷子不拿给你。我去帮人洗衣服，挣点钱。

刘甫亭：人民公社时，十个工分可以是三、四角钱，也可以是几分钱。当时，一天七、八分钱是普遍的。

杨开玉：老公死时我也才30岁，后来好多人给我介绍，我不干，我说我这辈子不再嫁人。从此我守寡到现在。

“但是有开水喝”

问：你们那些年交公粮情况怎样？

刘甫亭：公粮交得多哟！一年一个人交完公粮只剩得下一挑谷子。一挑谷子150斤，100斤谷子打得到70-75斤米，一挑谷子最多打得到120斤米。税费也多：教育费（一个人20元）、办公费（是给大队干部的）、广播费、生猪屠宰税、还有林木费（竹子、树子）……这些税费一交家里就没什么搞头了。那时种田没得搞头。

杨开玉：解放前交租没得后来（解放后）交得多。那时（解放前），田里谷子打起来，湿的就交了。

刘甫亭：我也听老人们说，那时田的谷子湿的就交了。解放后我亲自多次交过公粮，唉呀，整得惨！交公粮过场多！晒、风、筛……谷子要干到八成，咬起来不起粉粉才达得到“晒”的标准；风，是要把所有杂质全部吹掉；吹了之后还要筛，所谓“筛”，就是要没得小的，小一点的全部筛漏掉。这几个关一过，水分干了、壳壳吹了、小的漏了，100斤谷子



杨开玉和刘甫亭

大概就只有60斤了。

杨开玉：刘文彩就不，没有要干、要筛。谷子从田里拿去，风吹一下就行了，没有后面（解放后）这么严。

刘甫亭：交谷子还好点，最痛苦的是交米。土地刚刚下放那几年，政府要求交米。为什么改为交米，因为国家想减少费用，谷子要打（成米）要费钱费人工，糠也不好处理，碎米子也不好办，因此要我们交米。米全部要饱满的，打碎了的半截米用筛子给你漏下来。100斤米往往只交得脱60到70斤。还有，米中有黄的、青乎乎的也不要，所谓“青乎乎”就是谷子收嫩了点。又叫你挑回去。不过几年后，又改为交谷子，为啥？因为米在仓库里生了很多虫。

问：据说当年给刘文彩交租，也有小孩去，是吗？

杨开玉：有呀，小孩主要是去吃饭。那时给刘文彩交租，有饭吃，还有腊肉，交了租要把饭吃了、肉吃了才回来。后来给共产党交公粮，饭没得了，但是有开水喝。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5日

地 点：安仁镇新同小区



这个孩子眼看这么多好谷被吹出来，脱下衣服想包一点回家，狗腿子一看，举起弹簧钢鞭就打。老大爷忍不住气愤，捧着吹出来的谷子向前质问：“这吹出来的都是好谷子，你们为什么说不能顶租？为什么又不让我们拿走？！”……这些年幼的孩子永远也忘不了这世世代代的苦，祖祖辈辈的仇！（当局宣传品配图文字）

抓进去多的是贫下中农

讲述人：余木清

66岁



人民公社化，饿得惨！

我们原来属于崇州中和公社，现属于桤泉镇。公社化（主要指1958年、1959年和1960年）那些日子，惨得很！我们每天出门，脑子里全部想的都是在哪儿找点吃的，根本没想什么读书、什么个人前途，想的就是把肚子填饱。公共食堂五天发一次饭票，凭饭票打饭。有一家的娃儿已经饿死了，死后还有两天才发饭票，他家把死了的娃儿藏在屋里不吭声，等到两天后把饭票领了才把娃儿抬出去埋。我那时读书，每天四两粮，五天发两斤粮的饭票，自己到食堂去端碗碗饭吃。我找父母闹：“把饭票给我！把饭票给我！”五天的饭票，我两天就吃完，后三天没得办法，只有出去偷。在地里挖一根红萝卜，也不管泥巴，只顾往嘴里塞。冬天只有两件衣服一条裤子，光脚板，没鞋子。一年才六尺布票，六尺布票自己都不敢花，还要拿去卖了换点钱——市场上一尺布票卖三角钱。半年一年难得吃回肉。糠糠菜菜，那个糠才利害，吃多了大便都解不出来，眼睛都鼓出来了还是拉不出来。

你们来那个地方有一个拱桥，那一年有一辆拉苕子的解放牌汽车子坏了，就把苕子下了一半丢在那儿。那个苕子是一种半野菜，现在猪都不吃。当时把苕子洒在田里，长起来后作为有机肥肥田。那半车苕子，少说有4000斤，一夜时间，全部被农民抢回去吃。我也去抢了几罐，煮来吃，还好吃。结果半夜毒性发作，又吐又拉，这才晓得这样吃不得，于是把皮子剥了，拿到磨子上推，那皮皮有毒，把心心拿来吃，还不敢多吃。

公社食堂歇（停）火后那几个月时间，一点粮食都没得，一家一家地饿死。小孩和上了六十多七十岁的人，饿死得特别多。我亲眼看到，有些人支个拐棍，走着走着倒下去就死了。我们生产队的黄建英，她家五口人，公社化时

饿死四个：她奶奶、老汉（爸爸）、哥哥、妹妹，最后只剩下黄建英一个。我一点没说谎话，这是我亲眼所见。黄建英后来嫁给安仁一个姓刘的，她儿子现在就在老公馆斜对面开了个刘氏饭店。她同我差不多大，60多岁了，她家是贫下中农，很穷的，一直住个茅草房。我当时十多岁，家里一点粮食都没得。我们家里我爷爷



当年展示人民公社食堂的宣传画

余德生1960年饿死了，饿死的还有我们幺婶婶和我四爸的一个娃儿。当时他们住的那个地方要办一个红专校，就把他们赶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地方，又吃公社食堂，他们没办法，饿死了。当时埋得很浅，改革开放后我四爸五爸想给他们重新起个坟，但找不到了，农业学大寨把那个地方全部种了田。

那时候饥饿把亲情都搞得没得了，两口子闹离婚的、儿女不供养父母的……偷窃也吓人，当时粮站的人是背着枪守粮。就是种点蔬菜，晚上也得搭个棚子守，否则第二天就没得了。如果不偷肯定要把你饿死。吃得饱的是当了官的，如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公共食堂的事务长（他发饭票）等等。

后来是刘少奇把土地下放，搞三自一包，这样才吃了点饱饭。

文革大革命，整得惨！

可是，咳，没两年，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文革期间也饿饭，还要突出政治。本来只交公粮和余粮，但又喊你交什么超产粮、战备粮、红心粮（一颗红心向党）、爱国粮……这样交下来，像我们这个生产队，一年分的粮，精打细算加上糠糠菜菜一年最多只够吃十个月，还有两个月只有自己想办法。我们曾经到山上去换玉米，玉米还在杆杆上就扳下来，还没干。一百斤玉米晒了只有九十斤。还拿不到，要山上有熟人，有亲戚朋友才行。拿一百斤玉米，今后要还人家一百斤大米，比现在高利贷还吓人。这种现象起码占百分之八十，好一点的就是那些当干部的。他们多吃多占，谁敢说他们？！不说还好，一说就挨整！你要是说了他，今后不管是入团入党呀、当兵呀，都要卡你。

公社化时还没有像文革时那么突出政治，饿就饿嘛，龟儿子文革时政治运

动把你整得惨，那个日子难过得很。我去学打铁，打点小铁器，一天挣几角块把钱维持生活，嗨！林彪事件出来后，姚文元写篇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打铁挣生活，一下子就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把我抓去斗，弄块牌子挂起——“私开地下铁工厂”！把我抓到公社去关押了十多天。

公社专门成立一个武装班，凡是他们认为不听话的、所谓出工不积极、不突出政治的，抓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跪倒一顿痛打！他们找了一些没有素质、没有文化的团员、积极分子的人去当打手，给他们发工分。打手们想表现好，能得到提升，一个个下手狠。他们用这么大的竹竿，剖成条条，使劲抽。打得你一声声求饶！

打完了就关起来办学习班——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什么老三篇（注：指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等等。还不给吃的，每天都是自己家里送饭去。起码整一个多月，要把你整得服服帖帖后才放人。我们队上的余成安（音）被抓进去整了两个多月时间，他的老婆拖起几个娃娃，没办法，去求饶，求把老公放回来做点工分。不放！说他嘴硬。抓进去多的是贫下中农，为啥？因为地富反坏右们早就被整得规规矩矩，啥都不敢说，只有贫下中农还敢说点牢骚话。

那个武装班搞了半年左右，不光是我们公社，周围的公社都搞了的。

我在公社关了十多天后返回大队，又在大队被关了二十多天。大队书记凶哟，背杆枪。整个大队关了一、二十个，各种罪名都有：有乱说话的，有破坏农业学大寨的、有同他们唱对台戏的，还有我这个“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总之，只要觉得你稍微有点不顺从，就抓进去。那是热天，晚上蚊子咬得惨，放出来后我到河里去洗澡，衣服一脱，呀，身上全是咬的，居然已经不觉得痛了。

关押在大队算轻点的，严重点就抓到公社，再严重就是公安抓去判刑了。那些年，看到自己的父母亲跪在地上被人打，不敢吭声。你要敢吭声打得更惨，而且以后分粮还少分点给你，工分，人家十分只给你五分。人们敢怒不敢言。

那些年，强制农业学大寨，分粮搞三挂勾，来挂你的口粮。一是工分多少；二是喂猪多少；三是干活积不积极。不知道是哪个想出来的。不过我现在也想通了，那些县委书记，他们必须要刮粮，他们也要向上面交粮，不刮不行。

但“思想好”可以不做活路，也评十个工分。“思想好”就是你会上发言发得好，口号喊得响。还有就是揭发别人，比如某人做活路没做好呀，把秧子整倒了呀，破坏生产呀等等。这些“思想好”的人工分比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挣得多。什么勤劳致富？老实人遭整，你越做越吃得，越没得粮。什么“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要弄个党员来当，当了就要升官，升官后一家人就飞黄腾达。

那时，人与人之间互相整，完全不敢说实话，根本没有说大家和和气气，

和气相处、和气生财。

我当时20多岁，心想，这辈子可能活不出来，我想逃到新疆去。我大伯的娃儿，跑去了新疆。那时新疆还比较好，一是吃得饱，二是不讲阶级斗争。

参观展览馆，假得很！

文革期间，到展览馆来参观的成都城里人很多，但他们不是真正来参观展览馆的，来干啥？来买农产品！

那些单位打着“到展览馆去受阶级教育”的幌子，来后走马观花看一下赶快跑到街上买肉票、买鸡蛋等等。当时鸡蛋一块钱十个，肉票三角钱一斤，肉八角钱一斤。那个年代城里人营养也不良，成都没有自由市场，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如果你在成都有亲戚，你给他提两斤肉去他高兴得很。所以，什么受阶级教育，我看绝大部分都是假的，是来买东西的。

农民也要卖呀，农村娃娃上学，要交学费，两元钱，交不起，买盐、买煤油，要钱。所以，鸡下了蛋，不敢吃，要去卖几个钱。清油根本就不敢吃，好吃的东西不敢吃，拿去卖。

对了，还有人把那个苕子馍馍拿到展览馆前去卖，那些不知就里的城里人买来吃，吃后一个个拉肚子。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7日

地 点：徐大石桥旁余木清家中

采访后记

这是一份偶然得来的采访录。

放寒假的当天，我便匆匆赶往安仁，既想请当年刘文彩的佃户李福清老人谈谈“解放”后的经历，更想找他女儿——《收租院》泥塑中那“苦难”的小女孩原形李金蓉。

不幸的是，敢说敢言的李福清老人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去世了。

几天后，待丧事办完，我走进了李金蓉的家。

又不幸的是，李金蓉因病身体很差，不便多说。这样，她的丈夫余木清便同我聊了起来。

这无意间的一聊，便有了这篇采访录。

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

讲述人：吴秀芳（69岁）
刘世柄（70岁）



吴秀芳：我以前是大邑县清霞四大队的人，清霞四大队地名叫仙台山。我住在李家沟吴家大院，距安仁有50多里路。在土改之前，我们李家沟历来是清白之地，从来没有小偷。公社化时（1958年），我们吴家大院住得有12户人家。四户姓李，李么爸、李改匠、李四娘、李春城（音）；一户姓陈，其他的就是我们姓吴的了。我们吴家是一个大家庭，我爸的弟弟家有六口人，我爸这一家有七口人——我爸、我哥哥嫂嫂、他们的二儿一女、还有我。我妈1952年就去世了。

土改时评成分，我家被评为富裕中农。因为我家有三亩田。我爸这个人，一辈子省吃俭用，鞋子都没穿过，只穿过草鞋，刘老师你是见过的。他穿裤子，裁得很短，就是为了省点布。他一辈子想的就是买田买田买田，书都不让我读，要存钱买田。当然，他也觉得女娃子长大了嫁出去是人家的人。那一年他把谷子卖了，买了三亩水田，没几个月，冬月间，就解放了，因为这三亩田，我家被评为富裕中农。后来我们说，幸好，再晚几年解放，爹再买几亩田，我们就是地主了。

1958年搞公社化（人民公社），办公社食堂，男女老少都必须到公社食堂吃饭。走不动路的老人家就挑到食堂去吃饭。食堂最初吃碗碗饭、玉米馍馍，还吃得饱，没多久就主要吃红苕，吃两顿，早上红苕，中午一块馍，晚上不开饭。食堂一天每人只有二、三两粮。我们只得去挖野菜吃。公社食堂解散时好像是1961年的5月份。解散时，一个人分了一斤半面粉就没得了，自己去想法活命，于是砍树砍竹子卖呀，卖了买点菜吃。

家里如果来了客人，只有煮点菜吃，还没有盐，那时盐是国家控制，私人买不到，要盐只能到公社食堂去找炊事员，人不熟还不给你。

刘世柄：那时我在学校，盐是按计划供应。菜油每个月每人一两——十六两称的一两，也就是说每月一个人只有几钱菜油，现在的话，炒菜一顿都不够。

吴秀芳：那几年，我们吃草籽籽、吃水芹菜、吃枇杷树皮皮，把树皮刮下

来炕（烤）干，毛主席打江山时过草地，吃草根、吃树根，我们就把树皮吃过了！那时的妇女，好多都饿得脱肛。我有个三嫂，是我爹的干儿媳妇，当时她30来岁。她到我家来，裤子经常都是湿的，脱肛。她还好，没饿死，活出来了。

1959年我哥哥当保管，那时搞浮夸风，一亩田吹万斤，我们唱歌都唱万斤。这样，粮食打不够，但报上去要有这么多粮，于是爬些小伙子站上去称，还是称不够。仓里下面是草草，上面是谷子，让上头来的人检查，搞浮夸。后来要来个“实事求是”，那空数从哪儿拿？就好比你有100块钱，报上去5000块，又来个实事求是，要你拿出4900块，哪儿去拿？。没得呀！我哥哥是粮食保管，就找我哥哥要粮。我哥说，粮食不是我一个人称的，还有队长、会计，贫下中农代表也在场。

交不出粮食，就把我哥哥弄去学习，追问粮食哪去了。社员也闹，说：“你当保管没得粮，让我们饿饭。”白天他们把我哥哥弄去操（平整）冬水田，晚上抓去跪瓦片渣。家里一点吃的都没得，我只得去偷生产队的菜来吃……你不要再问我，再问我就要哭起来了。那些日子，太惨了……1958年是大丰收，红苕挖不完，多得很，那时要大办钢铁，16岁以上的就得去炼钢，所以，好多红苕都埋在地里没有挖起来。1959年缺粮，人们又去挖去年地里的红苕来吃，红苕已经变稀了，烂了。不管！挖起来炕（烤）干了吃。结果，一些人吃了那个烂红苕中毒死了。

刘世柄：当时我在清霞教书，我就晓得，有些娃娃就是去挖地下的烂红苕吃中毒死了。

吴秀芳：1959年大量饿死人，我家饿死四个：我爸爸，他是3月饿死的；接着是我12岁的侄儿，他是8月；侄女是腊月初十死的，她爸爸，也就是我哥哥，在她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腊月十一死的。叫什么名字？我爸爸叫吴发强（音），哥哥叫吴明安（音），侄儿叫吴新全（音），侄女叫——

咦？你问这些干啥？如果又遇到文化大革命，我说这些要惹祸哟！

刘世柄：不得会了，没得事。

吴秀芳：我爹死了没得人埋，我去找队长吴昌华（音），说找几个人，做个火匣子（棺材）。队上给我称了两斤米（从我口粮上扣除），又同意我在生产队的地里摘点苕菜。我把米和苕菜煮了一锅稀饭，还打了两块钱的酒（那个酒钱是我后来挖草药卖还的，草药晒干了两角钱一斤）。来的人吃了酒饭，把我爹抬到坡上，但是，抬到那儿他们就再没有力气挖坑埋他了。第二天我哥哥去看，爹



刘世柄

还摆在那儿，他只得自己挖坑埋他。当天哥哥就没出工，生产队扣他的饭，说吴明安今天没有出工，不拿饭给他吃。我哥哥一句话都不敢说。我嫂嫂不干了，她去说，自己的爹死了埋不了，不掏点泥巴埋他呀？

我清楚记得父亲死前的样子。那天我去开会回来，他睡在床上，没得吃的，他吃了一杆水烟。他眯着眼看我一眼说：“我只有叶子烟了。”他说他想吃饭。我同我侄儿跑到公社食堂去称粮，说爸爸不行了。不称！他们说：“如果他明天不死呢？”我有个大姐的女儿在食堂煮饭，她说：“小嬢嬢，我称给你。明天大爷不死呢我也拿给你。”

我称了几碗米回来，烧的草草火，咕咕地煮。还没完全煮好，我就舀了一点端到爹床前喂他，侄儿点了油灯端过来。我爹喝了一口，第二口就吞不下去了。鸡叫的时候他死了，那时他才62岁。他死后如果开膛剖肚，里面没得一口饭。那几年饿死的人，肚皮紧贴后背，胃那个地方，凹下去像一个碗，里面可以装一碗水。

我的12岁的小侄儿饿死后，接下来就是我的小侄女。我看到我侄女不行了，出去割猪草时，偷偷割了点生产队的红苕尖尖，我把红苕尖煮来给我侄女吃，连盐都没得。嫂嫂回来，她说：“妈妈，那个苕子叶好好吃哟。”她妈说：“哪来的？”我说是我偷偷割的。

第二天，我侄女就死了。

都死人了，我嫂嫂还得出工，所以，是我背去埋的她，用了两块板板。我把坑挖起，把她抱下去。侄女死时才5岁，她叫吴慧英（音）。

侄女死后的第二天，我哥哥就死了，死前他倒在床上睡了几天。死后他鞋子都没得穿的，光着脚板就埋了。

刘世柄：那段时间，人死了有个木头做个火匣子（棺材）算很好的了。很多人死了拉出去挖个坑坑就埋了。

吴秀芳：那时，好些人走路走路倒下去就死在路上。

刘世柄：这种情况多，我们学校下面的路上就经常看到。

吴秀芳：那时会很多，我们经常去开会，另一个大队也过来开会。杨世英（音）的老汉来开了会就走不回去，就在苏店子边上，开会时他坐在那儿吃了杆烟，回去路上就死了，也没人管他，一个接一个从他身上跨过去。那几年，走在路上，走不多远又死一个，不多远又是一个。

死的人叫四类分子、反革命分子去埋。有些没埋好，被狗掏出来吃了，惨得很。

我们吴家大院里那四户姓李的人家全部饿死，一个不剩，断根了。李改匠家六口人吃饭，可是死了七个！六个人咋死七个？你说。

谭：肚子里还有一个？

吴秀芳：不是！那天，李改匠家的一个婶婶，走到李改匠家就死了，死在他家里，加上李改匠家全家死完，所以死了七口人。

我爸爸的兄弟，他叫吴志平（音），他家六个人全部饿死。我这家剩我一个，我叔伯家剩一个吴淑芳，大院里还有郑少华（音）、郑兴顺（音）和陈久明（音）活下来。大院12户几十口人，就剩这么几个了。我们吴家一个好好的富裕家庭，死得只剩我和吴淑芳两个人。一场大饥荒，大院12户人家，剩下四户。我和吴淑芳算两户，郑少华（音）、郑兴顺（音）算一户，陈久明（音）算一户。

我们那个生产队，1958年时有200多人，到1960年时只剩下60多口人，死得好惨！

刘世柄：那时我当老师，每个月才15斤粮，农村就更惨，所以饿死那么多人。

吴秀芳：我们清霞以前是曹平安（音）当书记，人死多了就把他下了（我们那个生产队的干部全部都下了），上面派熊书记来清霞当书记。他说，你们调我去，不拨点粮给我，我去了咋个干工作？那不是还要饿死人？这样，上面给了点粮，这才保了点人命。不是熊书记来，还要饿死很多。本来，我们那儿是丘陵地，人少地多，人平地有10亩，田有七分，根本不会缺粮。现在土地下户，二、三分水田就吃得多饱的。都是公社化后乱整！

哥哥死后，我嫂嫂也面临饿死，在生产队做活路人家说她悄悄挖野菜，把她弄到苏店子去反省，用麻绳把她绑起来。她挣脱后跑了，那些人还追到我家里来。嫂嫂不敢回家，从此离家走了，后来她改了嫁。

嫂嫂逃走，家里只剩下我和侄儿吴新红。后来，1963年，有人找我们背箱子到安仁，我就同侄儿到了安仁，我们在这儿留了下来。没料到第二年我侄儿下河洗澡淹死了，从此吴家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到安仁后，成了家，我老公也是个孤儿，他父母也是在公社化时饿死的。不过他还好，他还有个姐姐和弟弟。到这儿来，遇到有人欺负我，我没得娘屋。现在清霞的地已经被开发商老板买了，我在那儿只有亲人的几座坟。开发商



看看这个拖儿带女的寡妇吧！她们母子三人，一年到头吞糠咽菜，饿得死去活来。

——《收租院》解说词

把坟平了，每座坟赔了300元钱。所以，我现在在清霞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我老公也死了，儿媳对我不好，不拿一分钱给我，我只有出来挣钱，有啥困难没得哪个拉我一把。前些日子我腰痛，去成都医院，花了我四千多块钱。我没买社保就没得医保，只报（销）了很少一点钱。现在我一个亲人都没得了，伤风病痛都没得人管我。政府看我困难，给我了这份扫地的活，以前每月450元，去年8月加到600元。虽然365天每天都得干，但有这份活我每月就有收入，我很感激，所以我说，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



一年到头，年近古稀的老人天天在街头……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采访

地 点：安仁镇徐大石桥公路旁

采访后记

得知安仁镇有一个当年亲人都死绝的老妇后，我便想去找找她。

以前认识的刘世柄老人很热心，一大早冒着严寒，陪同我去四下寻访。

找到她家后，吴秀芳不在——她每天都要去几公里外的地方扫大街。刘世柄老人又陪我去公路上寻访。不料，由于天寒，吴秀芳裹得比较严实，一下子没认出，我们与她失之交臂。

又赶去她家……

又赶回公路……

吴秀芳见是熟人引见，便答应放下手中的活，同我聊聊。

当我一个个追问死者的姓名时，吴秀芳恐慌起来，幸亏刘世柄老人赶紧宽慰她，她才继续讲述。

我想，她说的“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绝不是虚情的赞美，而是她在晚年无依无靠时的真实渴望。

只是，不知马上到70岁的老人还能扫多久的大街。

还有，是谁让她没有亲人了呢？

我们家，大难不死

讲述人：蛋春华

1951年生



我是1974年嫁到这儿来的，饿得最惨是在娘家的那些年。我娘家在大邑县上安镇金鸡大队，离这儿有一、二十里路。公社化时，我还不到十岁，在娘家看到饿死的人多哟，甚至一家一家的饿死。我们家的么姑姑，在坡上做活路，倒下去就死了，是用梯子把她抬回去的。

我娘家有个老辈子，他的娃娃叫蛋长安（音），蛋长安身体不好，生产队说他不出工，就打他，打了没几天他就死了，他死时才20多岁。蛋长安的妈姓潘，已经死了，老辈子哭着说：“潘大嫂呀，他（儿子）也死了一一”没多久他本人也死了，一家人全死了。

我妈也挨打，说她做活路少。到公社食堂，不给她吃，他们把她的二两馍块，这么长，提起来，就是不给她吃。我妈坐在那个树下，伤伤心心地哭。我有个叔伯哥哥，当时在当通信员，他跑去找保管，他叫蛋竖林（音）。哥哥发脾气说：“她做活路少，是因为她有九个娃娃。你多多少少得称点粮给人家吃呀。”

我们有九个兄弟姊妹，最小的弟弟才两岁，但全部都得去公社食堂吃饭。去公社食堂要过一条河沟，上面架一根独木桥，我两岁的弟弟快饿死了，也只得天天爬过那个独木桥，去公社食堂吃饭。

公社化时饭量大的饿死的多，炊事员、事务长、喂猪的、当干部的就要沾光。我大伯伯喂猪，还整点糠馍馍吃。我们家里没人当干部，连糠馍馍都吃不到。我三姐、四姐去挖水芹菜、挖乌瓜子（一种田里长的野草草，结有小果子）炕（烤）起吃，这些野草草，现在猪都不吃！那时我们吃萝卜皮皮，吃得非香！

说来不信，我们九姊妹，包括我妈，全部都活下来了，没有饿死！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 点：安仁镇徐大石桥

采访后记

蛋春华是我在公路边等人时偶然遇到的。

她在路边有个寄存摩托车的小坝，我们就在小坝上聊天，本想好好聊聊，但她业务繁忙，摩托车进进出出，喇叭声高高低低，只得作罢。

但是有个感觉，在这片土地上，只要同50岁以上的人接触聊天，一不小心就又是一部《收租院》。

我家饿死两个

讲述人：王汉清



2013年1月17日，我到大邑县韩场乡下采访时，向一个骑着三轮车的老人问路。老人叫王汉清，今年72岁，是附近蔡场的人。他告诉我，公社化时大办钢铁，各家各户的铁锅儿都砸了拿去炼钢，1959年就饿死人，他家饿死两个：他的哥哥王志文（音）和他嫂嫂余氏。



[母女抬筐]

“两筐谷子，经过前两道关就剩下一筐了。家里没米下锅，这里的租子又交不够数。娘愁儿愁，千家饥饿，万家忧愁！”

——《收租院》解说

在毛泽东视察过的地方

——大邑县所在的温江地区

选择自《麦苗青，菜花黄》，作者：东夫

这一年（1959年），郫县红光管区（即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交了征购。

……到了1959年底，大部分公社食堂都因断粮停伙，勉强维持的也只能供应不足以维持生命的菜汤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在家里煮点填肚子的东西吃。而在上面看来，这种食堂停伙，家家户户冒烟的状况，是典型的右倾倒退活动，于是一场“砸锅运动”遍及全川。社队干部带领武装人员昼夜巡查，发现煮食者砸锅掀灶，没收食物，施以残酷体罚，决不许社员煮食任何东西。红光管区领导以宰资本主义尾巴和反隐瞒私分、贪污盗窃为名，普遍对社员搜家、搜粮、收锅，甚至捉鸡捉鸭，有些社员家里的泡菜、盐菜、鸡蛋、鸭蛋、海椒、盐巴等也不能幸免……一度造成农村秩序大乱。

靠公社食堂就得饿死，靠自己争取一点点生存机会，又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宰掉，那情景令人怵目惊心。

1960年1月，管区食堂全面停伙断粮，管区领导召集各队干部召开“收锅誓师会”，布置连夜突击收锅。干部冲进社员家中，翻箱倒柜，将所有可食之物一卷而空，见锅就提，一时间告饶声哭骂声响成一片。

一队女社员袁木清，儿子得了肿病，需要早晚烧火烫脚和煮些吃的，她向前来收锅的管区副主任刘贤松等跪着哀求：“不要收我的锅，收了锅就断了我娃



毛主席来到咱们村庄

娃的命根”。刘等不由分说，将锅端起就走，果然不久她儿子就病死了……

与其说是收锅，不如说是收命。走投无路的人们象苍蝇一样的死去。

一个阴冷的早晨，在毛泽东视察过的地方，“五保户”刘大汉家中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听见哭声的人一听就晓得准是刘大汉死了。没人去安抚那个爪手的残疾女人。没多久，那女人的哭声也渐渐消失。生产队干部命社员钟大朋去将两口子埋了。过去身高力壮，如今也饿得偏偏倒倒的钟大朋将刘大汉两口子从家中拖出来，放在鸡公车上一边绑一个，推到一个低洼处，掩上一层薄土。然后从公共食堂得到一碗稀饭吃，这是他干这件活享受的物殊优待。吃了饭干部又命他去埋汪家两个饿死的人。干完活当天晚上，钟大朋也一命归天。

无力掩埋的尸体有的在家中腐烂，有的横尸田野路旁，活着的人全麻木。连小孩对死人也见惯不惊了。（《麦苗青，菜花黄》第263-264页）

在1959年这个黑暗的冬季，自古就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美誉的温江地区，和全省一样遍地是饥饿和死亡。

川西地区大跃进饿死人的事从1958年开始出现，1959年已经很普遍。大规模的死亡发生在1959年到1960年冬春之间，像一股凶猛的寒流席卷整个川西平原。从1958年以来被精疲力竭的劳累、日益加剧饥饿折磨衰弱不堪的人们，再也经不起这次惨重袭击，成批成批地倒下了。

……什么吃的也没有。土地、牲畜、农具、土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是“公家”的，农民家徒四壁，一切淀粉制品现在凭粮票供应，而农民没有粮票。食堂一关，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唯有死路一条。

老人们在呻吟中衰竭而死，孩子在哭叫中嘎然而去。倒毙在路边田间的多数是男性青壮年，他们为生存绝望地奔走，被驱赶到田间干活，然后象断了电的马达走着干着突然倒下，猝然而死。女人由于有较多的脂肪储存和较慢的代谢，承受饥饿煎熬的时间长一些，但她们也因此受到更多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一个家庭，往往是男方先去，剩下她们去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和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

……

无力走动的人躺在床上绝望地等死，谁也无助帮助他们，有时候全家人就躺在床上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后死的根本无力掩埋前者，而且埋不埋似乎也失去了意义，因为后者很快也会死去。一些全家死绝的人家数日后才被发觉。

（《麦苗青，菜花黄》第250-251页）

统购统销，一个真正的“收租院”

1953年10月，当广大“翻身农民”还沉浸在分得了地主土地和财产（即“胜利果实”）的喜悦中时，一个即将要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的“收租院”已悄然诞生。

这，便是实施了长达39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政策。

一，什么是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是当局控制粮食资源的计划经济政策，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

统购：农民的粮食不准自由买卖（取消了原有的农业产品自由市场），而必须由国家按他定的价来收购。

统销：所有收购的粮食由国家统一分配。

除粮食之外，国家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烤烟、水产品等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农民对这些产品都不能自由买卖，而价格则由国家统一规定。

二，为什么要统购统销

中共执政之后，最急于要干的一件事就是要在这个庞大的农业国里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中最紧要的是重工业；重工业中最紧要的是军事工业。

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人，更需要大量的钱粮。

人，不缺。问题是大量从事工业化的人要吃粮食。钱，缺少。于是，便从农民身上下手，这正如当年为了让农民参军打仗，便从地主身上下手（分田分地）。

1953年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城镇人口大增，粮食需求量也大增。同时，为了工业建设，还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这样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到1953年上半年粮食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于是，当局迅速出手，

在统购统销政策下，不准任何人买卖粮食，国家要把粮食先抓到自己手里。

三，统购统销，“大斗进，小斗出”

在《收租院》控诉刘文彩残酷剥削农民的罪恶中，“大斗进，小斗出”最为有名。收入小学教材的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说：“刘文彩大斗大称进，小斗小称出。单凭大斗收租这一项，他每年就向农民多收了三千三百多担谷子。斗啊斗，你是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的肉……”

现在，“大斗进，小斗出”的真相已经大白，但是，一个真正的“大斗进，小斗出”的真相还鲜为人知。

这，便是“统购统销”。

字面上看，“统购”（计划收购）与“统销”（计划供应）是中性的经济词汇，反映的是一种经济活动，甚至给人一种“买卖公平”的印象。

其实不然。

问题在于：它如何统购，出价多少？又如何统销（返销），价格多少？

如果它“大斗进，小斗出”，统购一百，统销（返销）五十；进价五十，卖价一百呢？

不幸，它正是这样在干。

著名学者杨继绳在《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炎黄春秋》2008年12期）一文中对此有证据确凿的考证。他首先谈到“国家”不顾粮食的产量而进行的高额征购：

“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1953年，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从这可以看出，农民粮食收成没有多大增加，而政府的征购却飞速猛增。杨继绳说，这还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继续大幅度提高。

接着，杨继绳写道：“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这个“成果”，也就是从农民口中抢粮，即“逼租”后的结果。

杨继绳以官方自己的数据，反映了国家强征农民口粮的事实：“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1954—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造成了农村粮食十分紧

张。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也收购走了。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表5 “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单位：亿斤）

	1954—1955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返销回农村的粮食	494	405	490	429
（拆贸易粮）	（401）	（334）	（402）	（351）
占征购粮食的比重（%）	45.8	38.9	49.3	41.3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从以上表格中可以看出，国家把不该征的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等“过头粮”也强征走了，而返销回来的还不到一半。

而且，“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杨继绳）“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一进一出，正是典型的“大斗进，小斗出”。

这种强征（逼租）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呢？

东夫在《麦苗青，菜花黄》一书中写道：“统购统销从1953年秋开始，1954年初全区普遍出现缺粮，当农民找到干部要求供应粮食时，才发觉大事不妙。得到供应的只是少数农户，大部分缺粮户不仅得不到供应，还被斥之为“闹粮”。

“闹粮”的表现为“装穷叫苦，遗弃子女，向干部、党员要饭吃甚至围攻区、乡政府。”例如：温江苏坡乡杨德弟一家统购中卖了两千多斤大米，连往年的存粮都卖光了，年底便无米下锅，家中两个媳妇背着娃娃下雪天跪在路上，哀求干部“退点米给娃娃吃”。双流的一些农民把女孩子穿上新衣服丢进山里，派出所把孩子收容叫家长领回，他们不领，说“十根指头哪根舍得割，都是因为没米吃。”

6月份，更大规模的饥荒爆发，缺粮的农民聚集场镇抢购食物，到仓库要求买粮，几近骚乱，尤数‘本区最肥富的温江、郫县、崇庆一带发展得最为严重’。”

（选自该书第28—29页）

因此，早在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之前，统购统销的这种“逼租”已经造成了农民的死亡。（见下面“统购统销，饿死不少”）

再看“国家”的另一种“购”、“销”。

当年，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这“剪刀差”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就是低价从农民那儿收购他们的农产品，高价卖给他们生活用品等。这“剪刀差”就是《收租院》中的“大斗进，小斗出”，这一进一出，“剪刀差”39年，剥削了多少中国农民？

杨继绳在《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中写道：“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徐从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

四，统购统销，暴力逼租

杨继绳说：“统购统销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然而，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可贵的奉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没有农民的奉献，也不会有‘两弹一星’。”

此话说的自然是事实。问题是，农民真的是宁愿饿着肚皮，甚至不惜饿死自己和家人来献上这一份“可贵的奉献”吗？

当然不愿意。

不愿意怎么办？

我在前面“《收租院》与收租（征购）”一文中曾写道：《收租院》里的种种“逼租”现象的确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只是名称不叫“收租”而叫“征购”。

电影《列宁在1918》中，列宁对向农民征购粮食展示了他的强盗逻辑：如果你们不给，我们就强迫你们给！你们如果要反抗，我们就用武力消灭你们！

一切照搬苏共的中共，青出于蓝。

如何强迫？

“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杨继绳《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

大批判就是斗争会，斗争会往往就是捆绑吊打，捆绑吊打往往逼人致死。

例一：为了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政治压力。有些地方，对没有

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291—293页）

例二：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例三：余粮征购通常的做法是干部把指标摊派到各户，张榜公布，限期完成，抗拒者强制执行。

温江县昆芦乡一村公布统购任务时，第16组的10户农民只到了一户，工作干部就派7个持枪民兵将组长张世荣和“惯匪”张学云捆绑到村公所吊打。公平乡4村中农岳松贵派购“余粮”1400斤，岳交不出，干部和积极分子就抄了他家的粮食送到仓库。

新都县永兴乡工作干部点名，见有的人未到，下令民兵：“拿绳子去喊”。缺席者捆绑到会后，干部念摊派名单。有的农民叫苦说完不成，干部当即驳回：“你在放屁！”接着继续往下念，又有人叫苦，干部一拍桌子：“不准在下头闹，闹就捆起来！”念完，下令人人表态当面认购，不认购的“按反革命分子看待”。

成分不好的更无商量余地。崇庆县苟家乡评产时，一个富农说干部评定的产量高了，当即罚跪，被逼跳水自杀。大邑龙凤乡六村抗拒征购者甚众，干部为

杀鸡给猴看，将全村地主包括子女在内全部罚跪。双流县双华11村整完不成征购的地主，或脱光衣服(包括女人)推到塘里淹水，或往头上淋水，人人挨打，其中6人打得爬不起来。

(见中共温江地委秘书处：《关于温江等五个县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发生强迫命令现象的通报》，1954年11月25日)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第27-28页)

例四：在当年四川省秀山县的石耶镇余庆村，有一个贫农叫周明山，他老婆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另外，他上有一个六、七十岁的母亲。1954年统购统销，乡上强行要农民卖余粮。那一年虫灾，粮食减产，农民没有什么余粮。乡里派民兵一家一户地搜。搜到周明山家时，从柜子里搜出了三百多斤谷子，周明山说：“我只打了这点谷子，自己吃都不够。”民兵不由分说，强行把谷子挑走了。

第二天，周明山把他母亲背到区上，对区长和公安特派员说：“我家没吃的了，只得出去讨饭，但我母亲年龄大了，走不动，我只得背来交给你们，你们吃饭时给她一口饭吃就行了。”

公安特派员马上把周明山抓了，捆绑起来押到县里。一个月后，秀山县在梅江镇召开公审大会。审判长宣读周明山的罪行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属于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周明山就被拖到河坝一枪打死。

周明山死后他母亲天天哭泣，没多久也死了。周的女儿11岁，儿子7岁，只得出去讨饭。



周明山遇难地，秀山县梅江镇

五，“统购统销，饿死不少”

当年我在调查1957年右派时，得知有一个人因为说了一句“统购统销，饿死不少”而被打成右派(后含冤去世)。他曾在农村目睹了不少农民饿死于强行征购的统购统销，1957年，他以为共产党真的要“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忍不住说了一句真话，结果送了性命。

我不知道统购统销具体造成了多少农民的死亡，但是，我知道我在安仁采

访时农民们的讲述，还有东夫先生在安仁所在的温江地区的调查。

“1952年曾任大邑县委书记，后任温江地区宣传部长的景廷瑞在统购统销的先进县崇庆县调查发现：卖光了粮食，又被政府不供应打懵了的人们惊惶失措地四处乱窜，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路上，遗弃的孩子沦为乞儿，有的偷东西被人打死，有人走投无路跳河自杀……”

在地委的汇报会上，景廷瑞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大发议论：‘到崇庆后，看到街上丢的娃娃十几个，一个姓黄的就丢了两个，有的娃娃偷东西被人整死，这不是一两起。廖场有一家三口人都死了，还有一家死四口的。一个生产委员一家死了三口，自己病得起不了床，这也不是一两起。路上走着就跌倒死人。有些人肿，有些人瘦得很，到处都不卖粮食，到成都也没有，有人搞不到粮食半路就跳了河，我知道的就有3个……’”（东夫《麦苗青，菜花黄》第31页）

杨继绳在《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中写道：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



当局宣传画：农民的幸福生活

又如：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4页）

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5年4月11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2页）

（这种惨象，可以用纪录片《收租院》里的解说词来形容：“谁不是爹妈的心头肉，谁没有自己的童年？旧社会，童年究竟给我们穷人的孩子带来了什么？除去受饥饿，只有斑斑血泪、血泪斑斑！谁没有爷爷奶奶，谁不想有幸福的晚年？旧社会，晚年究竟给我们穷人的父老留下了什么？除去饿死、冻死，只有斑斑血泪、血泪斑斑！”）

国家用统购统销垄断全国粮食购销，用统购统销多购少销，用统购统销在三年可怕的大饥荒到来时仍然不开仓“返销”。

杨继绳在《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写道：“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六，统购统销，你敢反抗？

1953年和其后的两三年，农民们手中分到的地，暂时还没有完全被“国家”收走，分得的地主们的财物，虽然大多已经消化完了，但余味还在。因此，农民们对给予了他们田地和财物的恩人共产党仍还心有感激。另一方面，共产党在镇反和土改中的血腥屠杀，记忆犹新，也让他们心存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把他们逼到绝路，他们是绝不会反抗的。

不幸的是，统购统销把不少农民逼到了绝路。

《收租院》第七部分叫“反抗”。该纪录片解说词说：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为了生存，为了子孙万代，我们要拿起武器，去找游击队，去找共产党！我们要消灭这吃人的地主阶级，摧毁这万恶的剥削制度！我们要打出自己的天下，建立人民的江山。

统购统销中，被逼到绝路农民自然要反抗，不过，这种反抗只出现在统购统销初期，因为，强大的“国家”迅速动用国家机器，把反抗很快消灭在萌发初期。

下面是一些地方县志的记载：

在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和严厉惩罚。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

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页。）

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德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页）。

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石柱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49页。）

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云南省志粮油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1页。）

《收租院》中，“反抗压迫，跟党革命”是艺术的虚构；统购统销中，“你敢反抗，我就镇压”是历史的真实。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中共当年的宣传画和标语

无数个真实的“刘文彩”

《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2期刊登了“渣滓洞刑讯室考”一文（作者孙丹年），该文披露，重庆“中美合作所”曾有48套刑罚之说是子虚乌有。这又使人想到编造的“水牢”、“地牢”。不过，真实的是：就在当年编造的同时，这块土地上正发生着一幕幕真实的惨剧。在杨继绳记录大饥荒的名著《墓碑》一书中，有大量中共官员毒打饥饿百姓的真实记录，笔者随手摘录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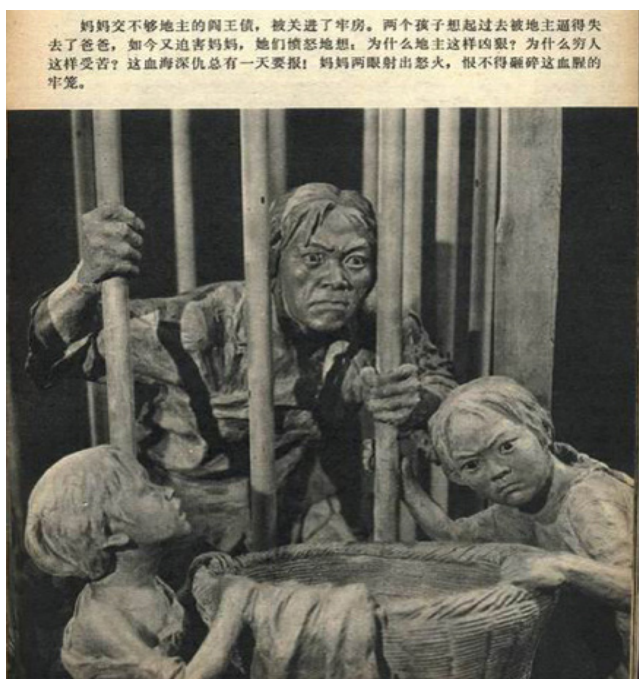
云南省泸西县全马公社647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打死2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1人，逼奸2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人，其中，致残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后死亡11人，逼死2人，关死1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来毒打4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人，打死3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个，其余14个没打过人的有10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

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文明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46人，其中打死4人，打残9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

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5月16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12天没有口粮，全队76人只好吃菜根。86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4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1692人，干瘦病、肿病205人，死98人。71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1960年吃了猪肉162斤，牛肉260斤，鸡46只、鱼173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90斤。一母狗下了6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62斤。

（摘自《墓碑》第十章“大饥荒中的云南”）



妈妈交不够地主的债，被关进了牢房。两个孩子想起过去被地主逼得失了爸爸，如今又迫害妈妈，她们愤怒地想，为什么地主这样凶狠？为什么穷人这样受苦？这血海深仇总有一天要报！妈妈两眼射出怒火，恨不得砸碎这血腥的牢笼。

（当局宣传品的图配文）

“新旧社会两重天”

《收租院》宣传：解放前农民受地主剥削压迫，生活在地狱中。人们从小受教育：是恩人共产党，救星毛主席让全国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生活。

当局反复宣称：解放前（1949年之前），中国是“黑暗的旧社会”，光明，从解放后（1949年之后）开始。

后来有人发现：

在“黑暗的旧社会”，没地的农民给地主交租之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没有那么多公粮，更无需被迫卖余粮、口粮、“红心粮”、饲料等“过头粮”；

在“黑暗的旧社会”，农民可以自由迁徙，或在田地耕作，或做买卖、或进城打工，而在“光明的新社会”，一个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张城市人才有的粮票，一个让人成为奴隶的人民公社，把几亿农民变成了寸步难行的“种粮机器”和“交租机器”。

在“黑暗的旧社会”，数千年习惯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中国农民，不知道什么叫做“大跃进”，更不知这个东西会索取几千万农民的生命。

在“黑暗的旧社会”，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成为拥有土地的主人，而在“光明的新社会”，农民们至今耕者无其田，只有在“强拆”的国家机器面前无助呻吟。

在“黑暗的旧社会”，农民哭诉悲苦不算犯罪，而在“光明的新社会”，“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作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杨继绳《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

在“黑暗的旧社会”农民遇到灾年可以外出逃荒，而在这“光明的新社会”，外出逃荒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要被抓捕关押（如大饥荒时河南的信阳地区）。

……

在当年的“忆苦思甜”阶级教育会上，说、听得最多的一句台词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如今，当人们了解到真相之后，觉得这句话没说错。

第六章

美丽的罌粟花

泥塑《收租院》形像生动，魅力无穷，无论是赞赏它的人还是诅咒它的人都得承认，它当年引起巨大的轰动、现在其“模仿品”（蔡国强作）获得国际金奖，定有它动人亮丽之处。因此，也难怪其创作者在几十年后的耄耋之年，仍然对此沾沾自喜。

只是，罌粟花也很美丽……



《收租院》第四部分，逼租

荒诞体制下的荒诞产物

讲述人：牟群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理论家

《收租院》研究专家



问：我看到一本书《轰天绝唱收租院》，上面有你的发言，得知你是研究《收租院》的专家，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牟：是的，我一直在研究。前些年，我们为《收租院》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就在大邑县，有美国的、东德的专家参加。研讨会由马一平（音）主持，学术方面是我牵头，写了有关的纲领，并作为美院的代表，在研讨会上发了言。

《收租院》的创作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上世纪60年代搞阶级斗争教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局沿袭土改时斗地主的作法，重新打“忆苦思甜”这张牌。各地因此竖了一大批形像，包括四川的大树公社、包括刘文彩的收租院，以此来达到控诉地主迫害农民的“阶级斗争教育”目的。

大邑县文化馆的一帮艺术家，想用收租院来搞阶级斗争教育，以适合上面的政治要求——因为宣传部有指令。他们组织了一帮人，做了一些泥雕，谁知艺术不行，泥雕既不生动又不深刻。于是，他们找到四川美院。美院派出了雕塑系的赵树桐和王官乙两位老师，他们那时正年富力强，技术很强，是苏联专家培训过的，做的是苏派雕塑。他们去一看，发现那只是一点民间艺术，这样做肯定不行。他们给学校打报告，希望全面投入，以学院的名义同对方合作，做一个艺术群雕。学校同意了，派出了一个十多个人的创作队，由雕塑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

美院的专家一介入就不同了，从宏观构思到具体雕塑，从艺术表现到叙事逻辑性等等，都十分完美。

在创作期间，四川美协不断去查看。当时，四川美协非常利害，是“创作模范”，在全国算得上“一流”！为政治服务这一套它轻车熟路，每一个政治运动它都有相应的作品。比如，毛泽东要支援越南，它马上搞个《南方来信》；1962年搞阶级斗争教育，它马上搞个版画创作——《红岩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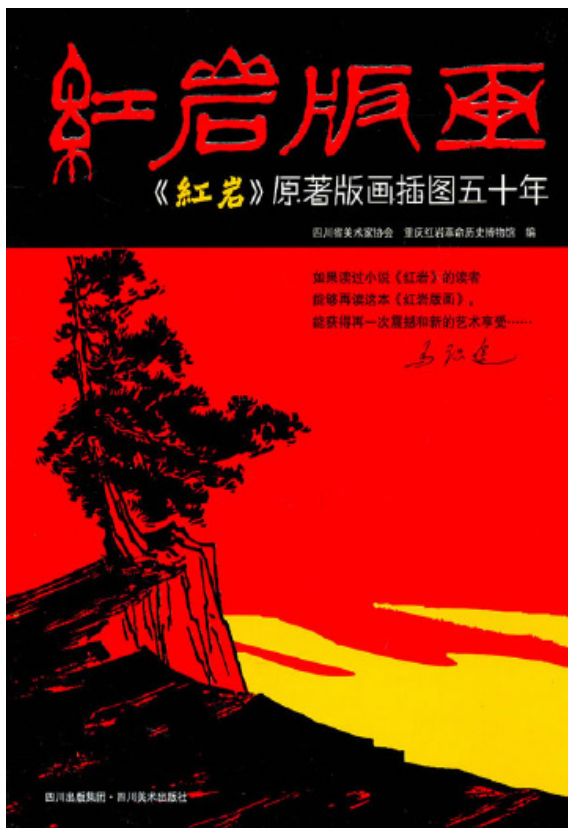
四川美院的这帮人很有灵气，又被洗了脑，灵气加激情，没几个月《收租院》就创作出来了。

当年的这些艺术家们是很真诚的，我对赵树桐和王官乙都有深入的了解，有多次对话。当时他们觉得，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是没有错的，党的阶级教育路线是不会错的。他们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去找出些人物来塑造，用艺术形像同政治挂钩。他们每天晚上开会讨论，白天做稿子，统一吃饭，搞突击。第一批样稿一出来就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领导一支持他们干劲就更大了。当时提了很多创作口号，比如“坚持现实主义”。什么叫现实主义？

就是把它上升到写实主义的技术层面，就是形像越真实越好。越苦难、越残酷，越能体现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迫害。但是，是否是生活的真实就不管了。越追求那种写实主义的真实，其创作的真正依据反而没有了。艺术超越了现实，变调了，成了一种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主观东西，创作的客观真实消失了，主观的东西占了上风。当然，当局本来就是要主观的东西，那时的口号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它（《收租院》）完全是浪漫主义的东西。浪漫主义是理想主义，你怎么想就怎么做。法国传来的浪漫主义已经被曲解了。法国的浪漫主义是自由，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前进，那是为了打破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毛泽东的政治意图、意识形态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浪漫主义中追求民主自由的灵魂。这些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的论文基本上都探讨这类问题。我写了一本书，讲的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下的美术状态。书的名字叫《根子正，点子好》，这是当时美协两个领导李少言和刘文的原话。“根子正”指的是意识形态是“正”的，“点子好”就是投机。意识形态加投机，就是共产党造假美术的灵魂所在。我的书就是在理论上剖析共产党造假艺术的灵魂。我想，这本书出版后会在那段时间的美术创作全部颠覆。

问：也就是说当年的美术创作是有问题的？



艺术家们为阶级斗争宣传的贡献

牟：绝对有！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它是战争年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入了和平年代的一个恶果。艺术为政治服务，从而完全扼杀了艺术，把艺术变成了一个骗术。《收租院》从审美上说它起到了制造仇恨的作用，艺术上越美，制造仇恨的效果越好。不过，当时的创作者是很真诚的，只是他们一个个被洗了脑，变成传教士了。赵树桐、王官乙都是很不错的艺术家，尤其是赵树桐，艺术上很强。不过他们都被洗了脑。

问：他们现在觉悟了吗？

牟：到了晚年他们才觉悟，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艺术作品很欣赏。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也是悲剧性的人物，真正看得清楚的是我们这一辈人。

问：你觉得《收租院》出来后对文革有没有影响？

牟：当然有影响，它成了文革的一个工具。《收租院》到北京展览，朱德、周恩来等高层领导十分关注。文革要竖典型，《收租院》就是一个榜样，成了阶级斗争的最强音。赵树桐他们因《收租院》一举成名。在文革中，赵当了中央文革文艺小组副组长，是江青亲自点的名。那时，文艺小组副组长比文化部长还要牛。当然，后来他因为上了“四人帮”的船被清查。

问：他们现在怎么看他们当年的创作？

牟：他们看得不深。这些问题必须由我们这种搞理论研究的人来探讨。《收租院》的创作受到了苏俄的影响，现实主义的手法都是苏俄的。在今天看来，《收租院》的艺术未必很好，它的艺术性来自于它的政治性，按当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尺度看，它是不错的，这在今天看来就另当别论了。

我们研究艺术，其核心是研究它的真，是真实，因为艺术不可能给它一个标准的价值评判。艺术的美丑可能因个体审美的观念和角度不同而不同，很难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判断。但是，“真”则不同，它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艺术要捕捉到人性中的真实，要留下人间的真实。真实的对面是假，艺术要以真实的东西去揭露虚假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希特勒法西斯的“艺术”就很不错，还有就是苏共和中共的“艺术”，但它们不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它们不符合艺术的本质要求——真实性。它们只是巧妙地借用了艺术的技艺和审美的外衣，其目的是要达到一个虚假的东西。

问：你知道当年创作《收租院》时有多少事实依据？



牟：没有，全部是假的！造假的事实依据倒多得很！刘文彩本是一个大慈善家，一个很慈善的人，在大邑县做了很多好事。我们不去记人家的功，反而伪造一部历史。

问：你怎么知道？

牟：我作过详细调查。比如，在开那个学术会时，就有当地人参加我们的会议，也有很多社科界的人士参加。四川社科院就有人在作这个研究：《收租院》为什么是假的？现在人们已经觉醒了，地主庄园造假这个事十几年前就真相大白，比如说刘文彩的“地牢”、比如说坐“水牢”的冷月英，全部是子虚乌有凭空捏造。“水牢”是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而造假，《收租院》也是如此。这同重庆的中美合作所造假是一样的。共产党那一套宣传没有什么是真的，唯有造假是真的，唯有整人是真的。为了整人他们不惜造假，把一盆盆污水泼在别人身上。宣传部就专门干这种事，德国法西斯也是这样，比如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

问：你研究《收租院》这么多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牟：一个荒诞体制下的荒诞产物！

采访时间：2013年3月16日

地 点：四川美术学院



泥塑《收租院》一直是四川美院的最大骄傲。
图为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赠送《收租院》小样给前
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网络图片）

谎言越美丽毒害越大

讲述人：龙实

原四川美术学院院长



问：龙院长，你了解《收租院》的事吗？

龙实：这事最初是地主庄园发起的，后来美院加入进去了，是赵树桐、王官乙带领一些学生参加进去一起搞。搞出来之后他们为版权争斗，到底是美院的功劳还是庄园的功劳？我觉得，《收租院》雕塑美院自然功不可没，现在美院准备专门搞一个展览室，作为一个历史的作品留念。不过，为这事打官司我看有点无聊。

问：《收租院》是一个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对此你怎么看？

龙实：我不了解具体情况。当然这个作品是典型化了的，肯定不是绝对真实的。它是个艺术品，也是个宣传品，目的是为了宣传。《收租院》是不是完全反映历史真实，我没有认真了解调查过。不过我肯定，这个东西是拔高了的，绝对不会是原形。但是拔高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离谱，我不清楚。艺术品是允许加工的，但如果太离谱也不妥当。

问：现在《收租院》主要强调它的艺术性，如果它的艺术性是违反历史真实的，如何来看待它的艺术性？

龙实：这事怎么说呢？当然它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我没到过收租院，没有对当地的农民进行过了解，所以它的真实性我一直搞不清楚。我看了作品，哟，地主这么残酷呀！但它的真实性我没研究过，只是觉得里面肯定有艺术加工。

龙葵：（龙实之女，1951年生，华西医大教授）：艺术？中国一贯是艺术为政治服务。

龙实：艺术为政治服务已经被否定了的。我听说邓小平对此都不同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老毛不是这么讲吗，艺术是有阶级性的，属于党派

的。毛泽东的艺术观就是阶级斗争观，他在安座谈会上的讲话，除了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还立得住以外，他的为政治服务是错误的。

问：如果《收租院》，像“水牢”一样是子虚乌有的虚构，同时它起了一种煽动仇恨和仇杀的作用时，你觉得你们学院和那些美术创作人员，还该不该为这个作品和这个艺术感到骄傲？

龙实：如果《收租院》是假的话，那就不对了，它就起了一种不好的作用。艺术必须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艺术的基本要求应当是真实，生活的真实。艺术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有些地方可以加工和强调，但其根本应当是真实的。如果生活都是假的，那就是假艺术、伪作品了。

问：如果这个作品本身完全是假的，但其艺术性又很强、很有艺术价值呢？

龙实：那就应当看它的社会效果了。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应当是统一的

问：如果它完全不真实，但它艺术效果又很好，是否还应当为它骄傲？

龙实：那应当否定！一个不真实的东西艺术性再高又有什么意思。

龙葵：希特勒就搞过很有艺术性的东西，但是很邪恶。

龙实：但我始终搞不清楚它的真实性怎样。

问：如果那全是一派谎言呢？

龙实：刘文彩这个人是有嘛。

问：有的，但如果其他全是编造呢？

龙实：谎言也可以是很美丽的，歪曲现实的东西再美丽也不美丽。艺术虽然允许加工，但如果离开真实，那么这种加工就成了一种谎言。

龙葵：真实性是第一位的，如果是虚假的，艺术越强迷惑性就越强。

龙实：美丽的谎言是不应当歌颂的。

龙葵：越美丽毒害越大！那些年我们家就被整得很惨，我为什么印象很深？就是搞《收租院》那一年，我们妈学校几个老师，回到农村度假，说了几句话，全部被整惨了。搞阶级斗争，《收租院》起了很大的作用。

龙实：阶级斗争是煽动起来的，我们过去在共产党教育下，认为阶级斗争是正确的，后来发现，不对，社会要和谐才能发展，不是靠成天斗争来发展。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天天讲”，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些年天天搞阶级斗争，祸国殃民。如果人类每天都相互斗，到最后，人类就毁灭了。我是文革之后才慢慢理解到这一点，现在如果还有人赞同毛泽东阶级斗争那一套，中国就完蛋了。我想，当年，《收租院》对阶级斗争、对文革是一种催化剂。

问：据说你们学院当年那些创作人员现在还很为《收租院》感到骄傲，你怎么看？

龙实：如果把谎言揭穿了就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了。为谎言而骄傲有什么意思？现在我不知道的是，《收租院》有多少真实性。首先要考证的是否是谎言，若是谎言，谎言越美丽越有吸引力，它起的破坏作用就越大。

采访时间：2013年1月20日

地点：成都市万科魅力之城

补记，龙实先生大约在2015年去世

这一对交租的婆媳，是《收租院》第四部分“逼租”中的人物，《美术》1965年第6期“《收租院》泥塑创作的构思设计”一文中写道：

“从水牢里活出来的冷月英同志（现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几次来看，有一次看到逼租里被抽佃夺田的婆媳二人中的老大娘，她说：‘我那时交不够租子，逼得无法，有时就捶胸跺脚，现在这个人还做得不够着急和心痛。’我们就根据她的意见把这个婆婆的动作改为捶胸跺脚。”

（《收租院》泥塑创作组）



把那不真实的东西， 作为历史上的艺术保存

讲述人：吴宏远

原刘文彩地主庄园展览馆馆长

《收租院》讲解员



问：我是重庆人，我了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强调阶级斗争时，重庆贡献了两件作品，在全国引起轰动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小说《红岩》，二是泥塑《收租院》。《收租院》一直在庄园里展出，当初与《水牢》并列为阶级斗争展览中最生动最形象的实物。现在《水牢》因其虚假没有了，但《收租院》仍在展出，这是因为它的真实性还是它的艺术性？

吴：我理解可能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过去它的影响很大，轰动国内外，因此现在作为文物来展示——他们现在还把它申报为国家级一级文物。第二个我想应该是一种艺术追求，它的艺术价值在中国雕塑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中西方雕塑艺术手法的结合，应该是从《收租院》开始的。因为西洋雕塑进入中国较迟，大概在五四运动以后，过去中国雕塑和西方雕塑各是各的，虽然也不排除单个作品中有两者的结合，但作为大型群雕，《收租院》是首创。《收租院》虽然反映的内容是中国，但更多是采用西方手法。

问：据说当初创作《收租院》时，其素材来自创作从员在庄园四周的访贫问苦，这是不是真实情况？

吴：实际上创作《收租院》是分为两个阶段：制作方案是一个阶段，制作雕塑是另一个阶段。美院主要参加制作。在（19）64年的下半年，大概在国庆节前，上面提出了要搞《收租院》这个雕塑。当时庄园管理同志被派下去访贫问苦，看怎样表现。毛泽东不是在八大几次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因此，在收集（素材）过程中应该说更主要是为了突出阶级斗争这个主题。所以，创作《收租院》是这个大背景的需要，不是自己想要表现什么东西。

问：也就是要符合上面的精神，相当于命题作文？

吴：正是。

问：创作人员去作过民间调查吗？

吴：去过啊，但时间很短，因为来不及了。他们来这里可能有十多天的时间，十多天的时间里要访贫问苦、要走访、要座谈、要进行讨论方案调整等等，然后就开始进行创作。

问：我们都知道艺术要来源于生活，要真实，可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能够收集到详细的资料来创作这样一个大型群雕呢？

吴：这主要是当初方案制作得很好。刘文彩不仅在公馆里，在其他地方也有收租点，不一定在收租院这个现场交租。当初开放刘文彩公馆后，就把这个收租院现场整理出来，摆了个风谷机、秤啦……简单的几件东西，展现一种场景。温江地区的宣传部长马力提出了从忆苦的形式，从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反映阶级斗争。那么，为什么不在这里制作地主收租农民送租的场景，来展现反映阶级斗争的主题呢？当时认为这个方案很好，一是当时大背景阶级斗争需要，二是这么大的地方摆个三、四样东西显得很空，不利于展览。所以，政治的需要加上展览的需要，决定搞《收租院》，就做了这个方案。地主庄园的同志在做这个方案时肯定在这个地方做过访贫问苦调查的，但主要是方案制作得很好。

问：我来过安仁多次，同老农民聊天，他们谈的当年收租的情况同《收租院》的展示完全相反，说当年交租时刘文彩对他们非常好，请吃饭啦等等，没有任何《收租院》里展示的情景。对此你怎么看？

吴：创作《收租院》时是为了表现阶级斗争这个主题，因此便把刘文彩作为一个代表人物，代表着整个地主阶级，名字安在刘文彩身上，张地主王地主的可能都加在里面。素材既有访贫问苦内容，但也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有些东西也可能是张地主王地主的，加在《收租院》里面。另一方面，农民的一些说法也不完全对，因为现在的农民找不到多少当事人了。再一个，当时刘文彩也不可能去收租，比如你去收租，你为了完成刘文彩交给的任务，有可能你的一些做法有点过分。当然，在某些事情上有可能刘文彩有点善行，比如：算了，这个租不收了。

问：我还了解到解放后交公粮逼得很凶，有一些逼供吊打情况。这不是出现在《收租院》里，而是出现在1949年之后。

吴：有这种情况，肯定有，但要看什么阶段。在五十年代初征粮剿匪时期，真的很残酷。建国初共产党刚来时他没得钱，粮食从哪来？他要巩固政权，没得办法，农民也好，有钱人也好，你必须把粮拿出来，作法肯定有很多过火的地方。包括在文革和三年困难时期也有这种情况。但后来不是很突出政治运动时，交公粮是比较顺利的，不是在特殊环境下，农民交公粮应该还是比较好交的，因为它不涉及个人的利益，是集体的，生产队在安排，粮食集中在生产队保管室，不是你的，是生产队的，交后剩的农民才来分，应该还是比较和平的。

问：《收租院》1965年10月初完成，紧接着制作片子，全国播发。我感觉《收租院》当初对煽起仇恨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这是肯定的！当年我就是招讲解员进入庄园的。当年我就站在《收租院》展台上进行讲解。当然讲解词都是写好的，一个字不能动。下面观众愤怒，是的，它是起到了那种作用，肯定，在阶级斗争教育上提供了重要的炮弹和素材。

问：1966年文革爆发时，第一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疯狂斗打地主、杀地主，“黑五类”中地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首当其冲，我认为对这种疯狂仇杀《收租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你认为呢？

吴：岂止这些哟？国家主席都要遭！阶级斗争为纲，非常残酷，已变态了。不仅地富反坏右，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凶了吧，都要整死！彭德怀、贺龙这些大元帅，停药停水，得糖尿病还要给他打葡萄糖。岂止是对地富反坏右？

问：回到雕塑艺术上来说。《收租院》人物形象很生动，其艺术价值姑且不去否认它。但是艺术本身要来源于真实，而《收租院》目前看来它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它创造出来后又起了一个煽动仇恨的作用，就是说它虽美但却起到了坏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来看它的艺术价值？

吴：《收租院》的真不真实看站在哪个角度来说。如果站在刘文彩和农民的关系上看它有很多不真实，但如果把刘文彩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表，它反映的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对抗性矛盾上，它又显得比较真实。比如风谷机加飞轮的事，刘文彩加没加呢？没有。但刘文彩的一个亲戚是加了的。第二，过去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收租院》突出阶级斗争的主题，曾经起过不好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有艺术价值，在阶级斗争被抛弃后，我们又来看它时就不看重它阶级斗争教育的主题，而看重它的艺术性。这样，它的艺术价值就上升了。应该说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重点。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听了你的解释，《收租院》虽然不是反映刘文彩与当地农民的矛盾，但却是反映解放前地主和农民的矛盾。那么，1949年前中国地主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收租院》里所反映的这个矛盾吗？第二，《收租院》现在的展出客观上仍然给人一种阶级教育的作用，你看：地主把农民的鸡抢来了，娃儿拿来卖了……它不仅本身时时刻刻在透露一种艺术背后所展示的东西，解说员也还在解说刘文彩当初怎样怎样在剥削，这样，它不可能使参观的人只是纯粹在欣赏一种艺术。所以，我觉得《收租院》还在进行教育，也就是说阶级教育客观上仍在继续进行。

吴：我觉得他们现在解说的角度不大对。现在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说：一，当初怎么会产生《收租院》这个作品。二，从艺术欣赏这个角度去讲解。

问：还有个问题，我读到当年的创作和制作人员近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虽然时代早已变迁了，但他们仍然很欣赏他们当年的丰功。比如说《收租院》拍摄者陈汉元在两年 before 发表文章，很欣赏他的文字被选进了小学教材，如“斗啊斗，吃人的口”，等等。他说，很少有记录片的文字被选进小学教材，他觉得太荣耀了，很自豪。王官乙两年 before 也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收租院》永恒的魅力。对他们的这种迷恋、沉醉和自豪，你怎么看？

吴：陈也好，王也好，当年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又亲自参加了这个创作，到了晚年，仍然对过去所做的事情津津有味地谈论它，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肯定它，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有人问到知青的事，知青运动是“左”的，被否定了的，但是若问到我，我也参加过知青，我也会津津有味地谈。他们从那个时代过来，亲身经历过，若干年后还比较留恋，在一定程度上还跳不出那个时代，跳不出这个框框，站到另外层面来看待一些问题。

问：如果他们意识到他们创作的作品在客观上导致很多人头落地的话他们会怎么想？

吴：你这个说法我不赞成。不是《收租院》的创作导致了这个问题。当然，毫无疑问，《收租院》的创作起到了对阶级斗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是整个社会大背景，整个是共产党执政，问题的根源在这个地方，不能全归于《收租院》，只能说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我举个例子。小学我上学时路边就有《收租院》的图片展出，同时还有些什么石磨沉塘等等，很多同学看了义愤填膺。受此影响（教育），后来在批斗会上这些同学因此下手打人非常狠。他们直接就是受的这个影响，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吴：就是没看过《收租院》图片的人在文革中他也要来打死人，比如说在偏远的地方，他没看过《收租院》的图片他也会打死人。只不过《收租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它不是直接的，我认为是间接的。

问：你认为《收租院》会长久展出下去吗？

吴：我认为会。

问：为什么？

吴：因为它现在更多的是以创作的艺术形式出现。你想，它都到了报送国家一级文物的地步，咋不展出下去？

问：那现在仍然还是按原来的解说词来解说吗？

吴：这个不大对。我对他们说，现在这个庄园，是阶级斗争教育的需要才把它保存下来的，否则，它早就损毁了。不过现在已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就从另外的角度保存它。比如，庄园建筑非常不错，《收租院》也代表了中

国美术雕塑史上比较好的作品，所以，我觉得现在更多地从建筑艺术角度，《收租院》艺术这些方面来介绍比较好些。我还自告奋勇地说，干脆我来帮你们重新写个解说词供你们参考。

问：但有些部分可能很难写，比如说那个龙床，解说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来打造的，作为刘当年骄奢淫逸的证据，但实际上它是解放后六十年代最困难时造出来的，因为我遇到当年造床的两个匠人。这个解说词很难写呀。

吴：这个也好处理，是怎么回事就真实告诉观众，不要也像过去那年代蒙倒整（欺骗）。就说，刘文彩那张床，因为解放之后打土豪分田地，把生产生活资料全部分给了农民，现在是根据管家的回忆复制的这张床。

（注：刘文彩孙子刘小飞曾撰文，说1949年前他曾在庄园住过，也曾在摆放龙床的那间房里住过，但从来没见过那张龙床。）

问：也就是说刘文彩有这个床？是因为打土豪后分给农民了，所以才复制？

吴：我是问过这个这事，为什么要搞这个床呢？这床明显和这间屋不协调。这个间屋大概只有十四五平方，床就占了九个平方，显然不合适。过去庄园管理有个叫舒志宾的还在，是他们设计的，我就问，你咋设计的这间床？

问：现在庄园的展出仍然能够起到阶级斗争教育的客观作用，当然，现在可能更大的是经济效益上的作用了吧？

吴：对这个问题展览馆自己也要有个把握，现在更多的就是我说建筑艺术，展出的内容就要退出来。当然，不管怎样解说都无法回避这段历史，都要遇到，只不过尽可能回避它。对刘文彩应当客观地看，我说，小飞你成天说你爷爷是善人，可他家里很快积累了这么多资产，从哪来？这里面肯定有剥削，也有巧取豪夺。当然，也不排除刘晚年做了很多善事、好事。我说刘文彩晚年的境界还是很高的，比如对安仁的建设、修文彩中学等等。有多少地主有这么高的境界？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贪官，那些钱来得不正，他敢不敢拿出来（做善事）？都转到国外去了嘛。

问：据我所知，很多老农民，包括刘文彩的佃户、长工，提到《收租院》都很气，都骂。你怎么看？

吴：首先，因为刘文彩在当地群众中的评价还是比较好的。刘文彩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也不愿去做一些坏事，而尽可能多做些好事，所以，总体上老百姓对他的评价比较高。第二，这个地方被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战场，当年在这里蹲点的领导比较多。他们一蹲点，在有些做法上就比较过火，比如，出身不好的，就不准在这儿住，把他们赶走了；又比如，开会多，开会一多，抓出来的所谓“坏人”也多，所以当地群众对此比较厌恶。是这两方面的因素。

问：还有个问题，吴馆长，这么一个全国知名的展览馆立在这里，又是以本地为其素材和背景，当初甚至说是以真实史料为背景做出来的东西，但是，它恰好又受到当地人的反感，这种情况你是否觉得有些尴尬？

吴：当然有人反感，但要看哪些人反感，应该说不带普遍性。

问：他不是对庄园反感，而特别是对《收租院》反感，觉得那是编造的东西。人们都不喜欢编造的东西。我参观过一些古迹和英雄事迹，当地人一般都会对此感到自豪，但在这里，我感觉到，他们不仅不为那骄傲的艺术品而骄傲，反而感到耻辱。我在采访中感到这是普遍性的，还不是个别现象。

吴：一般的群众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就是《收租院》真与不真。我觉得他们应该站得高点，毕竟《收租院》的艺术创作，特别是艺术上的中西结合，在雕塑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过去的东西已经变成文物，它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应该说需要保存，也必须很好地保存。农民不会认识到这个艺术价值，不会认识到它在中国雕塑史上的地位，他只是说：《收租院》不是这回事，编些来说。

问：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历史真实性。《收租院》继续展出，解说词该怎么写？比如说老大爷因交不起租被迫卖孙女等等，这都不是历史的真实。《收租院》这个艺术不是抽象派艺术，它是建立在刘文彩本人和他收租上的作品，原来的解说词说《收租院》是来源于真实生活的，但现在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了的话，应当怎样来讲解？

吴：你说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不对？整个讲话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但是有些东西他也在变。文革是个非常时期，是个被扭曲的时代，人的心理非常扭曲，表现出的东西不是很正常。不是我们站在今天来看这个问题。当时，对“不真实”有好多人都敢说？非正常时期被扭曲时代产生的不真实的东西，今天只能把它当成历史上的艺术的东西保存下来。至于我们讲解介绍时应该怎样把握，那是一个角度问题，应当把它把握好。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7日

地点：安仁镇建川博物馆

没有什么艺术性

迷人：王康

著名学者



四川是抗战大后方，中共一直在这里花大力气清除国民党影响。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一向紧跟毛泽东。在他治下，四川在60年代除了饿死1000多万川人外，还紧抓阶级斗争，以至60年代四川几乎同时出了《红岩》、《收租院》、《抓壮丁》三部红色经典。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确有其社会土壤。

1949年后文化归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势必否定传统，拒绝西方。我们都清楚，毛共强化阶级仇恨和新社会无比美好，核心是毛个人崇拜下的人民拜物教。如果要梳理，恐怕得从法国大革命算起，当然直接源头是苏俄布尔什维主义。苏联是红色文化发源地，宣传画、雕塑、戏剧、诗歌……凡大众“喜闻乐见”的都首当其冲。马克西莫夫、穆希娜对中国影响至深。现在中央美院的基本教材仍然没有摆脱苏俄美学思想。

《收租院》从艺术上来说，走的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道路。就像土改的样板是在苏联一样，《收租院》是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是1934年苏联作家大会高尔基代表斯大林所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种，绝不是中国艺术传统，也不是四川美院雕塑系心血来潮。

俄罗斯曾有以托尔斯泰等为代表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它反映的是俄罗斯真实的社会生活，而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则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为什么说它是一种伪现实主义？因为它是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来进行创作，不是反映生活本身、不是真正的现实。甚至是对现实生活完全相反的扭曲。

中国毛泽东时代的那些所谓艺术家们，从前苏联那儿学来这一套伪现实主义，而且是没有学到家的赝品，一种拙劣的模仿。他们只是投合毛共中国革命性质（农民造反）的需要，响应阶级斗争号召。所以必须凸显压迫和受苦的线条，刻划仇恨和愤怒的肌肉，表现反抗和被救的眼光……这些也都带有某种人性，不

难得到那个时代的强烈共鸣。——当然都被纳入特殊的意识形态牢笼，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中心服务。

反映农民的悲苦和仇恨，从构思到创作都没多大的难度，毛泽东时代的那些艺术家们，对这种题材太熟习了。那些泥塑也说不上有什么艺术性，其概念化、脸谱化的痕迹很重，为政治服务的色彩很浓。共产党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又拒斥西方文明，它能创造出什么真正的艺术？在过去几十年里，音乐、绘画、雕塑、文学，甚至建筑，有哪些是可以传世的艺术佳作？

从艺术形式上来说，音乐还有些抽象，但版画、雕塑就有很强的直观冲击力，这也就是泥塑《收租院》比其他阶级教育宣传品影响大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它的艺术性无比辉煌。

采访时间：2013年3月16日

地 点：重庆市沙坪坝



《收租院》第七部分，反抗

《收租院》雕塑的写实技法看上去比文革中后期那种强调英雄主义的正面气概的“高大全”的形象要生动，但那种京剧“亮相”式的用符号化的动态刻画人物所导致的概念化的弊病已见端倪，由于它承载的叙述故事，表现阶级矛盾的使命，尤其由于它所依据的阶级划分性格分类原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阶级关系，所以这么多雕塑貌似人物众多，形象、年龄、性别都丰富，实则性格简单重复。（邱志杰，《与〈收租院〉相关的话语分析》）

它就是一个写实主义

讲述人：江碧波

著名美术家。曾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绘画系主任、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问：江老师，你到大邑县看过《收租院》吗？

江：哪里用得着，《收租院》的创作我也参加了，比如临摹、制作。那时我毕业不久，同赵树桐、王官乙他们都是同代人，赵树桐只比我大几岁。我还带着这些作品到加拿大参加过展览。

问：你觉得《收租院》的艺术价值怎样？

江：《收租院》是一个写实主义的作品，表现力比较强。它当时影响很大，后来在国际上影响也大。它有艺术性，这是毫无疑问的。

问：有人说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典范。

江：谈不上！什么“中西合璧”？只能说它受了国外的影响。艺术上它吸收了苏俄和罗丹，当时苏俄的影响很大，俄罗斯的绘画和雕塑都是相当不错的。很多有名的作品，历史苍伤感都很强。我们当时主要就是学俄罗斯。《收租院》的手法是写实主义的，它从艺术上来说也没什么不得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写实主义，而写实主义是雕塑的一个基本功。不过，它当时结合了阶级仇恨，尽量地夸张刘文彩的丑态，强调贫下中农如何受压。艺术上成不成功呢？它达到了这么一个宣传效果了。

问：我走访过当地一些知情人士，他们谈到的情况同《收租院》雕塑反映的情况刚好相反。

江：所以说，这多么糟糕！这就要涉及一个问题：荣誉和崇高。不能把荣誉和崇高划等号。

问：我有一个感觉，我们有些艺术家，他们做的很多事，恰好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江：说得好！客观上正是如此。历史还要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我们中国现在是文化倒退，一个是信仰缺失了，一个是人生目标没有了。现在是物欲的东西战胜了精神的东西，很可怕。绘画上也是在宣扬、引导、迎合这些物欲的东西。

问：有些艺术家，在阶级斗争年代时，为这个政权服务，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至今不仅不悔愧，还为他们当年的辉煌津津乐道。现在一些艺术家们则是丧失了理想和崇高，一心追求物质，这两者组成了我们艺术家几十年的人生。不知江老师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江：不是同不同意，事实就是如此。所以，这次我的片子出来（注：指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介绍江的专题片《大家》），不少人很感慨：起码还有点正能量。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不能起码的良知都不要的，一味的搞低级趣味。搞艺术的人，不要太势利了，还有，不要太钻营了。

我现在特别喜欢做关于大自然的东西，大三峡、大西南、大生态，这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它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东西，而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和谐。

采访时间：2013年2月16日

地点：重庆市巴南区

一入收租院，
难忘阶级仇，
大邑土豪恶霸，
暴发一家刘。
水牢地牢连比，
长枪短枪无数，
随意断人头，
苦海穷人血，
粮仓地主楼，
飞轮转，
弹鞭动，
鬼神愁。
荒淫无耻，
佛殿金钟伴玉瓿。
转瞬人间换了，
活把阎王骇死，
万众竟来游。
教育耿千载，
风雷震五洲。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来大邑参观收租院成水调歌头
一首书出以为纪念

郭沫若



2011年3月8日，“新中国美术经典——再现收租院大型雕塑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隆重拉开帷幕。《收租院》继1966年首次进京之后，时隔45年再次进京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1966年郭沫若的诗到2011年收租院北京再现辉煌，45年过去了……

郭沫若的诗一直是庄园展出的亮点和骄傲，至今仍醒目地悬挂在墙上。

搞《收租院》明显的 政治动机

——温江地区大饥荒调查者
东夫先生采访录



问：东夫先生，我拜读了你关于温江地区大饥荒调查的专著《麦苗青，菜花黄》，你当时是怎么想起去做这个事情的呢？

东：是一种历史责任感，我认为这一段历史太重要了，可没有人来写它。我不愿意它被岁月淹没了。我们应当保留一个民族的记忆，而且这个记忆是我们民族非常重要的记忆。大饥荒在中国的历史中、在中共的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笔。而且，这个大饥荒在任何体制下，都发生不了，它只能在共产党这个体制下才能发生。这就是一个人祸。大饥荒是这个体制制度性恶果的一个经典表现，也是共产党最忌讳的一件事情。他们极力想要抹杀这件事。我认为不能让他们抹杀，就要记下来，我写这本书，就是要“立此存照”。

问：你搞了很多年？

东：我是1996年开始搞，从调查到收集资料到完成，总共两年时间。

问：你书中很多资料很详细，也惊心动魄。特别是逼粮。逼粮从统购统销就开始了，饿死人也从统购统销就开始了。

东：对！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对大饥荒，不能孤立地去看，否则你是看不清它的来龙去脉的。大饥荒跟建国之后的整个粮食政策有关。四川省的粮食征购，最高的时候还不是大饥荒时期，而是1954年、55年、57年，也就是统购统销的前期。高征购加上集体化，生产就越来越萎缩。1954年的高征购一直到八十年代都没有打破。生产萎缩又要高征购，农村的粮食紧缺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到了大跃进时候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只要再多征购，肯定就饿死人了。但是，大跃进主要是军事工业大跃进，是为了实现军事上超级大国的目标，包括原子弹、导弹呀等等。大跃进的核心是重工业，重工业的核心是军事工业，整个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当局很清楚为此是要饿死人的，包括老毛，包括中央，都非常清楚，如果不惜一切资源搞军事工业，肯定要死人。但他们觉得，死点人值得，因为他的政

治哲学就是毛主席说的：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也是很正常的。为了达到一种政治目的，死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就是这样，所以他并不把死人当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死一点人，完成这个国家的军事工业现代化是值得的。他们从来没有人权这个概念。只是，当局没料到会死那么多。他们本来觉得死几百万很正常，但没料到居然死了几千万。这下他们才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了，党内人士也觉得祸闯大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庐山会议彭德怀首先站出来说话，一直到大饥荒结束以后七千人大会，整个中央政治气氛一下子就转变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受到了强大的挑战。毛泽东在大饥荒之前，他在党内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反右，主要是对外，是针对党外人士和少数的党内人士，总的目标是党外，党内没有怎么整。所以，反右并没有在党内造成很大的分裂。真正在党内造成分裂的是大饥荒。彭德怀这个事情出来，一直到七千人大会，矛盾基本上就公开化，公开化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就急剧下降。他搞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恢复和巩固他的权力。这是搞文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所以，不了解大饥荒就不了解文革是怎么发生的，不了解毛泽东为什么最后会走到文革这条路上去。

问：包括他竭力提倡阶级斗争这一点？

东：正是。他要转移矛盾。因为有个很现实的问题：过去国民党执政，一切社会罪恶都可以归结于执政党。现在共产党是执政党了，既然你当政，国家出了问题当然你来负责。共产党执政后，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总不能好事就是你的，坏事就是人家的。你是一党专政，在这种情况下，出了问题，尤其是像大饥荒这样重大的灾难怎么办？那就肯定要找个替罪羊。制造阶级斗争，就是把所有的罪恶，所有的灾难，全都推到阶级敌人身上去，从而摆脱了执政党的责任。

问：那当时阶级敌人是哪个呢？

东：地富反坏右嘛，还有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基层干部。就是这些人在搞破坏，所有的罪恶都是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前都在反复地整他们，随便什么事出来都是整他们。比如，为什么饿死人？就是队长等多吃多占。

问：在这种情况下推出刘文彩，或者重点推出《收租院》是不是也有转移罪责的目的？

东：是啊，就像现在共产党要喊打日本一样，是为了转移矛盾。同时，当局要把所有的罪恶——从历史的到现实的——都集中到他们身上去。这样，共产党就可以既执政，又永远保持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它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却要占用这个社会的所有资源。所有责任都是人家的，好处是自己的。这很狡猾，却很成功，直到现在都很成功。

问：老百姓永远被愚弄？

东：共产党在愚民政策上是很成功的。这有两个因素：一是这个民族本身已经被愚弄了几千年了，它本身就有一种被愚弄的基因，我觉得“被愚弄”已经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一种基因了。奴性，缺乏自我意识……久而久之，文化上的基因就变成了生理上的基因。如果中国人跟美国人进行基因分析，我们很可能多一个基因——奴才基因。二是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奴化教育。宣传部，我父亲当年就干这个事情。洗脑，坚持不懈地洗脑！本来这些人身上就有那么一个基因，再加上坚持不懈地洗了五、六十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问：你看过《收租院》没有？

东：看过，文革前，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参观过。搞《收租院》是大饥荒后重提阶级斗争时期，它非常明显的政治动机就是要把大饥荒造成的恶果掩饰过去。于是，就重提阶级斗争。重提阶级斗争是1962年10月，八届十中全会。62年的上半年是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失误，这时候毛泽东很被动。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让毛很难受。到了下半年他就开始反击了——重提阶级斗争。这一招非常高明！在党内，它把反对派打下去，给他们戴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帽子；在社会上，它把所有的灾难归到阶级敌人身上。太害人了！那时地主富农大部分都还在，解放时二、三十岁的地主那时最多也就四、五十岁，虽然历次政治运动都在杀，但毕竟这个队伍还是很大，说他们搞破坏也还有其人。

愚民政策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生活很苦，但是比起旧社会来已经很好了。《收租院》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忆苦思甜”（即忆旧社会的苦，思共产党的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是一种经典文化教育，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旧社会，不清楚旧社会究竟是怎样，像我是1951年出生，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苦，所以他们一说，我就相信了，觉得虽然现在我们吃不饱饭，但还是有饭吃嘛，还是幸福嘛，比解放前好嘛，龟儿万恶的旧社会才是人间地狱，到处饿死人！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们就清楚，可是他们不敢说。我们当知青的时候，才听到农民说：球！解放前好得很！当知青时，我们傻乎乎的，让农民搞忆苦思甜，农民说忆什么苦，解放前比现在好得多，我们巴不得回到解放前。他们一忆苦就忆到大饥荒。那时候我们才了解了真相。我为什么一定要写大饥荒，因为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表述能力的人很多。而大饥荒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农民。城市里只要有点粮食供应，是饿不死的。比如，当时在没有任何副食品的情况下，一顿可以吃一斤饭，但一天只给你半斤，你会很饿，但饿不死。对农民却是完全把粮食给你抢完，给你收光！农民就只有饿死。这些大饥荒的主要受害者们大都是无知无识的农民，他们没有文化、无权力、没有公共话语权，你要让他们来写回忆录是不可能的。文革中那些老干部就不消说了，说起文革中的苦个个都是字字血，声声泪。右派写的人也比较多。唯独大饥荒，这一代

亲历者往往不能写，要么不敢写，大部分是写不出来。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因此，我要为农民代言，为这些没有表达能力的人代言，为这些无知无识、没有话语权、没有表达能力的农民，把这笔账给他们记下来。

问：川西的温江地区历来都是富饶之地，好像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这种饿死人的情况？

东：按历史的说法，在川西坝子就不晓得有饥饿这件事情！天府之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就是说，川西没有旱灾也没有水灾，这些都是完全解决了的。四川之所以称为天府之国主要就是指川西。川西平原，河道纵横，自动灌溉，根本不晓得饿肚皮是咋回事！当时闹得最凶的就说是四川遭了旱灾，旱灾主要指川东地区。就算川东遭了旱灾，川西平原遭什么旱灾？你找什么理由来说明这个地方还饿死人？连这个“不知饥馑”地方都是这样了，你可以想像其它地区。所以川西有它的代表性。我写这本书是以一种历史性的写法：写一个点，但是关照全局。通过解读这个地区，让后来的人，把这一页历史读懂。大跃进它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至于一些个案，比如饿死人，每个地方基本上大同小异。

问：我读了你的书，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收租院》中所反映的那些逼租的现象，在你的书里出现了，当然，它不是发生在解放前刘文彩时期，而是发生在统购统销到1957年这段时间。

东：共产党公开地讲，收粮食就是与农民的战斗，政府就是要先下手为强。这就是抢。收粮时，部队、民兵出动，收了就往仓库里运，一点不给你留！你看好残忍！所以也可以说大饥荒就是一场谋杀，因为他明明晓得要死人。

关于刘文彩，现在政府也没再提，因为他们清楚是乱编，包括安仁镇那些领导都清楚。所以，刘文彩只是在我们这一代被抹黑，后一代人中，比如90后，对刘文彩就没什么概念了。那个庄园也不再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了。

问：我在学校教书，我教的大学生们已经不知道有刘文彩这个人了，但他们还知道“周剥皮”和“半夜鸡叫”。

东：但是，我们要保留这个记忆，这不是为了记忆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明白，有一代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也包括刘家，他们当时也算社会精英，被共产党彻底消灭了，共产党掌权后，把传统社会这一代精英残忍地消灭了，这是共产党的一个罪恶，也要把它记下来。他们是怎么消失的，怎么被共产党掩饰的，这是一笔需要记的帐。有人说，现在否定共产党就是否定文革、大饥荒，反右……不，解放前就不说了，建国之后它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该被清算。从剿匪征粮清匪反霸土改减租退押……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在不断地杀人，不断地把全社会的精英全部消灭掉，从肉体上消灭掉。共产党夺取政权是打

着民主主义的旗号。它的革命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共产革命阶段，在抗日战争前，失败了。抗战后他就举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一直到夺取政权。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他们把社会人员组织起来，让大家来支持共产党。但是，共产党打下江山之后，翻脸不认人，把那些曾经给钱、掩护，帮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的人，抓起来就杀，把他们通通消灭了。这个罪恶，也是应该把它记下来的。

解放前我父亲曾是四川地下党，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他最深刻的感受：无颜面对一些人。

他给我讲了一件事：他原来在刘湘的部队里当一个团副官。刘湘的部队反蒋（介石）比较公开化，他们晓得你是共产党也不会加害。当时刘湘部队里很多人都知道我爸的共产党身份。有一次国民党清共，要求四川军阀部队一起清共。刘湘顶不住压力，也要抓共产党。有一个营长，好像姓黄，是我爸的兄弟伙。他冒着风险来通知我爸，让我爸往大盛方向跑。我爸跳窗而逃。几分钟之后，抓他的人就来了。解放后我爸就在温江地区工作，他刚解放就是正县级干部，但因为地下党的政治历史不清楚，只给头衔不安排职务。后来让他去崇庆县元通镇任工作队队长，负责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然后就是镇反。那个时候天天都在杀人。最开始是要地委批了之后才能杀，后来地委觉得这样杀得不痛快，就把权力下放了，工作队队长、团长就有杀人决定权。我爸有一天拿了一份杀人名单，上面的人他几乎都认不到，但他在名单上看到了那个营长。人家说那营长有几百亩地，按标准就该杀。我爸不敢不勾（名单），因为当时有标准，军队是营以上军官就要杀，国民党是区分部书记以上的杀。川西的标准是连长以上、保长以上的都算反革命，要杀。第二天公审，我爸坐在台子上，那个营长一眼就把我爸看到了。但是他素质很高，很理解，知道江山易主，各归其主了。他看了我爸一眼，意思就是说我认识你，然后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爸说他看他那一眼，他一辈子都记得，永远历历在目。这个人对我爸非常好，当年我妈也是地下党，有人要抓她，她跑到部队里来躲。那个年代，一个单身女人跑到一个单身男人那里，身份不好说，就只有说结婚。就是这个营长出钱在城里包了十多桌，突然说，今天下午给你们办婚礼。我爸妈当时还不知道。我爸妈当时都穷，是这个营长给我爸妈办婚，又通知我爸逃跑。但是，后来是我爸打钩把他给枪毙了。这事我觉得很是惊心动魄，如果拍成电影会很有意思。

问：实际上刘文彩这个家族也帮了共产党很多忙，最后被整成这样。

东：对，刘文彩当年也给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当时四川地下党有两个组成部分，川东特委和川西特委。川东特委管川东那边，川西特委就管四川和西康这边。川西特委的一个最大亮点就是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就像川东有个华蓥山游击队一样，川西这边有一个川康边游击队。这个游击队的司令部就设到刘文彩

家里：游击队的枪就是刘文彩买的。司令部那些头儿：李安楠、李维嘉、周鼎文等，都住在刘文彩庄园里。

问：据说后来李维嘉曾迫害救助过他的一个人，整得很惨。

东：对，那个人也姓李，也是安仁人。安仁除了刘文彩家，他们李家也是很富裕的。我看了《川康遗事》，书上详细写了怎么把他整死的。在川西地区的杀人中，李维嘉起了很恶劣的作用。四大运动（指解放初期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时，他搞了一个专管四大运动的七县联合指挥部。这个指挥部设在成都市，主要负责都江堰流域的温、郫、崇、新、灌、大邑……一共七个县。不少地主在成都有房产，下面搞四大运动时很多地主就跑到成都来躲避，乡下政府便发动农民到城市里来抓人，抓了人就由七县联合指挥部来统一处理。比如，大邑、安仁的人到成都举报，刘文彩窝藏了多少东西，于是就由七县联合指挥部出面处理。李维嘉就干这个事情。当时退押整死了很多人，刘元琮就是这时候被整死的。刘元琮起义后是当了共产党的师长的，但仍然被李维嘉他们逼死了（注）。对李维嘉他们来说，丑画刘文彩是他们最大的政绩，如果你把这个大政绩给他们否定了，他们成了什么呢？不成了一个历史小丑？

问：你书中的很多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我昨天又去看了一遍《收租院》的逼租，和你书中的情节对照起来，这两者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东：我看《收租院》的时候，还没去研究这段历史，但我当了知青以后，就知道他们是乱说的了。农民对我说，球！地主好得很，共产党才坏。我们给地主打工，顿顿都是酒顿顿都是肉，回锅肉这么一大片片的！哪个地主伙食好工资高我给那个地主干，那时有竞争呐！共产党是则是强迫你干、是武力抢。但我觉得这两者是没有可比性的，第一，从历史事实来讲，它是伪造，收租院本身就不存在。第二，逼迫的方式是乱编。就算有很坏的所谓“逼租”的地主，也就相当于是你住了我的房子该交房租，不交房租我把你赶出去，另外租给其他人。最多就是如此了。而共产党则是用政治和武力强权，直接把农民的产品掠夺了，这是强盗式的行为。其过程是：他们首先掠夺土地，用土改分给农民，可是，转眼就翻脸！第二年就搞集体化，又把土地抢回来。之后，一步一步把农民的土地全部剥夺完。到改革开放这一二十年，土地彻底成为政府资源。过去还不敢直接剥夺，弄成集体所有，后来改成承包制。到了改革开放，虽然没有直接否定集体所有制，但通过城市化来解决这个问题。城市化把农民的土地彻底剥夺。过去是集体所有，是属于这个村里的农民所有。到了邓小平时代改成使用权，就把所有权给剥夺了。最后通过城市化，又把使用权剥夺了。一旦城市化，土地就国有化了，农民既没有集体所有权，连使用权也没有了。所以，共产党为什么那么热衷

城市化，就是要让土地成为党产，然后不断地卖土地。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一点前苏联都没做到。在土地所有制这个问题上，当局现在比毛泽东还走得远，还彻底。为什么？太来钱了！所有都掠夺完了就掠夺土地。现在，土地卖得差不多了，怎么办？有办法，就在上面搞二次改造，再折腾一次，再捞钱。这种掠夺，古今中外少见！

最后再说一种掠夺：现在中国的地方债务有大概30到50万亿。美国，日本的政府债务也很多，但是，我们国家跟外国有很大不同，人家要记账，还要付息。中国政府的债务，不记账，直接归零！不管负债多少，他不怕，一笔冲消了！朱容基当总理时就这样搞过。这种作法直接导致货币贬值，百姓手中辛辛苦苦挣得的钱大幅度贬值。因此，这也是一种疯狂的掠夺。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9日

地 点：成都市白花潭公园兰园

注：刘元琮（1909—1951），四川大邑人。陆军少将，川军将领，系刘文辉之侄。1948年刘元琮任第二十四军副军长兼第一三七师师长。1949年底刘元琮在四川雅安率部起义，1950年初当选西南军政委员会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同年调任解放军第一八六师师长。1951年在减租退押运动中，刘元琮被打成了恶霸地主、反动军阀，受到批判，他的妻子也被错误判刑。刘元琮当年在成都自杀身亡。1985年，解放军成都军区给刘元琮平反昭雪，并恢复他起义将领身份。

我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这次创作实践。

政治性愈强的内容，应要求艺术性愈高，没有较高的艺术性，政治内容将随而被削弱。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阶级观点，站在社会主义的高度来看待这一政治性十分强烈的题材。

总的目的是暴露地主阶级的罪恶，而且要通过一个收租院和整个阶级整个旧社会联系起来。

（《收租院》泥塑创作的构思设计——《收租院》泥塑创作组）《美术》1965年第6期）



当年创作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收租院》肯定是真实的

讲述人：王官乙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收租院》主创人员



问：王老师，你是当年泥塑《收租院》的主创人员，我这些年还看到你写的关于《收租院》的文章，《收租院》至今也仍然在庄园展出，它在国内国外依然很有影响，我很想了解你现在的一些看法和感受。

王：《收租院》到现在马上五十年了，五十年风风雨雨，它的故事比较多。现在外国人都还感兴趣，还在研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都有。国外还有人来写它，其中好多都是博士生，他们选《收租院》作为博士论文。我说，这个事不太好写，相当复杂。本来一件作品不应当这么复杂，但《收租院》不同。一个作品，过去几十年了，为什么一直有人研究，就是因为它比较复杂。

问：它复杂在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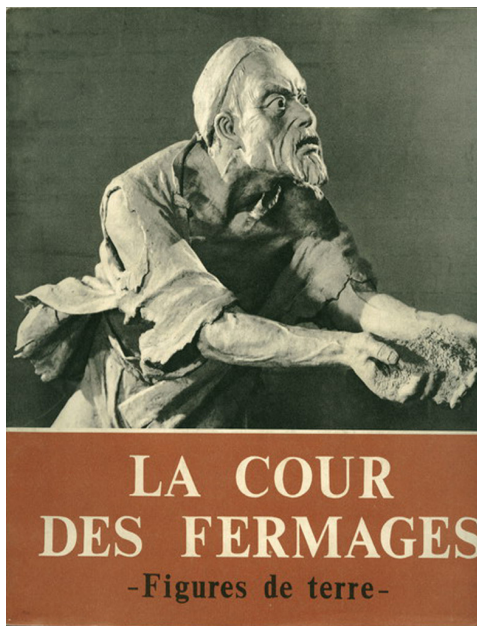


收租院于1965~1966年间在北京复制展出，引起巨大反响。其后曾在阿尔巴尼亚、越南展览，1988年以玻璃钢镀铜的复制品在日本巡回展出。（网络图片）

王：它的经历比较复杂。作品和涉及到的人，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政治背景，都复杂。它同政治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在《收租院》诞生之前，整个国家都在强调阶级斗争。毛泽东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看来，他肯定是把形势估计过分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作品？这个

背景就值得研究。第二个是这个作品影响很大。当时（六十年代）我们国家是封闭的，没有对外开放，在世界上也是孤立的。它在北京和大邑展出，不是一般的轰动，才展出一个多月，就有十多人参观，三个月就达到五、六十万人。登记要去参观的团体票是一千多万，观众们晚上通宵排队，人太多，在北京展出时中国美术馆已经无法承受了。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正式对外展出之前，先是中央领导和外国使馆的人前来参观。不少欧洲国家要求到他们国家去展出，如果不是半年后爆发文革，《收租院》早就出去了。《收租院》有几个阶段。刚展出时很轰动，文革期间一直很火热，文革后冷落了一段时间，因为不再讲阶级斗争了。后来从旅游这个角度又把它提起来了。还有就是有一个叫蔡国强的美籍华人复制了《收租院》，还得了大奖，又收到了很大的关注。



法文版的《收租院》

问：它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政治原因还是艺术原因？

王：两方面原因都有。政治方面它强调阶级教育——不要忘记过去——同阶级教育刚好吻合。艺术方面，是当时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雕塑。从美术作品上来说，《收租院》从内容到形式，人们都没见过。你提到罗丹雕塑，你知道罗丹雕塑一般都是单个的，最多几个人，而《收租院》是大型的群像，一百多个人！其雕塑手法，既有中国的、传统的，又吸收了西洋的。当时的美术协会负责人华君武认为它艺术性很高，政治性很强。《收租院》里面有很多感人的人物和情节，让人看了之后深受震动。特别是再经过讲解员的讲解，观众都要掉眼泪。

问：当年盛况空前，你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感受？

王：心情很复杂。牵涉到阶级斗争，这里面就很复杂了。《收租院》反映的内容，可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别人认为有问题。它在当时被阶级斗争这个政治所利用，可以说也好也不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毛泽东强调斗争哲学中开始的。

问：《收租院》诞生后紧接着就爆发文革，你觉得它对文革中仇恨和暴力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吗？

王：我觉得它们不相关。但是，如果有人这么看，也可以。《收租院》是

反映解放前地主和农民的斗争嘛。文革是走资派和群众的所谓阶级斗争。

问：你们创作时搞过民间调查没有？

王：我们去之前，地主庄园那边就收集了一些资料，我们去后也作过。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都访问过，包括刘文彩的管家、小老婆等都去找过，刘文彩的佃户也访问了好多家。

问：据说当年创作《收租院》是来源于真实生活，你认为是不是这样？

王：肯定是真实的，只有少没有多的。我们收集的素材，比我们表现出来的还要多。

问：也就是说，当年刘文彩剥削农民是确有其事？

王：当然确有其事。不过现在有些争论。

问：我在安仁镇时，接触了一些当年的老佃户、老长工，他们认为《收租院》是编造，对此你怎么看？

王：我不知道你访问的是什么农民。我去过安仁好多次，也访问过好多农民，他们的说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说，刘文彩这个人没有那么坏，但底下那些狗腿子坏得很。农民说这个东西是编造的，我还没听说过。

问：我在安仁，发现当地农民对刘文彩一点不恨，不是像《收租院》反映的那样。

王：我也不知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当年访问的农民没有说不恨刘文彩的。我认为，现在有股风——翻案的风。这股风有些是对的，该翻的就要翻，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右派，那就应当否定。但“刘文彩是个好人”、“刘文彩没有剥削农民”，我想这绝对不是事实。

问：当年你们访贫问苦是访问的哪些人呢？

王：一是庄园周围的农民，他们好些都是刘文彩的佃户，他们就说刘文彩收租很残酷。不仅说，他们还给我们表演当年怎么交租的，狗腿子怎么坏。我们有些照片就是他们给我们摆拍的。是不是现在他们看到形势不一样了，说法就不同了？这完全可能。但是有个基本的东西，就是，刘文彩作为一个大的恶霸地主，他是不是剥削了农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剥削了的！否则他怎么可能成为



Die Künstler aus Chongqing bei der Besichtigung von Trockenlehmfiguren im Luohan-Tempel in Xindu, 1965
The artists from Chongqing viewing the dry-clay figures at Luohan Temple in Xindu, 1965

图片英文说明：重庆来的艺术家到新都罗汉寺观看泥塑雕像。

一个大地主？

问：所以说你认为刘文彩还是很坏？

王：我是这样认为。但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像以前说的那样，那倒不一定。他是不是一点好事都没做，那也不一定。但《收租院》的任务，不是对这个人进行百分之百的评价，或者一分为二：他有哪些好哪些不好。

问：我在安仁遇到一些长工、佃户，他们提到《收租院》就骂，说是编造，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是什么骂？是农民骂？我还没有听到有人骂过或者说《收租院》不对的。前年我还去过，是陪同法国的电视台前去采访。那地方曾经有股风，上世纪八十年代，什么都把刘文彩打出来，什么刘文彩豆腐乳呀，刘文彩地主茶呀等等，搞旅游。我认为是一种炒作。另外，我认为里面有种不很健康的风气。最早翻这个案的是一本书叫《大地主刘文彩》，是一个叫笑蜀的人写的，我看了后很不同意。他说，刘文彩是个小土老帽，是《收租院》把他搞成了一个政治恐龙。刘文彩一万多亩土地，怎么会是一个小土老帽？

现在骂共产党的人也多得很嘛，骂得含血喷天。为什么呢？他们看到共产党的贪官污吏，腐败。这也是事实，也是该挨骂的，这个也不奇怪。但若客观地来评价共产党，他可能有他好的一面。说他不民主，说他一党专政，也可以这样说，但另一方面，最近《参考消息》报道，外国评论，说中国这种作法有他独到的地方，他是成功的，是对的，他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如果像外国那样搞民主，中国还发展不到这么好，这么快。中国就需要这种强有力的领导，不要有反对党。所以，看法是各种各样的。对刘文彩也是这样，一翻（案）了后好像就不能说他的坏话了。这就像现在也不能说共产党的好话了——现在说共产党好的，几乎听不到了。说共产党不好，大家还谈得拢，若有人说共产党还不错，那就谈不拢了。一样的道理，在过去，谁会说共产党不好呢？都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现在说毛主席好的有几个呢？

我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学社会学的，没有对刘文彩几十年的历史作专门的研究。但就地主剥削农民这一点，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国民党时候地主收租是合理合法的，就像现在房子租给你你也要付租金嘛。问题是你的租金到什么程度？刘文彩的租金是达到七、八十呀。一个法国的记者就问过我，说现在国家要



当年正在创作时的王官乙

农民交公粮，同地主收租有什么区别？我说，有区别，农民的心情都不一样。一个是交给谁，二个是交多少。现在交给国家是百分之二十，那个时候交给地主是百分之八十。

问：你怎么知道是百分之八十？

答：我们调查过的，问过农民的呀。当然不是每一个佃户都是这样，根据田的好坏，平均七、八十，还不管天灾，农民怎么受得了。现在有人说，天灾了刘文彩就缓交或者不交，这个我就没有听说过。



当年的创作现场

问：交百分之七、八十？你是听当地的农民说的吗？

王：当然是，而且我们访问的农民不少呀，我们不是凭空捏造的。那些情节都是农民讲的嘛，比如他怎么收租、怎么验租。比如农民说，进门时有的狗腿子假惺惺对你笑、有的把你瞪着，你得规规矩矩的、有的牵条狗，弄不好就要放狗咬你。我们把这个情节收集串联起来，泥塑中就放条狗站在旁边，监视农民进门。

问：你们做了多久的社会调查？据我所知，你们创作才只有四个多月。

答：当地也有一个创作组，他们已经收集了一年多的材料，我们去访贫问苦，又收集了一些材料。

问：你们访贫问苦做了多久？

王：大概十多天吧。中途我们边做还边问。比如，农民进来看（有的还给我们当模特儿），我们就问他们，有的说，交不够租怎么办，我们只有把牛牵去（抵租），比如坐水牢的冷月英就说，交不够租子，我们还要托保长、乡长拿个名片去讲个情。

问：你觉得冷月英这些人当时是不是说的实话？

王：（沉默半晌）这个我就没有研究了。我去后问过一些情况，她不是一点根据没得，也不是编造的。这说起来话就有点长了。她是个劳动模范，这也不是假的。她就是在水牢这一点上，说得不是很准确。她是在生了娃儿坐月时，被箩筐抬到刘文彩侄子家丢到水里，人家取名叫水牢。那是在唐场，不是在刘文彩庄园。

问：给刘文彩喂奶的罗二娘是不是真实的？

王：她当时给我们讲，还把奶子给我们看，上面有刘文彩咬的牙齿印。我

怎么会不相信呢？但《收租院》里没有这个情节，只有拉奶妈的情节，因为拉奶妈就多了。我们亲自听人家讲的，交不够租子就被拉去当奶妈。

问：现在有人说《收租院》是编造，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王：绝对不同意！怎么会是编造？都是大量访问

农民材料中选来做的。比如刚才我说的，农民牵着牛去抵租，还有抽血哟，这些我们都没用。说地主庄园全部是乱编造的，可不可能？那么大一个地主庄园，难道是假的？怎么会是乱编造？人们去参观地主庄园时就说，唉呀，好奢华呀，有些人就说，唉哟，那个（龙）床哟，老子去睡一晚上死了都值得。

问：你们搞《收租院》时正是强调阶级斗争年代，你现在如何看待那个年代？

王：当时美国、苏联与中国对立，蒋介石又要反攻大陆。但是毛泽东肯定是把阶级斗争估计过分，更错误的是把阶级斗争理论用到人民内部。从反右起就是这样，把那些右派看作敌人——“地富反坏右”。这些右派现在看来都是人才，是很不错的人。这个很显然是个很错误的作法。但是，我们《收租院》是阶级斗争的“特产”，它同反右、文革搞的阶级斗争完全不同。为什么？因为它反映的是解放前地主和农民。如果解放前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都要否定的话，不要说共产党革命没得必要，孙中山革命都没得必要了。孙中山革命的目的也是要“耕者有其田”，要让农民分得到土地。

问：但解放后农民至今也没有得到土地。

王：怎么没有？得到了的。土改划给农民了的，我当时读书，到农村去体验生活看到过，农民高兴得很。只是说没有搞几年就开始合作化，人民公社，农



图中左一为王官乙，左二罗二娘，左三冷月英。
图片英文说明：王官乙为冷月英和罗二娘展示
根据罗二娘的故事创作的雕像。

民又失去了土地。

现在哪个要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比如笑蜀写的《大地主刘文彩》，他就认为刘文彩没什么，现在认同他观点的占多数。

问：为什么占多数？

王：我认为这同现在的这股风有关系。因为现在人们对共产党意见大，有人觉得，没有必要“解放”，不“解放”还好些。也有人说，现在的资本家比以前的还利害。我认为话不能完全这么说。资本家同地主是两回事，资本家有进步的一面，他参与管理，是劳动，同地主坐地收租不一样。

问：那你认为《收租院》是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地主同农民的关系？

王：我认为是真实的。这不是说我参与了这个工作我才这样说。在创作之前之后我都访问了大量的农民。

问：但是，我看他们写出来的那些材料，如像《轰天绝唱收租》这类书，他们访问的农民大多都没有名字。

王：有些有，有些没得。

问：对有名字

的农民有人专门一个个去调查落实，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比如对罗二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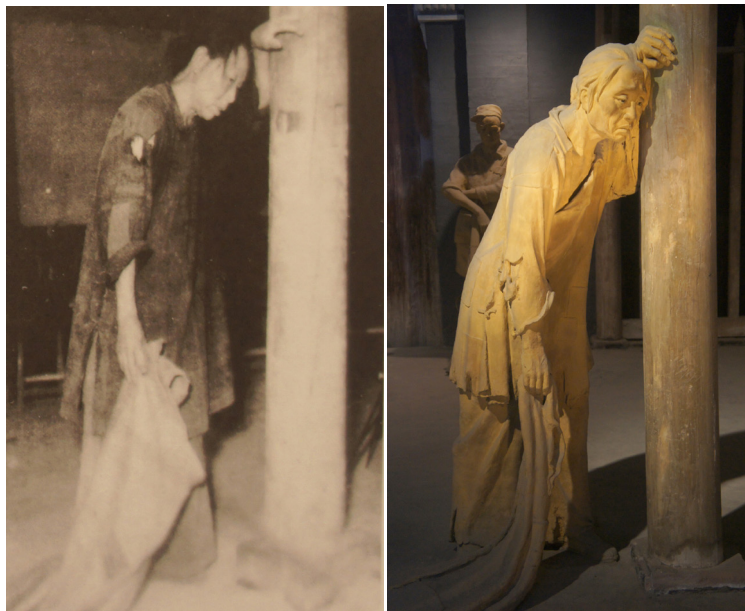
王：罗二娘早就死了，72年，我还去参加她的葬礼的。

问：你现在仍然认为罗二娘说的是真话？

王：是真话。不过现在看来，里面是不是也有些夸张，是不是有些地方不很真实，就像冷月英坐水牢一样。它有点道理，就像冷月英曾被丢到水坑里。“水牢”这两个字也可以这么说——被丢到水坑里关起，就说成是水牢吧，也没得好大的错。错就错在把它搬到刘文彩庄园。那是搞展览的需要嘛。

问：我采访了她的侄儿，他说罗二娘说的全是假话，他们罗家从没租种过刘文彩的田，侄儿已经80多岁了，你怎么看？

王：是，现在说造假的人多得很，我很少去评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



左图是创作《收租院》时艺术家看到的“新社会”农妇形像，右图为艺术家据此创作的“旧社会”受剥削的劳苦大众。

彻底的了解。但是我说《收租院》里面反映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是假的。我现在都这样说：没有编造，都是访问农民得来的。但，农民现在怎么说，可能就不一样了。

问：王老师，我有一个困惑：我到安仁镇去过多次，也访问接触了大量的人，包括普通老百姓，他们中没有一个说刘文彩的坏话，都是说他好。恰好他们对《收租院》有很多负面的评论。我是一个局外人，我觉得他们没有必要对我撒谎。他们的话为什么会同当年的宣传出现这么大的反差？

王：完全可能。可以作一个比喻，也许不很妥当。假如一个外来的人，台湾来的或者外国来的，你不知道他的身份，他问你共产党好不好，可以说，说共产党好的人不一定有。如果他知道你是台湾的、香港的、外国的，说不定他还要控诉共产党。他对不对呢？真不真实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不真实的一面。我个人看，应当客观地评价。我现在不好对刘文彩作简单的好与坏的评价。另外我不好对刘文彩这个人作全面的评价。但他是个大地地主，对农民剥削，这个是不会错的。他不可能没有剥削农民，那他的庄园是怎么修起来的？他那么多土地是造谣吗？地主起码占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吧。你地主占了那么多土地，要农民种，农民要交租，这就要形成剥削。

问：那你觉得解放之后到现在有没有剥削？对工人、农民？

王：（沉默半晌）我觉得对农民不存在（剥削），人民公社，谁来剥削？土地是国家所有呀。你种土地，只交税，交得不多，只有百分之二十。这个我反复问了农民，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同给地主交百分之七、八十是很不一样的。工厂同地主不一样，他是管理。地主是封建，工厂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先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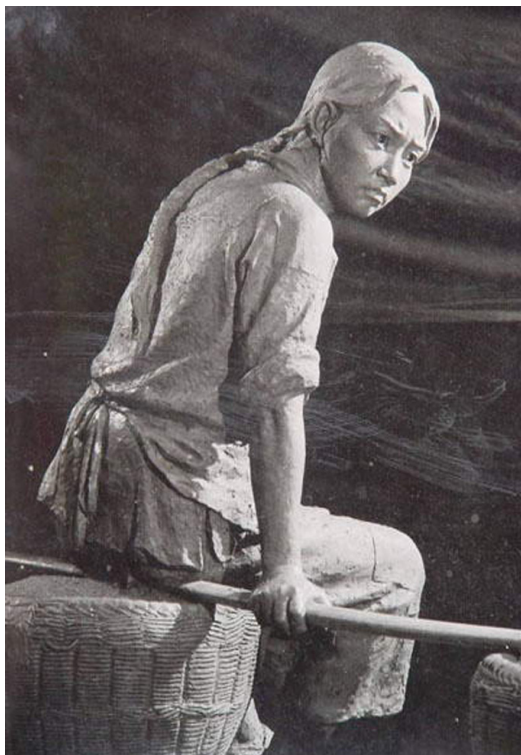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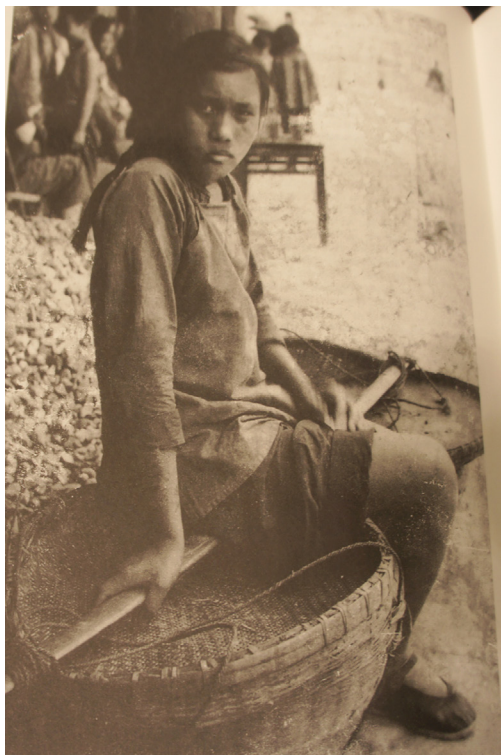


〔母女三人〕

王官乙说，有次，他在集市看到两个小姑娘，一个靠空背篋打瞌睡，一个在疲惫地发呆，赶快拍照，回去后用在牢房外等候母亲的两个小女孩身上。（摘自“《收租院》诞生过程”）

“爸爸给地主逼死了，妈妈又关进了监牢。一只空箩筐，两个小姐妹，天真的孩子啊，她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刘文彩，你把我关进监牢，你逼得我骨肉分离，可你关不住我们穷人的阶级恨！关不住我们穷人的血泪仇！”（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1965年安仁集市上的一个年轻姑娘，她愁苦的神情，含怒的目光等给了艺术家创作灵感。（左图）

艺术家据此创作并配上文字：“这位姑娘看到这些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怒火满腔。冤有头，债有主，穷人一定要报这血泪仇！”（右图）

问：你觉得《收租院》中有没有不真实的东西？

王：我现在回忆《收租院》里的所有情节，没有哪一件不是来源于真实。

问：比如说老太婆把鸡拿来抵租。

王：这个太多了，我刚才不是说，有把牛都牵来的，鸡算什么？刘文彩还不要。交不够租子要逼着农民把猪、牛牵来。

问：那把孙女带来抵租也是真实的？

王：这个……。给我们踩粗泥巴的那个人就是刘文彩的长工，他也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

（正在这时，王官乙的妻子看完病打来电话，只得赶快去接她。采访暂时中断。）

（下面是在返回美院的路上作的采访）

问：王老师，我从小受教育，老师、教材、宣传等等，都说刘文彩十恶不赦，我完全相信。这些年我到安仁，听到的则完全相反，竟然没有一个人说他坏。你觉得当年说的是正确的，还是现在我在民间听到的是正确的？

王：这就像说共产党是一样的。过去都说共产党好，唱的歌都是共产党

好、毛主席好，而现在没有人说共产党好。那共产党究竟好不好嘛？谁来作个结论？如果要我来作结论，我就说，共产党现在的的确腐败，但也并不是说他全部都腐败透了，也不是说每一个当官的都腐败。

问：还是那个问题：当年给你们说刘文彩不好的，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现在说他好的，是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王：这有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就像我们现在聊天，哪个还说共产党好嘛。大家在一起吹牛聊天，如果有人“我觉得共产党还是不错。”大家就要笑他了，说他说假话。但如果客观地评价，（共产党）那也不一定（那么坏）。外国都赞扬中国，经济搞得那么好，国力那么强大。这是哪个的功劳？还不是共产党的功劳。

问：王老师，当年安仁的农民说刘文彩坏是不是在政治高压下不得已？据我所知，当年安仁百姓都不敢说真话。

王：我觉得还不是政治高压。农民给我们讲起来，真不真实大不一样，那是带了感情的哟。比如，《收租院》塑成后，在当年的国庆节试开放三天。从邛来县来了六个老太婆，她们穿着新衣服，走了两天六十多公里路来看展览。她们一进门，举着棍子就要打门口那个狗腿子的泥塑，我赶忙拦住她。她说，我们当年就是刘文彩的佃户，当年我们来交租就是这个样子，把我们整得好惨。你说这几个老太婆是真的还是假的？她们是邛来县来的呀，不是大邑县的呀。我说，你们了解呀？她们说，我们每年都要交租。



冷月英讲起“坐水牢”泪流满面

接着，她们还没看展览就把收租的过程讲得清清楚楚的。我们请她们讲经历，她们个个都有一本苦难史，有个老太婆就说，她去给地主喂奶，自己的娃娃饿死在家里。这反过来证明，《收租院》是真实的。当然，在那个政治气氛下，肯定没得人说地主好，这就需要有人客观地去调查，历史往往是要第二代第三代人去写。

（注：邛来县距大邑县的安仁镇有近百公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不知这几个妇女是如何背负重租到刘文彩庄园来交租的。）

当年我们去采访刘文彩的小老婆王玉清，我们问她，她就不断认错认罪：“我们剥削农民，我们过的是剥削生活，我们是有罪的。我过去也是农民，但后来变质了。”现在（如果她还活着），她就不会这样说了。

问：你觉得《收租院》的解说词真实吗？

王：我觉得还是真实的，它只是在感情上强化了。那些入伍的新兵，给他们一讲解，唉呀，那个哭哟，哭得当场晕倒好多个。我亲眼见呀，那个是假的呀？是导演的呀？那些新兵家里就是农民，他就有经历，否则他怎么哭得那么凶。我在塑的时候都要哭了。

问：我听人说，就算刘文彩剥削，但他后来把钱拿来修了四川当时最好的中学；而我们现在很多贪官污吏则是把不义之财转到国外，从这一点上看，他们不如刘文彩。对此你怎么看？

王：这话可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片面。官员转移财产有没有？有，但有多少呢？另外，刘文彩是不是把所有的财产都拿来修了学校呢？据我所知，刘文彩家财万贯。

我们搞《收租院》也不是针对刘文彩个人，《收租院》里的农民，没有具体说谁是谁，但是刘文彩，那是点名点姓就是他，是塑的他的像。

前两年法国来拍摄《收租院》，在安仁现场采访了我，我提到刘文彩，在场的一个人突然厉声说：“不准提刘文彩！”我吃了一惊，怎么回事？这个人原来是县委宣传部来的。

问：为什么现在官方都不准提刘文彩？

王：不是不准提，而是要我不要去对刘文彩作评价，我也并不想去评价。刘文彩究竟怎样我其实也不清楚，以前提供的资料现在说是假的。真的、假的，谁去再调查？

问：你们这个作品是不是当时刚好符合上面阶级斗争的需要。

王：当然。但是，我们提倡的阶级斗争是解放前的，同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是两回事。他说的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内部、人民内部。比如后来红卫兵造走资派的反，那就是阶级斗争。我们这个不同，是针对农民同地主阶级，那是几千年的问题。

现在《收租院》是作为一个艺术品（展出），去年《收租院》还在韩国展览，当然，他们主要是从艺术的角度去看它。

问：但是王老师，当年在那种统治下，不可能有单纯的艺术。

王：也有，极少。那个时候也强调为人民服务。现在说共产党好话的不多了，大家在一起聊天，就说共产党如何坏、如何腐败，几乎没人说共产党好了。但是，是不是没人说共产党好了，共产党就坏得很呢？也不一定。

不过，解放以来，共产党的错误不少，划右派就划了好多人。文革连我都被整，把我关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包括搞《收租院》都是罪过，说我破坏《收租院》，在塑造过程中起反面作用，是阴谋家

野心家，是反共神童、漏网右派等等，一共给我戴了十六顶帽子，作为牛鬼蛇神罚我扫厕所扫了半年。文革后期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我又成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我对“五·一六”一无所知，但先把我抓来关起再说——关在学校，派四个人二十四小时看守我。另一个同我一块雕塑《收租院》的老师赵树桐比我还恼火（还惨），他被关进监狱，坐了四年的牢。

采访时间：2013年3月29日

地 点：重庆九龙坡区

采访后记

这是一段“支离破碎”的采访，当天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完成：一，四川美术学院茶楼；二，重庆医学院；三，从重医到川美的汽车上。

“支离破碎”影响了采访的连贯和深入。又由于一个意外的事件，原本打算进一步的采访不得不中止了。

在我作的关于《收租院》的所有采访中，王官乙先生是唯一肯定《收租院》的历史真实并且认定刘文彩剥削欺压农民的人。

他过去这样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

他的看法是否正确，我想，由读者和历史来评说。

我同他接触的感觉是，王教授主要是一个搞艺术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搞艺术的比较单纯质朴的人。政治太复杂，那些年的阶级斗争及其背景太复杂。学外语出身的我弄不懂，专业是雕塑的王教授要搞清楚可能也很吃力。

所以，还是沉醉在对《收租院》往昔辉煌的回忆和对眼下“艺术高峰”的自豪中渡过晚年比较好。

根据各级领导的指示，我们在工作中首先开展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解放军的活动，并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典型事迹学习。……宿舍里，床排成一条线，贴上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口号，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有空就大唱革命歌曲。

（摘自“抓思想，抓方法——《收租院》作者谈集体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美术》1965年第6期）

《收租院》是中国美术的耻辱经典（节选）

——我们能期待谎言艺术家忏悔吗？

程美信

（程美信，毕业于南开大学，曾旅居欧洲多年，曾任教于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兼大连美术馆艺术总监，TOM博客艺术总监，艺术独立论坛理事。被称为“中国独立艺术批评第一人”。）

《收租院》隐藏着与历史完全不符的巨大谎言。极权政治、谎言艺术、饥荒死亡、阶级斗争是这一“新中国美术经典”的历史实质。

2011年3月8日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了“新中国美术经典：再现《收租院》”雕塑展。尽管本次展览赶不上这组作品在1965年首次亮相京城那样，像一颗原子弹轰炸了整个中国。但是，在民生银行和专家学者们的精心策划下，犹如“唱红歌”运动那样掀起了小高潮，这组充斥历史悲剧和艺术暴力的雕塑作品，在当代传媒机器和包装手段的作用下，再现了它感人的谎言魔力。

在“新中国美术经典”光环里，刘文彩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吃人魔鬼，刘氏庄园成了血腥恐怖的人间地狱。在艺术加工的故事背后，却又遮蔽着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真实悲剧，它们上演了新中国一场场的政治劫难。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因为家庭成份和《收租院》逃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但最终逃不过《收租院》“牢记血泪仇”的宣传攻势，当地农民把他用绳索勒死，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这些，如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在现场讲座中的所说：“《收租院》反映了从我们比较愚昧的状态，再到觉醒后感到怒火中生的状态，然后我们做出决定要革命的状态”。不错，《收租院》激发了人们怒火中烧，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名义下，可以肆无忌惮地虐待、屠杀、侮辱地主反革命分子，类似《收租院》的新中国文艺经典作品所释放出的暴力能量，制造了一起起人间惨剧。阶级斗争中的暴力艺术，成功地塑造出类似刘文彩这一典型反面人物，使得更为残忍的、毫无人道的迫害运动变得完全合法化。广大群众在阶级斗争的恐惧、谎言暴力的洗脑

作用下，为了不再吃“二遍苦”，便开始疯狂地迫害所谓的“阶级敌人”。可以说，文革是一种集体恐惧的“狂犬病”，人们因为害怕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疯狂地表决心忠于伟大领袖，积极响应政治运动，不择手段地诋毁他人，甚至发展到父子、兄弟、夫妻、师生之间彼此暗中告密、公开划清界限的人人自危地步。

炮制《收租院》这一谎言作品，虽有土改、大跃进、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诸多政治因素，但艺术家的主体责任同样是不可忽视，艺术追求真善美的起码伦理至少遭到赤裸裸践踏，反而成了政治谎言、艺术暴力的肆虐工具。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赵树桐、王官乙以及一群美院学生接到上级指示，创作了这组充满谎言暴力的艺术作品。迄今为止，创作这组作品的大学教授和人民艺术家们没有一丝悔意，在他们的回忆和记述中只有“青春无悔”的辉煌岁月。然而，面对历史学家调研披露出的大量事实证据、大邑安仁当地人揭发当年被强迫捏造刘文彩罪状以及刘文彩后人一再的呼吁伸冤，《收租院》创作者们对自己的艺术犯罪行为始终避而不谈，却从不放过“再现辉煌”的作秀机会。这次展览是在民生银行商业推动和专家学者的配合下，再次上演了欺骗民众的历史谎言，表明政治阴谋和艺术暴力仍是中国上空挥之不去的幽魂。

文革结束后，有关《收租院》的创作真相陆续披露：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访贫问苦”，他们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找到谷能山，他也是刘文彩家的长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强健的身躯，对他那副壮实的形象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们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让他来出来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艺术家们用革命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他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很快叫民兵来把谷能山抓走。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有什么两样？更可笑的是，由于谷能山坚持实话实说，没有顺从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即《收租院》里的“风风匠”。

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创作了《收租院》系列造型作品，它逼真写实的舞台语言，塑造了刘文彩这一吃人的魔鬼形象，其个人名誉遭到恶



程美信同长工谷能山的孙子合影

意的扭曲尚且不说，问题在于《收租院》制造了谎言所带来社会暴力，给许多无辜者带来了不肯承受的灾难。今次展出，本应该向世人公布它的谎言本质和历史罪行，还刘文彩以及家人一个真实的本来面貌。然而，从炎黄艺术馆展出过程到专家讲座，完全不提它所造成的人道后果，反而一再地讴歌它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那些参与炮制《收租院》谎言艺术的当事人，洋洋自得地向人们炫耀他们的罪恶杰作。此外，还有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专家教授，不惜笔墨口舌在赞美《收租院》这一充满暴力谎言的无耻经典。这一切表明，没有灵魂良知的艺术作品，在审美形式与技法表现的包装下，不仅能够欺骗世人的眼球，同时还是强权暴力的政治工具。这里，不指望那些谎言艺术家们良心发现，转而主动忏悔和还历史一个真相，只能靠每个中国人的觉醒意识，认清极权谎言与艺术暴力的危害性。



《收租院》幕后策划者之一，作家、原四川省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为《刘文彩原形揭秘》一书的题词。

《真的阴魂不散》（代序）

马识途刊在《刘文彩原形揭秘》一书上的文章

刘文彩是大邑县的恶霸地主，罪恶昭著，罄竹难书，解放前病死，逃过了人民法庭的公审，但土改中仍定为恶霸地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想说的是，近年以来，翻案成风，有许多人一直有兴趣做翻案文章。……我想劝为刘文彩翻案的人，第一，某些封建思想，远没有从有些人的脑子里肃清，因此刘文彩的阴魂的确未散尽，有时就会附在你的贵体上发作起来。第二，千万不要借机发财，见利忘义，不要为一个什么品牌之类，便大事张扬，见一点小利，便忘了大义。何谓大义？一曰正义，二曰社会主义。现在不是在“讲政治”吗？有些人，包括某些党员，就该好好想一想，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到底为的什么？第三，奉劝有些文人，写起文章来要讲求实事求是，真要认真研究事实，不要学那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文人胡说八道。须知历史不容篡改，而且众怒难犯哟。

（原载《四川政协报》1999年7月1日）

差距太大，没有一个是真的

讲述人：李燕

美国密西根大学美术史博士生



李燕是生长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她选择《收租院》作为她的博士论文，专程来中国调查研究。

问：你是怎么想到选择《收租院》作为你的博士论文的？

李：我先是在美国看到蔡国强获奖的雕塑，觉得不错。国外的人，只要是搞美术或者关心美术的，大多都知道《收租院》雕塑，只是不知道刘文彩。我也是这样，我后来才知道蔡国强是根据刘文彩《收租院》泥塑创作的，于是我就来中国实地研究，把《收租院》作为我的博士论文。我已经来了一年多了，先在北京学了几个月的中文，然后来四川美术学院调查研究和采访，当然也去了安仁镇，我前后到安仁镇八次。

问：你这一年采访了多少人？

李：仅同《收租院》有关的创作人员和艺术家们都采访了十五、六个了，如川美的赵树桐、王官乙，刘氏庄园的创作人员李济生等。

问：他们怎么说？

李：我采访的川美的老师中，老的说《收租院》不完全是编造的，但凡是年轻一些的艺术家的，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参与《收租院》工作的，都说《收租院》是假的。我在调查研究中感到，因为我的身份，他们对我有所顾忌。

问：你问了些什么问题呢？

李：我问过王（官乙）老师他创作《收租院》进行过调查采访没有，他说他采访的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多星期，但是他参考了刘氏庄园工作人员李济生、周永轩他们的采访。我到安仁镇采访了周永轩，他是当年刘氏庄园办公室主任，也当过《收租院》解说员。我问他当年他们是怎样去调查的，他回答说，哪有什么访贫问苦，都是上面出题目，下面出技术。我还采访了李济生三次，他没有说

《收租院》是编造的，可能他不敢说。我问他当年创作《收租院》时他们的调查采访情况，他说，有长工说刘文彩当年做了什么好事和对他们怎么怎么好，“但是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写，不能说地主好。”李济生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时候我们也怕。”说了这句话之后，他赶紧说：“还是不要说。”我感到他现在还是怕，他说了这句话都怕。李济生对我的采访非常敏感，说的都是一些很“规范”的语言，小心翼翼的。我只要提到一些敏感的问题，他不是叫我去问王老师，就是反问我“王老师对此是怎么说的？”到第三次采访彼此比较熟习了时他才说了一些真话。

问：你觉得《收租院》的艺术性怎么样？

李：我觉得很不错，给人很真实的感觉，我的论文主要就从艺术性方面来写，当然也要提到它的创作背景等等。王老师曾告诉我，当年他们曾经想塑造一个刘文彩的女人，后来放弃了，原因是：怕一个漂亮的女人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冲淡了阶级斗争的主题。

问：你去了安仁这么多次，也接触采访了好多人，有什么感受？

李：都说刘文彩好，没有听说他不好的。刘文彩收租是真实的，但《收租院》里的故事都是编造的，没有一个是客观的，比如那些受苦的农民呀、喂奶呀，没有一个是真的。

问：你在这一年多感受最大是什么的？

李：是看那些资料同现实差距太大。

采访时间：2013年10月20日

地 点：四川美术学院

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收租院》

（节选）

仲维光



一，《收租院》在当时的影响和目的

在60年前后，中国饿死了几百万人（注，实际上是几千万）。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些松动，对民众的控制不得不放松了一些。但是，紧接着毛泽东就发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继续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毛泽东自己的权利。因此，1965年产生的《收租院》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个产物。

从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中国社会就奉行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收租院》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产物，它是政治统帅一切的产物。

这个《收租院》和当时的很多小说、电影一样，宣扬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一直所实行的那种阶级斗争、阶级消灭的思想。

《收租院》宣扬的是对地主阶级的仇恨。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对于一切有资产的人，对于一切在社会上可能对共产党造成威胁和影响的人的专制和仇恨。《收租院》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地主阶层或者这个群体都做了非常恶毒的丑化，以此来激起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仇恨。

《收租院》和当时的八个“样板戏”一样，成为典型的党文化宣传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暴发和推进，这几个作品起了重要的宣传和推波助澜的作用。1966年文革暴发后，红卫兵到四川串联，参观《收租院》成了一个重要内容。据统计，当时大约有上百万的红卫兵到四川参观过《收租院》展览。

在《收租院》诞生后不到一年，中国就暴发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几百万人惨遭迫害，很多人丧生。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收租院》产生的目的，就是为共产党政权服务，为了使共产党能够消灭任何不利于它们的族群。

二，《收租院》是典型的党文化作品

什么是党文化呢？从《收租院》、八个样板戏等党文化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党文化的根本特征：宣扬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的排斥、仇恨。煽动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使用暴力、灭绝、消灭。

那么，不再提阶级斗争，是否就不再是党文化了呢？不是。对一切不同思想信仰的人，采取严格的排斥、迫害及消灭，这便是党文化改变了的一种形式。所以，即便是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中国的党文化从来也没有消退过、改变过。正因为此，所以才会发生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一九九九年开始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

为什么党文化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呢？对此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中国百年来的问题和灾难，不是中国传统问题，而是共产党带来的呢？

要谈党文化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近百年来，人类历史上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近一百年来，人类历史上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两个极权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一是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希特勒的法西斯灭绝、杀死了几百万犹太人。他发动世界大战，使几千万人丧生。另一个是共产党极权主义。在共产党阵营里，对民众的迫害造成了上亿以上人的死亡。

单说中国，从1949年以后到80年代初，仅共产党统计的数字，就使我们知道，在中国被残害死了几千万人，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是八千万。

这个现象使我们看到，在近一百年来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就是极权主义——希特勒右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左的极权主义。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索和反省：这两个极权主义，为什么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人类究竟犯了哪些错误？要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很多人对此做了反省。

我讲讲两方面最重要的在知识上的反省。一个是在哲学上以卡尔·波普为首的科学哲学。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书中，卡尔·波普认为，是一种封闭社会带给人类这个灾难，而极权主义就是一种封闭社会。它是一种向氏族社会的反原，一种教条的、专制的思想方法，带给了人类的这种封闭性和一元的极权专制。

另一个是奥地利的犹太社会学家菲戈林，他从文化、社会上进行了反省。他认为希特勒和共产党的这种极权主义，追溯其文化和社会原因，可以说它是一种政治化的宗教，是一种宗教世俗化的产物。

这两点反省，我觉得可以带给我们一个结论：近一百年来最重要的问题是

极权主义问题，也就是共产党问题、纳粹问题。从西方思想家的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近代化、西化，也就是说是工业化带来的，而不是我们东方社会的那种传统专制，以及我们东方社会在经济上所谓落后带来的灾难。

只有在氏族社会才会有这种一个族群对于另外一个族群的彻底灭绝，这是氏族社会的文化特点。但是，它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为什么呢？我们中国的文化固然也有专制，也有黑暗，也有很多灭绝人性的地方，但是从战国以后，我们中国的先人对氏族社会的这种思想和文化进行了一种反省、思索与扬弃——我们已经扬弃了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彻底灭绝。

在战国以后，在中国的哲学里、思想里、文化里是什么呢？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是每个族群、每个阶级、每一群人里都有好人、坏人，重要的是在各个群体的人里，都要追求一种真、一种善来反省自己、休养自己。尤其是在儒家、道家和佛家里都有这些“修”的思想。因此在中国的文化里提出了“有教无类”。不要小看这个有教无类，这个无类就是说各个族群的人都可以经过教育来提升自己。

在古希腊社会的时候，确实也有对这种氏族社会的封闭性的扬弃。但是希腊思想的一种二分法，使得它后来与沙漠来的犹太教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基督教文化。这种基督教文化的二元性特点，使它造成了一元化宗教的排它性。中世纪出现了宗教裁判所，对于不同宗教和异端思想的迫害，以及对于异教的十字军征伐等。

西方社会发展到近代的进步，恰恰是这种宗教思想从政治和一般生活中慢慢退出去，而只还归于它的精神生活和它的传统文化生活中。这种退出，宽容就进来了。但是，最近一百年来，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使得宗教变成了一种世俗化，也就使得这种宗教的二元化思想重新在世俗世界里得到了一种具体的政治化的实现。这就是菲戈林他在基督教文化发展中，寻找当代这种极权主义社会根源的一个线索。他认为当代的特点是政治化宗教。

我讲这些想表明的是：党文化的特点就是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灭绝。这种灭绝，其思想根源、文化根源在于那种二元性的、对立性的东西。这种东西的存在正是近代化带来的结果。在中国接受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没有接受西方好的一面、宽容的一面、自由的一面。而恰恰把西方的宗教世俗化和政治化接受过来了。为此也就产生了像《收租院》这样的东西。

2011年“9.11”事件发生后，人们看到，共产党这种国家恐怖，和“9.11”以后出现的那种极端恐怖、个人恐怖是连通的。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一百年来，这些灾难、这些恐怖行动是近代化的一个产物。我们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当前世界这些现象，都可以看到党文化的问题，中共的极权主义依然是一种最

大的危险。

三，为什么说《收租院》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的宣传作品，它的特点是什么。

在第一个问题里我已经讲了，《收租院》宣扬的是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的仇恨和对抗，甚至号召人们去灭绝对方。《收租院》这个东西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相容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号召穷人把富人灭绝了、有这种思想的人把另外一种思想的人全部灭绝。

《收租院》这个作品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它的创作手法和中国传统的歌曲、小说，戏剧等有很大的区别。《收租院》用的是一种二分法，这就是：你信仰这个宗教的人是好人，不信仰的都是坏人。你是雅利安人你就都是好人，你是犹太人就都是坏人。这种二分法，在我们中国传统里并非如此。

第二，《收租院》用的艺术方法是一种完全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说完全政治化。所谓完全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就是说，如果你是坏人，你的脸谱，你的形象，你的举止在这个作品里都是丑恶的。因此，《收租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假大空，就是我们所讲的那种脸谱化、极端化、片面化，而这正是政治宣传的产物。

第三，《收租院》这样的作品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培养一种仇恨情绪，一种敌对情绪。在六十年代的《收租院》里，这种仇恨和敌对是针对地主阶级，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它又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但本质一样，只要你不符合共产党的思想，不符合对共产党的那种拥护和信仰，那么你就属于另外一个族群，这个社会就要把你灭绝，就要对你仇恨。《收租院》在这点上和到现在为止，宣扬的正是这种敌对、仇恨情绪。

而这种仇恨和敌对情绪，在共产党社会里从来没有灭绝过。

节选自【《希望之声》仲维光评论（海内外名家谈）】2009年12月27日



《收租院》中的“坏人”

这次创作自始至终强调“要党的事业，不要个人事业，要集体观念，不要个人杂念。”

做那个狗腿子时，我起先做得比较肥，后来，同志们分析这个人物，觉得处理成一个狂嫖滥赌凶残可恶的干瘦子较好。在大家的帮助下，从体型上突出他那伸出的颈子和外躬的烧箕背，臀部瘦得裤裆都塌下来……

（“从泥塑菩萨到参加《收租院》创作”姜全贵，《美术》1965年第5期）



“凶恶的狗腿子”《收租院》第一部分“交

将欺骗融入泥土之中

怎么才能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呢？只有“创造”出黑暗的“旧社会”，通过描绘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刘文彩的凶恶残暴才能达到。这也就要求《收租院》必须描写出“黑暗”的现实，连外国人观看了展览之后都止不住的叫“黑”那才行。澳大利亚《前锋》报记者罗素夫人一边观看《收租院》一边大叫“黑暗！黑暗！”

“创作”是非常成功的。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式，创作者们把能够挑动起人们愤怒情感的因素都注入到创作的对象中去了：虚伪、傲慢、歹毒、狡诈、霸道、欺凌的形象自然都赋予给了刘文彩及其打手；贫穷、悲苦、饥饿、可怜、无奈、痛恨、抗争的因素当然非劳动人民莫属了。再加上具体的情节：有儿媳被折磨死的；有欠了几斗租子却被逼用孙女作抵押的……加上人物那逼真的表情，一下子就把人带进创作者们所描述的社会场景中去了。

这样的“艺术创作”和中共的政治要求非常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看了《收租院》，人们就形象的知道了什么叫作阶级压迫和阶级感情；提起阶级斗争，人们就自然的联想起《收租院》里所描述的场景。至于虚构的事实，没有人去较这个真，当时谁敢去较这个真？

摘自《收租院》的骗人本质——将欺骗融入泥土之中

作者：沧海【正见网2010年01月13日】

第七章

惊天动地《收租院》

1965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惊天动地。

同一年，泥塑《收租院》诞生，同样惊天动地，它被喻为“震惊世界的中国美术界原子弹”。

这颗“美术原子弹”的杀伤力是否也惊天动地？它是否也会吞噬无数人的血肉生命？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中国美术界的原子弹”

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的泥塑《收租院》刚一诞生，惊天动地，产生了如同同时代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般的效果（它曾被喻为“震惊世界的中国美术界原子弹”）。

1965年底，《收租院》首次进京展出，盛况空前。每天，近一万人涌入展厅……

在1979年的中国第四届文代会上，《收租院》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起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大优秀美术作品”。

众多的宣传媒体、亿万的参观民众，配合强大的国家机器，山呼海啸，将“原子弹”的巨大冲击波发挥到极致。

当年的一些创作人员，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一旦提及当年的轰动与成就，仍然是自满与自豪。

的确，在所有“揭露‘旧社会’罪恶、展示地主阶级凶残、表现穷苦农民悲苦”的阶级斗争作品中，《收租院》力压群芳，傲立鸡群。

从1950年土改运动抹黑（兼残杀）地主，到1965年《收租院》攀登丑画地主的“艺术高峰”，十多年时间，无数文学家艺术家们紧密配合中共当局的政治需求，终于成功地将地主彻底妖魔化。

被妖魔化后的地主，激起民众万丈怒火。仇恨，像燎原烈火，在亿万民众（尤其是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少年）心中熊熊燃烧！

只差一个“渲泻口”——一个火山爆发式的“渲泻口”。

它来了！19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

它距泥塑《收租院》的横空出世和记录片《收租院》的响彻云霄只有几个月时间。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中华大地上，又一场暴风骤雨兼腥风血雨开始了。

“横扫”首先拿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开刀祭旗。

而地主和其子女们首当其冲。

“红八月”

1966年8月，“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八月”。

“红八月”从8月1号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开始，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后，“红八月”血腥残暴被推向高峰。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给他献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宋彬彬说了“要武嘛”，于是宋彬彬把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宋要武”这个名字变成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刺激、引发了大规模的打人杀人事件。

“伟大领袖”给饱受了《收租院》这类阶级斗争教育的红卫兵们打开了一个渲泻仇恨的口子，积压的怒火惊天动地爆发，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笔。

北京市1772名有名有姓的人在“红八月”中被打死，他们绝大多数是“阶级敌人”——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及其亲属子女。

（“黑五类”指“地、富、反、坏、右”五类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

“你他妈生下来就是罪过！”

—— 一个渲泻仇恨的真实故事

（原载《青春的浩劫》第65-66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在8.18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大会后，首先在北京发起了抄家，毒打“黑五类”、把他们扫地出门的狂热运动。

北京站广场候车厅站台上，出现了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一幕。

一个面目清秀、身材苗条的女红卫兵，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握一条巴掌宽的武装皮带，横眉怒目。她发出嘶哑的女高音，怒斥、驱赶着一个个“罪犯”。

这时，约有二十多名红卫兵，押送着一家老小四人走来。两个老人，男的光头，蓝制服的左上角缝了一块黑布，上面四个白色的字：地主分子；女的被剃了阴阳头，一侧是长发，另一侧是光秃秃的头皮。老太太左胸前的标记是：地主婆。两人显然挨过打，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走路一瘸一拐。老人后面跟着一位青年妇女，三十来岁，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

老太太不知脚下绊了什么，突然一个趔趄扑倒在地。她身后的妇女忙松手

放开孩子，赶上前去搀扶。

“滚起来！”

“快走！”

老太太坐在地上没动。那青年妇女弯下腰一面搀扶，一面问：“妈，怎么了？”

两个人低声细语，动作迟缓。押送人员不耐烦了，一人大叫：“走不动就爬，别想赖在北京！”一个红卫兵走上前，一脚踹在老太太后背，老人一下倒在地上。女儿赶紧俯身去搀母亲。那只脚又踹在青年妇女的腰上。“狗崽子，不许扶，让老妖婆爬出北京！”妇女一声不吭，从地上爬起来，又去搀扶倒在地上的母亲。那老头站在一旁，双手紧紧搂着四、五岁的孩子浑身发抖。孩子吓呆了，半张着嘴惊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老太太的“耍赖”与女儿的无言激怒了横扫一切的红卫兵，他们围着两个女人一阵暴打。老头哆哆嗦嗦跪在地上哀求：“别打了，要打就打我吧。她们没有罪呀，都是我的罪过。打我吧！饶了她们吧。”

老人的哀求反而招来一阵拳打脚踢。他也被打倒在地。他一面承受着拳脚，一面哀求：“不要打孩子呀，孩子没有罪，他才四岁！”

然而孩子没有躲过这一劫。虽然他仅仅四岁，但他生在了一个有罪的地主家庭。据宣传，他的爷爷（或姥爷）曾残酷地剥削压榨过穷人；于是，四岁的他也要为他的家庭出身承担罪责。

母亲听到孩子的哭叫，从皮带、拳脚下一跃而起，像一头困兽，披头散发，冲出围打她的人群。这突然举动让打手们一怔，他们以为她要拼命。然而她没有扑向围猎她的猎手，而是扑向自己的孩子。

她坐在地上，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哭喊：“妈妈，我怕……”母亲的眼里第一次涌出泪水，泪水冲刷着她脸上的血迹和泥污。她把脸紧紧贴在孩子的脸上，仍然一声不吭，头也不抬，仿佛是在荒无人烟的旷野。

短暂的沉寂。

眉清目秀的苗条少女首先清醒过来，她大叫一声：“狗崽子！”冲到地上的母子面前。

她双手抓住孩子，一把将他从母亲怀中拖出，高高举过头顶，大叫：“你他妈生下来就是罪过！”

随着喊叫，孩子被头朝下摔到坚硬的水泥地上。

母亲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景象。她爬到血泊中的孩子身旁，看一眼孩子，然后像一头母狼，猛地从地上跃起，扑向清秀苗条的红卫兵少女……



坐“水牢”的冷月英（冷妈妈）在全国各地作控诉地主罪恶的演讲。

她拿着一万余字的诉苦稿，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尽管发言稿不是她所写，但她却背得滚瓜烂熟。一登上讲台，她就像演员一样马上进入角色，声泪俱下地开始控诉。台上，冷妈妈哭得肝肠寸断，台下，众听众哭得东倒西歪。她走到哪里，哪里就吼声如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惊天动地。

第一次听控诉大地主刘文彩万恶罪行的报告

转自“飘在梦中的雨”博文（2011年8月8日）

<http://blog.sina.com.cn/piaoyu5566>

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那次报告，总是飘飘浮在我的眼帘，给我当时还可以说幼小的心灵铭刻了难忘的记忆，是风，是雨。

那是1974年夏季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在团部大礼堂听大邑县政协委员冷月英控诉大地主刘文彩万恶罪行的报告。夏天炎热，气温达到38度，我们穿着的确良军装，扎着武装带，背着两颗手榴弹，扛着63式自动步枪跑步到礼堂……

上午九点半，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中开始，主席台上的大标语格外醒目：“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团领导穿着军装整齐地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中间坐着一个白发女同志，后来一听介绍，真还吓了一跳，她就是纪录片《收租院》里坐过水牢的冷月英！

她一上台就开始声音洪亮地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她特别说到因为交不起租

子，被万恶的大地主刘文彩派丁抓起来严刑拷打后丢进水牢，那可真叫暗无天日，没有吃喝，没有灯光，下半身浸泡在漆黑的脏水里，栏杆上都有倒刺，站在水里根本不能够动，真的可以形容是生不欲死。可以想象，冷月英站在水里遥望着天上的月亮思念着家人，可见大地主刘文彩对待穷人的狠，真可谓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

冷月英的控诉可以说是字字泣血，句句含泪。我们听到激动处，忍不住振臂高呼，打到万恶的地主阶级！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我们许多同志和台上的冷月英同志一起哭泣，台上台下哭声一片。说实话，那时候真的想提起枪枪毙刘文彩，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穷人报仇。我们连指导员更为激动，大声高呼，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报仇！要身在军营，胸怀全球！我们也跟着高呼，一瞬间仿佛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就是世界的主人，仿佛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

报告的最后，全体战士都站起来，振臂高呼。

很多年过去，那场景，那愤怒雄壮的口号声还在我耳边回响。三个字，忘不了。



听冷妈妈诉苦时（纪录片《收租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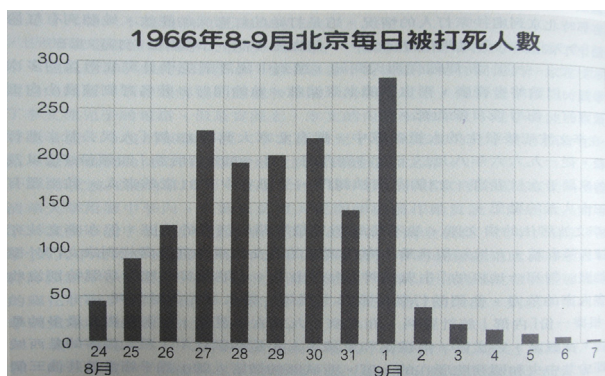
听冷妈妈诉苦时（纪录片《收租院》）

《收租院》激发了人们怒火中烧，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名义下，可以肆无忌惮地虐待、屠杀、侮辱地主反革命分子，类似《收租院》的新中国文艺经典作品所释放出的暴力能量，制造了一起起人间惨剧。（程美信）

“看了《收租院》展览后，真想把地主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当年观众留言



在“红八月”组建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掀起了斗打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狂热，他们在北京第六中学的后院建立了一个恐怖的劳改营，被抓进去的“黑五类”和其子女，要遭受“跪煤渣”、“上吊试验”、“火烧头发”、“刀剃屁股”、“开水洗澡”、“打鞭”、“突刺”等酷刑。“红色恐怖万岁”便是红卫兵纠察队员用“犯人”受刑时的鲜血书写在审讯室墙上的几个大字。



图表来自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



纪录片《收租院》中，听冷妈妈诉苦后。

“红八月”中，稚气未脱的“革命小将”们对无辜者大开杀戒。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全都是“万恶的阶级敌人”，死了活该！原因是这些孩子都是在《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半夜鸡叫》以及《收租院》雕塑等等“革命文艺作品”的教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

（摘自“《收租院》的前世今生”【阿波罗新闻网 2011-06-13】）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文彩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收租院》的播映。

1966年4月，该片在北京播出反响巨大，4月中旬，其电影拷贝在全国城市和农村发行。

文革结束后，《收租院》的故事并没有结束。纪录片《收租院》的解说词一直收在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中。

该纪录片解说词的作者陈汉元几十年后写了一篇文章“忆纪录片《收租院》的拍摄”。该文刊登在《百年潮》2009年第4期上，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忆纪录片《收租院》的拍摄（节选）

陈汉元

领导让我担任这部片子的编辑，实际上就是要我负责这部片子的思想和结构，并且写解说词。我当时一点也没有疑惑能不能拍好，只觉得党交给的任务，自己要想办法去完成。我觉得是党带领自己全家翻身得解放，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因为我家解放以前什么也没有，解放了，翻身了，分了土地了，连床也分来了，牛也分来了。毫无疑问，这是共产党给我的一切。所以，我必须跟着党走，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

《收租院》的解说词中有一些我至今认为是比较精彩的，比如“租债比山高，压断穷人腰，地主手里算盘响，佃户头上杀人刀……”；“四方土地都姓刘，千家万户血泪仇！”“斗啊斗，你是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吸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的肉。可你，你装不完地主的罪，你量不尽我们穷人的仇！”（解说词）经铁城、赵培两位情感丰富的播音员诵读，更添魅力，很快成为独立篇章，不胫而走，到处流传，被反复诵读，后来还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这是新中国纪录片解说词第一次被编进小学教材。《收租院》解说词作为电视解说词的代表，被收入小学教材。我自己觉得欣慰。它所表达的情感怎么样？在当时的背景下，应该说它是主流意识、主流情感，是一种大情感，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

（笔者记：这种煽起了疯狂仇恨从而导致了惨烈仇杀的“很重要的教育意义”，是不是我们民族遭受巨大不幸和巨大悲剧的根源之一？是不是导致了千千万万个无辜者惨遭不幸的重要原因？）

大兴县大屠杀事件

在北京市大兴县，“红八月”期间发生了对地主富农和其家属大开杀戒的“大兴屠杀事件”。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和（《中国“左”祸》文聿著，朝华出版社，1993年）

活生生把婴幼儿撕成两半——大兴大屠杀（节选）

作者：京论

《黑五类忆旧》第十四期

大兴县大辛庄公社的惨案发生在19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杀了100余口人，当地人称为831事件。过来人老韩回忆，大辛庄的杀人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的大队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上电线，人一出来就触电而亡，没有任何声响，顺利地将其全家杀害。老人和小孩儿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凶手向他们身上扬土，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不少，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黑五类”。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好几个大队，都把“黑五类”杀绝了。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16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塞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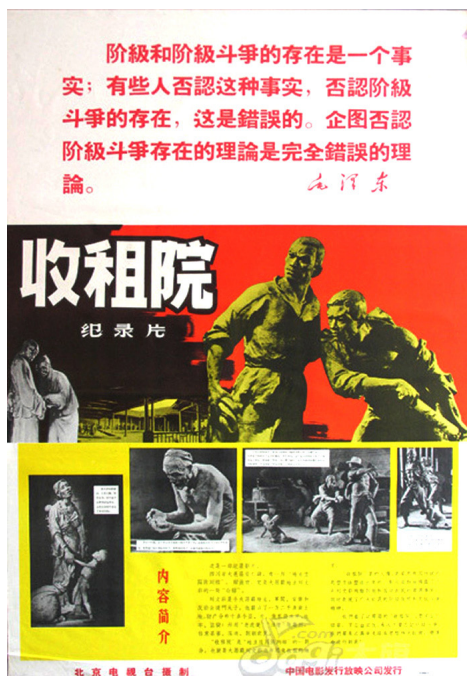
地主出身的韩宗信一家五口就惨死在那天晚上。韩家是中心大队人，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是中学生。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

村文明一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8月31日那天，大辛庄的黎明大队、红升大队、昕生大队和中心大队杀了106口人，最老的80多岁，最小的还不会走路。黎明杀了60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杀20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2个。

.....

在北臧公社新立村，赶车的把式装运尸首时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就把她藏在车辕底下。在车子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他过去把她劈成两半。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干了。



《收租院》创作的目的，不仅要让观众为过去苦难的农民流下同情的眼泪，而且要激发观众仇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的感情。

总的目的是暴露地主阶级的罪恶，而且要通过一个收租院和整个阶级整个旧社会联系起来。

（摘自“《收租院》泥塑创作的构思设计”，《收租院》泥塑创作组，《美术》1965年第6期）

大跃进是一场破天荒的吹牛运动，它能把粮食每亩产量从只有一千多斤而猛吹到十多万斤；而《地主庄园》《收租院》展览是彻头彻尾的造假运动，它能把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物打成罪恶滔天的罪魁祸首。可见吹牛是与说假话、篡改历史是连在一起的，这是在中共罪恶土壤上滋生起来的孪生事件。从“大跃进”到《地主庄园》《收租院》展览，为后来十年浩劫红色恐怖的文革运动拉开了序幕。

（朱忠康，《文革前夕血仇与谎言的造假运动》）

纪录片《收租院》的配曲《不忘阶级苦》

著名女高音曾新芳演唱

《不忘阶级苦》是一首在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歌曲。歌曲谱写得哀婉动人，女高音歌唱得声情并茂。

词曲悲苦，玉音绕梁，将地主的凶残和穷人的痛苦渲染得淋漓尽致。

纪录片《收租院》将它作为开篇配曲。

而视频片《不忘阶级苦》则将《收租院》作为它的背景画面。

《不忘阶级苦》 歌词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
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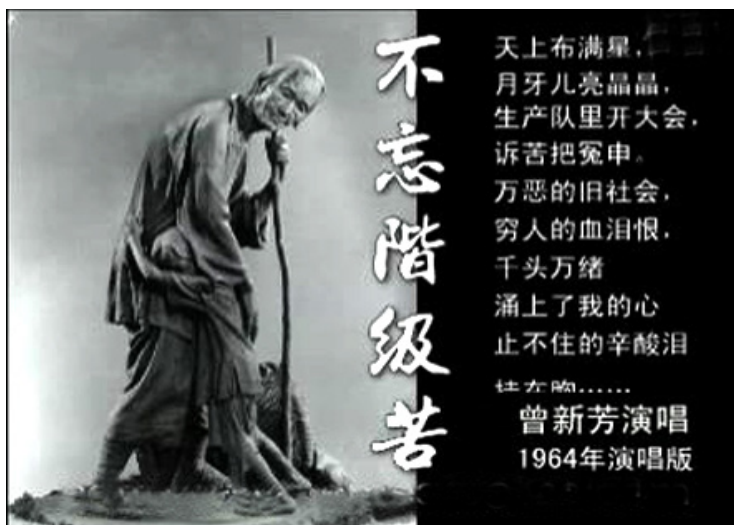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
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
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
地主逼债、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
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

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
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
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欠他的粮，
强盗狠心，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
可怜我这孤儿，漂流四方。

不忘那一年，苦难没有头，
走投无路入虎口，给地主去放牛，

半夜就起身，回来落日头，
地主鞭子，地主鞭子抽得我鲜血流，
可怜我这放牛娃，向谁呼救。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永远跟党闹革命，
不忘阶级苦啊，牢记血泪仇，
不忘阶级苦啊，牢记血泪仇。



泥塑《收租院》作为《不忘阶级苦》视频的背景画面



没有灵魂良知的艺术作品，在审美形式与技法表现的包装下，不仅能够欺骗世人的眼球，同时还是强权暴力的政治工具。（程美信）

几个真实的故事

周东浩

一个叫周东浩的军人写了一本叫《地主庄园沧桑录》的书，（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记录了几个真实的故事：

一：刘文彩“妹妹”泪流如注

她叫刘文英，江苏省某县农民。

文革中，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时，刘文英所在地尤为激烈。有人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恶主意：把本村农妇刘文英抓出来批斗，原因是她不仅与刘文彩“同姓同宗”，还与刘文彩同“辈”。因而强迫她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妹妹”。

一个冬日的傍晚，村干部早早在会议室里烧起大火，召拢全村群众，惟独不叫刘文英。全村商妥后，派了两个平时与刘文英关系较好的妇女敲开刘文英的家门，然后由躲在暗处的两名男子突然上前捆绑刘文英，押赴会场批斗。

刘文英当时已四十八岁，身体瘦弱。被当作“刘文彩的妹妹”批斗后，她惊恐不已，心口常常作痛，然而对她的批斗愈演愈烈，强迫她坦白交代剥削罪行。一次，几名男子拿出粗铁丝，捆住刘文英的两个大拇指，然后将刘文英吊起毒打。大半夜过去，刘文英的丈夫跪在地上乞求放下刘文英后，一看右肋骨断了三根，左脚小腿骨折，大拇指吊断一只。刘文英昏死在地达两个小时之久……

刘文英祖宗的祖宗都是本县人，只因1958年兴修水利时，刘文英家从另一个乡移民到了该乡，很多人都知道刘文英的来历，却无人出来作证！

二：刘文彩做媒留下的……

大邑县唐场乡有一张姓人家，父辈与刘文彩关系较好。张家唯一的儿子张某长大后，刘文彩做媒将安仁一位姓刘的姑娘嫁给了他。

解放后，随着刘文彩的名声越来越臭，张家人也越来越被人瞧不起。

“文革”一开始，村里便首先将已40多岁的张某揪出来游街批斗，原因当然是张某与刘某的结合乃是刘文彩做的媒。在一次批斗中，张某实在忍无可忍，

便问了一句：“我们犯了什么法？”愤怒的批斗者们听了这话，好似火上浇油，大骂张某“死不悔改”，随之将张家的房子拆毁，将张某的妻子一同绑来批斗。不久，张某病故，丢下其妻继续接受遥遥无期的“戴高帽子”批斗。

一次，张妻跪在台上接受“深揭猛批”时，突然想到丈夫已惨死，房屋又被拆，自己无依无靠，便忍不住伤心地放声大哭起来。有人便说她这是对批斗的一种反抗，于是，砍来酒杯粗的带刺木棍抽打她，一夜下来，张妻浑身血淋淋的动弹不得……（见该书第188页）

周东浩还写道，他后来去采访张妻，张妻已经木讷了，成天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干活。

《收租院》制造谎言所带来社会暴力，给许多无辜者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灾难。在艺术加工的故事背后，却又遮蔽着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真实悲剧，它们上演了新中国一场场的政治劫难。（程美信）



至今仍留庄国外墙上的标语（谭松2013年摄）

一位网友将他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泥塑收租院》发到网上：

《泥塑收租院》

妈妈搀着我的手，
往泥塑收租院里走。
我见有个女孩子，
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

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
可却长得非常瘦，
衣裤破烂赤着脚，
流干了眼泪哭干了喉。

她的妈妈交不起租，
地主逼她去做马牛，
女孩离不开妈妈呀，
她死死拉住妈妈的手……

我含着眼泪问妈妈：
“这事发生在啥时候？
这个女孩现在在哪里？
我一定要帮她去报仇！”

妈妈猛地攥紧我的手，
“这种事情旧社会里到处有，
妈妈过去也象她，
曾经有许多苦和仇。

阶级仇恨要记牢，
别忘了还有妈妈做马牛，
还有孩子搀不到妈妈的手。

听了妈妈的话，
我双手捏紧小拳头，
为砸烂世上的收租院，
红小兵要勇敢去战斗！



听冷妈妈诉苦时的儿童（纪录片《收租院》）

大邑县全体教师参观《收租院》
后在意见簿上题词：

“我们看了恶霸地主刘文彩残酷地剥削农民、屠杀农民的罪恶事迹，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们誓化愤怒为力量，教育好青年一代，为彻底消灭全世界的剥削阶级、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收租院》作为雕塑学文本，其历史内涵远远大于雕塑艺术本身。换句话说，《收租院》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历史和政治符号而非艺术符号……从整体来看，《收租院》传染给人的最强烈的情绪就是“仇恨”。……《收租院》最为巨大的影响正是在1965年和1966年这两年……以“仇恨”为特征的《收租院》，在氛围、心理及情感上是对文革的一种极其适时的支援。文革中从斗地主、斗黑帮、斗老师到派性斗争和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期间哪里不弥漫着仇恨的情绪？这难道只是与《收租院》的巧合？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说，“仇恨”是文革发动的最潜在但也最显效的心理能量。（孙波“回首再读《收租院》”，《读书》2000年第5期）



接受仇恨教育（网络图片）

公元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及周围数县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被杀者九千余人，官方称之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民间则叫它“乱杀风”和“杀人风”。一位被称为道县杀人事件“活化石”的人物，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控诉材料中写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而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则是在大量这样“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暮然回望，那些叫人泪流满面的事件，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情节，犹如天方夜谭，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就是那样切切实实地发生过……（《血的神话》前言，谭合成著，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1年）

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她当年正值豆蔻年华，是大队的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好心肠的婶娘。

土改时，姑娘家划的是贫农，他的伯父家划的是地主，土改后没两年，姑娘的父母相继死去，婶母收养了她，给了她母爱和一个温暖的家，使她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婶娘待她如亲生女儿，千方百计地满足她的要求，生怕对不起死去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其实婶娘的家境也难，特别是1961年丈夫得水肿病死后婶娘就更难了。但是，道县是一个有重视教育传统的县份，道县人家里只要揭得开锅，都会千方百计送子女去读书，婶娘家成分高，感觉自己的孩子读书没什么用，就没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书，而是节衣缩食送她去读书，使她能识文识字。

读书，使她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使她懂得了阶级门争的大道理。

姑娘在青山绿水中渐渐长大，长齐了一身鲜亮的羽毛，惹得远近的男崽们直流口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甚至有可能上大学！

但是，姑娘也痛苦地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外表看上去面慈心善的婶娘原来竟是一个万恶不赦的地主婆！自己这个实打实的贫下中农的女儿竟是喝狼奶长大的！这成了姑娘的一块心病。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有人说：“这婆娘心肠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不杀算了。”于是就决定不杀了。

但是，待到行动时，却见姑娘亲手将婶娘捆来了。大队民兵营长看见了，老远就喊：“搞错了，不是说了不杀你婶娘吗？”姑娘说：“没错！什么婶娘，阶级敌人！亲不亲，阶级分。农夫可怜毒蛇，结果被蛇咬死了。”她把婶娘推进要杀的人中间，押到地窖边上。

婶娘到此时还心存一丝希望，她回头望着手持马刀、面若冰霜的侄女问道：“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你说句实话。”

她满是泪水的老眼闪着难言的哀痛，像溺水的人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希望侄女想起这多年的养育之恩，放她一条生路。姑娘杏眼圆睁，（断）喝一声：“说什么亏欠不亏欠，今天老子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像削南瓜一样削了下来。

好大的手劲啊！婶娘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从死不瞑目的眼眶中迸出，溅落在窑边的青草上……

这不是杜撰的细节，本文中也没有杜撰的细节，只有无法杜撰的细节，一位向笔者讲述杀人情况的目击者叹息道：“造孽啊！那婆娘脑壳落了地，眼睛还不肯闭上，还在流眼泪！”

姑娘杀了婶娘之后，又参加了后来的杀人行动，亲手杀了六人。

……

后来，处遗工作组（注：即处理道县屠杀案遗留问题工作组）的同志进场以后，曾把她找回来问过情况，问起她到底为什么要杀婶娘，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反复地说：“我癫（疯）了，完全癫（疯）了！”

（《血的神话》第495-496页）

道县被杀的九千多人中，主要是四类分子。谭合成在调查中发现：“那些大量的、以大队为单位被集体屠杀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遗属们，敢于挺身而出喊冤叫屈的人物少之又少，其绝大多数连哼都不敢哼一声，更别说“乱说乱动”。（第26页）

附录一《道县文革中被杀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第370页）

在遇害总数4509人中，四类分子占1994人，其子女占2153人，两项共计4147人，占被杀人数的百分之91.97。

杀人手段有：一，枪打（1428人）；二，刀杀（1058人）；三，沉河（453人）；四，炸死（118人），五，投岩洞（203人）；六，活埋（384人）；七，棍棒打死（234人）；八，绳子勒死（68人）；九，火烧死（127人）；十，其它（486人）

附录二《道县（36个乡镇）文革杀人事件、时间统计表》

（第371-373页）

杀人时间，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

8月25日杀人350人（其中蚣坝公社沿河塘大队的四类分子被斩尽杀绝）

8月26日一天杀人638人

8月27日一天杀人590人

8月28日一天杀人501人

8月29日一天杀人452人

8月30日一天杀人273人

8月31日一天杀人176人

合计4509人

在1965年之后一年，中国就爆发发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文化大革命里，几百万人受到迫害，很多人因此丧生。《收租院》产生的目的，就是为共产党政权服务，为使共产党能够消灭任何不利于它们的族群。

（仲维光）

如果——

笔者记：文革爆发时我还太小，没来得及系统、全面地接受共产党和那些艺术家、文学家们的精心教育。如果我当年也精读了收在小学课本里的陈汉元“精彩的”《收租院》解说词、如果我也聆听了铁城、赵培两位“情感丰富魅力四射”的播音诵读、如果我也亲临了冷妈妈“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悲情演讲、如果我也观看了赵树桐、王官乙阶级斗争精品《收租院》泥塑、如果我也熟唱了曾新芳玉音绕梁的《不忘阶级苦》……. 我可能也会同那位女民兵一样，拿起屠刀，狼一样扑向同类和亲人——“我癫（疯）了，完全癫（疯）了。”



阶级斗争教育成功引爆了仇恨的“原子弹”，多少无辜的生命，在它惊天动地的威力下灰飞烟灭！

附录一：

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

[说明词]

在四川省大邑县的“地主庄园陈列馆”里有一个收租院。它是解放前大恶霸地主刘文彩强迫农民交租的地方。就在这个院子里，不知有多少农民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65年下半年，四川省一批美术工作者和民间艺人，在这里现场塑造了一百一十四个同真人一样大小的泥像。这些泥像深刻地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血腥压榨，表现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和反抗精神。

《收租院》泥塑群像的巨大成就，为雕塑艺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创造了生动的榜样。它是社会主义文化战线上的光辉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本片就是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实地拍摄而编制的。

[片头字幕：《收租院》]

[辽阔的川西平原]

在我们祖国四川成都市的西南，有一片土地肥沃、山河秀丽的好地方。

这里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社员在田间劳动]

学大寨精神，走大寨道路！这里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胸怀大志，你追我赶，决心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从前当奴隶，今天做主人。大邑县安仁公社副社长郑孟君，过去就是给地主当牛做马的丫头，是共产党解放了郑孟君，解放了千万个丫头、亿万个奴隶，是共产党让我们亿万贫下中农作了土地的主人，做了国家的主人！

[学生进行体育活动]

牢记过去苦，才知今日甜。我们——不管是老的一辈，还是新一代，都不能忘记今天的好日子是怎样斗争得来的，不要忘记千千万万农民在旧社会受过的苦难和压迫，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要紧紧握住印把子和枪杆子，让无产阶级的江山坚如磐石，万古长青。

[收租院内诉苦]

大邑县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冷月英，解放前，因为欠四川西部有名的恶霸地主刘文彩五斗二升租子，就被押在水牢里，整整七天七夜，害得她骨断筋折，家破人亡。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受过刘文彩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岂止一个冷月英、百个冷月英，还有我们成千上万个的受苦人！

[庄园]

这，就是刘文彩在大邑县安仁镇的一处罪恶庄园。

刘文彩是旧中国地主、军阀、官僚、土匪四位一体的穷凶极恶的代表。在千百万农民饥饿、贫困、死亡的基础上，他建立起了二十八个大庄园。

[室内]

他过着难以想象的糜烂生活。

他占有三妻四妾，他糟蹋了五六百个妇女。

他一个人每年抽大烟的费用折成大米，可供当时三千个农民吃一年！

为了做这张雕龙刻凤的床铺，他抢走了我们穷人几百担谷子！

这个手拿佛珠的野兽，利用权势掌握了大量的空白官契，随意把农民的好田霸为己有。他使尽种种毒辣手段，从一个投机倒把的商贩变成一个占有一万二千多亩土地的大地主。

[秤和斗]

刘文彩大斗大称进，小斗小称出。单凭大斗收租这一项，他每年就向农民多收了三千三百多担谷子。

[枪和镣铐]

他一手抓住印把子，一手抓住枪杆子，手下养着十多万打手和土匪，到处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谁不听从他的掠夺，谁就要惨遭毒手。

[血衣]

这，就是被刘文彩杀害的三个农民的血衣！

[佛堂]

这只吃人的野兽却常常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烧香拜佛，满口的仁义道德。

看吧！这就是豺狼的“善心”！这就是强盗的“道德”！

[水牢]

就在这座佛堂的背后，刘文彩私设了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水牢。

多少穷苦的农民，因为交不够租子，被关进水牢的铁笼子里，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就这样被活活地折磨死了。

地主剥削农民的手段无毒不有，最主要的还是搜刮地租。这里，就是刘文彩的收租院，农民的鬼门关！

[泥塑群像]

租债比山高，压断穷人腰，地主手里算盘响，佃户头上杀人刀！刘文彩霸占的土地遍布成都西南的十多个县，每到秋收季节，他就登报纸，出告示，强迫农民限期到这里来交租。

交租要过验租关、风谷关、过斗关、算账关。四道关一道更比一道难，多少庄稼汉在这里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的地主个个都是黑心的狼！在旧中国，我们千千万万贫下中农，哪一家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残害？！哪一户没有一部写不完的血泪史？！

[狗腿子和狗]

人们一跨进收租院，首先要受到这两条看家狗的监视。

[交租的农民]

四方土地都姓刘，千家万户血泪仇！穷苦的农民们忍着饥饿、扛着粮食来到这个人间地狱。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装满地主粮仓的都是我们穷人的血和汗；填满我们穷人胸膛的只有仇和恨！

[拄拐的老奶奶]

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奶奶，她知道自己一年的收成顶不了一年的租子，只好把唯一的一只老母鸡也拿来顶租债。

[拖儿带女的寡妇]

看看这个拖儿带女的寡妇吧！她们母子三人，一年到头吞糠咽菜，饿得死去活来。

背在背上的小女儿，再也吸不出娘的奶水，她已经不会哭不会动了。

[叫唤着的儿子]

孩子哪知娘的苦，“娘，我饿！我饿呀……”

[麻袋]

原指望这丁点粮食还能救救孩子的命，可狠毒的刘文彩连一粒谷子也不许她们留下，统统要拿来交租。

[验租]

刘文彩的地租本来就高得出奇，可是他还利用收租的机会，想方设法进行盘削榨取。

这是佃户要过的头道关——验租关

[狗腿子]

狗腿子看见谷子里有一根草，就一脚把这个老大爷踢倒。

[坐在扁担上的姑娘]

眼前多少不平事，这姑娘恨不能一扁担把这万恶的收租院打它个稀巴烂！

[风谷]

这是第二道关——风谷关。刘文彩特地在风谷机上装着滚珠飞轮，风力比一般的风谷机大上好几倍。一担上好的谷子经它一扇，就只剩下七八斗了。

[爷孙俩]

扇出来的全是些好谷子，小孙孙想包点回去。狗腿子一见，甩出钢鞭就打！

“这都是好谷子啊，你们不能这样不讲理！”

枪杆子、印把子都握在强盗手里，跟豺狼有什么理可讲！

[母女抬筐]

两筐谷子，经过前两道关就剩下一筐了。家里没米下锅，这里的租子又交不够数。娘愁儿愁，千家饥饿，万家忧愁！

[捧谷发愣的老汉]

血汗泡出来的谷子全被地主搜刮走了，老大爷的心里怎能不忿恨。

[过斗]

现在要过的是第三道关——过斗关。这里用的是大斗，刘文彩每年靠它多收的谷子，就能供当时七千三百五十个农民吃上一年。

[斗]

斗啊斗，你在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的肉；可你，你装不完地主的罪，你量不尽我们穷人的仇！

[数竹签的老汉]

交完租子，老大爷领到了几根竹签，他看了又看，数了又数。他心里在盘算，凭这几根竹签能不能过得去算账关。

[空箩筐]

过完斗，箩筐空了，麻袋空了，肚子空了，一年的辛苦全都落空了！

[算账]

验谷关、风谷关、过斗关三道关过去了，现在要过的最后一道——算账关，这也是多少农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一关！

[老大爷和儿子]

刘文彩硬说这家租子交的不够数，强迫这个老大爷的独生子去卖壮丁顶租债。

[刘文彩]

满腔仇恨向谁诉？！“刘文彩，狗强盗！你口口声声‘积德行善’，可为什么硬是逼得我走投无路？！”

[愤怒的农民]

记下这笔债，血债要用血来还！

[产妇]

刘文彩，这个六十多岁的大恶霸，每天要六个妇女来喂他奶。他借口顶租，硬逼这个产妇撒下刚出世的孩子去给他喂奶。

[老大爷和孙女]

这个双目失明的老大爷，全靠小孙女服侍他过日子，小孙女就是他的命根子啊！他们成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在地里不知撒下了多少血，流下了多少汗，可这血汗换来的不是糊口的粮食，却是一张卖身契！

“兹因无力交纳所欠刘总办地租三斗，愿将孙女抵押……”

“孩子啊孩子，不是爷爷忍心卖掉你，这都是黑心的地主硬逼的呀！”

满腔的苦水，满腔的仇恨！在苦水和仇恨里长大的孩子啊，永远也忘不了这世世代代的苦，祖祖辈辈的仇！

[母女三人]

爸爸给地主逼死了，妈妈又关进了监牢。

一只空箩筐，两个小姐妹，天真的孩子啊，她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刘文彩，你把我关进监牢，你逼得我骨肉分离，可你关不住我们穷人的阶级恨！关不住我们穷人的血泪仇！”

[狗腿子、兵痞抓人]

这又是一家人的生离死别！

[啼哭的女孩，呼唤的男孩]

谁不是爹妈的心头肉，谁没有自己的童年？旧社会，童年究竟给我们穷人的孩子带来了什么？除去受饥饿，只有斑斑血泪、血泪斑斑！

[老大爷、老大娘]

谁没有爷爷奶奶，谁不想有幸福的晚年？旧社会，晚年究竟给我们穷人的父老留下了什么？除去饿死、冻死，只有斑斑血泪、血泪斑斑！

[愤怒的农民]

有剥削、有压迫，就必然有革命、有反抗。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为了生存，为了子孙万代，我们要拿起武器，去找游击队，去找共产党！我们要消灭这吃人的地主阶级，摧毁这万恶的剥削制度！我们要打出自己的天下，建立人民的江山。

[冷月英继续讲话，群众哭、呼口号]

从水牢里出来的人们，以他们亲身经历的种种苦难，告诫我们老一代、新一代，都不能忘记过去！

[字幕]

牢记阶级仇！永做革命人！

撰稿 编辑：陈汉元

1966年6月

附录二：

《血红的土地》（节选）

谭松

此文为笔者写在“《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调查”一书中的文章。全文有两万多字，此处摘录其中关于论述“封建社会地主剥削压迫”部分。

中共的“土改理论”，欺骗天下的谎言

1922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苏共在会上指示中共，要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

智效民在《刘少奇与晋绥土改》一书中写道：“这次会议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解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军阀，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次会议是中共关注土地问题的开始，而后来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脱胎于此罢了。”

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中，是很难产生如阶级斗争、剥削压迫、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全人类等等一大套理论的，但有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有了苏共这个老师，有了祸害人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大地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就在所难免了。

中共借马列这个外来的幽灵，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游荡”，它石破天惊地诊断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中国有一个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前言中写道：“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使广大农民长期受地主阶级的残害、剥削和压迫，生活极端贫困和处于破产的境遇，这正是中国被侵略、被压迫、贫穷落后的根源……”

“反动的封建社会”、“残暴的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土地制度”、“地主剥削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消灭剥削压迫”……这些话语，既是中共讲了一辈子的“革命理论”，更是其拉大旗闹革命的“合法性”所在。

《中国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前言和绪论中说：从1921年算起到1953年为止，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为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奋斗了32年。终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而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这样，中共宣称他同中国历史上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造反不同——他站在一个道义高度——消灭剥削压迫，救民于水火。

这儿，姑且不论其“宣称”是否是其真实目的，只谈其“理论”的错误。

1，中国存在中共所说的那个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吗？

马克思以西方社会的发展为参考，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五种类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共照搬这种划分，说中国也经历了这五个阶段，为了同西方保持一致，秦至清的两千多年被称为“封建社会”。

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指出，这种划分法对中国而言“有名实不符、削足适履之弊。”（详见冯天瑜《“封建”考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所谓封建，就是分封建制（建藩），指国王把爵位和土地（包括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封赐给他的臣属。它由“宗主”或“领主”与“封臣”之间层层分封的金字塔形结构所组成。封臣又可以再往下分封，政权、土地逐级承包，形成大贵族——小贵族——骑士——农奴的封建结构。在这种封建关系中，封建领主既是贵族又是地主，在封邑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政治、经济和司法权。但这些赐封的土地只能继承不能买卖。封邑中的老百姓（农奴）没有土地所有权，不能自由迁徙，对封建领主有依附关系。贵族地主对他们则有随意处置的权力（甚至有“初夜权”）。在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如果国王侵犯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

中国从秦到清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封建制度”吗？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郡县制，从此以后，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一言九鼎，“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同西方完全不同，毫无“封建”可言。还有，中共常说的一个词是“封建专制”。其实，封建和专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在欧洲的社会发展中，恰好就是用专制来克服了封建（先是英国，后是德国）。“因此，把这两个合在一块说很滑稽。”（赵林，武汉大学哲学教授）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经济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冯天瑜教授提出，将先秦至清朝两千多年统称为“封建社会”“名”、“实”相离。因为，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土地可以买卖、转让，地主—自耕农经济占据主导；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覆盖全社会。冯教授说，中、西的根本差别在于西欧的土地不可买卖，而中国的土地则可以自由出售。因而“地主阶级不是封建产物”。（见“封建社会再认识” 武汉大学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14日）著名民国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在《我认识了共产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一书中说：“中国的情形（同西方）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说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

中共硬搬马克思的社会划分，发展出了一个错误的封建社会和荒谬的封建地主剥削理论。于是，从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再到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共都强调，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同封建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中共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便是要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2，农民与地主是这个“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吗？

抗战时期，毛泽东发表有关文章，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一书写道：“地主阶级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农民。在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奴隶式生活。他们曾被迫举行过大小数百次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见该书“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章）

这是又一个同划分“封建社会”一样荒谬的理论。

丁弘教授在《中国地主经济问题》一文中指出：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租赁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合同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封建关系。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在“地主有什么罪恶？”一文中说：“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并从中收取地租，这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正当的经营活动。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从中收取房租是一样的性质。

董时进在《共产党的封建和反封建》一文中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崩溃了，然而到现时中共却狂热地喊出一个‘反封建’的口号，把它当作他们革命的三大目的之一。这本来是等于无敌放矢，但是他们却创造出了

一些假想的敌人。他们第一号的封建标帜便插在地主和富农的头上。他们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的，可中国的土地制度与任何民主国家的土地制度没有区别，而且中国的土地是很零碎地分散在极多数的贫富不等的人们手中。”他指出：中国的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由买卖、自由租佃，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并愿意买地，同时又有人愿意卖地，就可以进行交易。买主有了土地以后，自己愿意耕种就耕种，自己不愿意耕种就租给别人经营，收取一定的租金或实物。这种租佃关系完全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任何人不能向对方提出强制性要求。因此，这种关系是一种正常的自由契约关系，而不是剥削被剥削关系。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度与其他物品的买卖、占有、租佃，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与所谓“封建”也完全没有关系。

中国以前自由买卖和出租土地，同现在自由买卖和出租房屋在性质上是相同的，现在是房产证，以前是田地契，都由政府收税盖章。以前出租土地也同现在出租房屋性质一样，哪里来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当然，地主群体中也有贪婪、残暴和为富不仁之人，但这占多大的比例？是不是这个阶层的主体？难道贫下中农、工人、商人、共产党人的群体中就没有这种人？

可是，中共编造了妖魔般的四大地主——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说他们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形像，或者说，地主个个都像这种妖魔。

还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由于“地主的剥削压迫”造成的吗？从陈胜吴广到黄巾起义，从黄巢造反到太平天国，几十次农民起义是因为土地制度不合理和地主剥削吗？

学者蒋祖权在《地主～历史的冤大头》一文中说：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暴动，没有一次是地主剥削直接导致的。没有一次是因为在土地问题上和地主的矛盾激化导致的。他说，中国农民运动的三大直接诱因是：1. 天灾、瘟疫导致衣食无着。2. 官府的横征暴敛，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3. 宗教组织的趁机煽动。蒋祖权强调：历史一再证明，最后激化矛盾导致农民暴动的导火索，是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官员的胡作非为！

谢幼田在《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中说：“许多农民暴动都有绅士参加，他们联合反对暴政，相依共存，指向政府，主要问题是政府官吏对老百姓的压迫问题，他们都是暴政的被压迫对象。”（第116页，明镜出版社，2010年）

还有，在中共划分的“二千年封建社会”里，地主犯法与农民一样要被告官受审，这原本是历史的常识，可是，中共非要说，地主比官府还利害，“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农民”。

（这种现象倒是在中共发动的血腥土改中出现了，只是对象被颠倒——笔

者在《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调查》一书中对此有大量记载。）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今天买了田地，成了地主（阶级），他便因此拥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农民”了吗？明天他因为种种原因把田地卖了，转而租地耕种，他便因此要“在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过着极端贫困的奴隶式生活”？还有，今天他因为挣钱买了几亩地，成了地主，于是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黑五类），明天他因为种种原因把地卖了，成了贫农，于是他就成了革命所依靠的好人（红五类）？如果今天有人对一个房东说，你因此拥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租户。”人们一定觉得他疯了。如果他对有房产的人说，你（因此）是一个坏人，对一个无房的人说，你（因此）是一个好人。人们也会觉得他疯了。

一个人拥有了土地，无论多少，也无论这个土地是怎么来的，便成了罪人，将土地出租，便被认定是剥削压迫，这就是中共的革命逻辑。

不幸的是，这种极其荒谬的“地主剥削压迫”“理论”，成为中共革命起家的“合法性”，更成为他们暴力镇压地主（包括其子女）的理由。

3，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制度”吗？

中共搞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说“革命理论”），那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手上，他们残酷地剥削农民，这便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极不合理”按中共的说法，体现在“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了极少数人手中。中共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协会议演讲中，都引用这两个百分比的“理论”作为“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根据和理由。

这个百分比，据说是“根据广泛调查和统计资料”的结果。农业经济专家董时进对这“两个百分比”提出质疑。他说：根据他研究农业问题三十多年的经验，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统计。他在《共区的土改与反土改》一文中说：这是完全凭空臆造。因为“这样的所谓‘广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在中国是绝对没有的。”原因是：这种调查是极其烦杂的工作，就连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容易做到。他在《中国土地分配状况一斑》中写道：中国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情形，从无普遍和精确的调查。比较规模稍大的抽查，当推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16省163县175万余户所举行的一次，兹示其结果如下：

每户所有亩数	户数百分率	亩数百分率
5亩以下	35.61	6.21
5亩至不满10亩	23.99	1.42
10亩至不满15亩	13.17	10.63
15至不满20亩	7.99	9.17
20至不满30亩	8.22	13.17
30至不满50亩	6.20	15.54
50至不满70亩	2.17	8.83
70至不满100亩	1.31	7.16
100至不满150亩	0.72	5.71
150至不满200亩	0.24	2.76
200至不满300亩	0.20	3.17
300至不满500亩	0.11	2.63
500至不满1000亩	0.05	2.30
1000亩以上	0.02	1.57

从此表可以看出，五十亩以下占了农户的95.18%，占了土地的66.14%；一百亩以下占了农户的98.66%，占了土地的82.13%。而一百亩以上只占了农户的1.34%，土地的17.87%，千亩以上之户数只占0.02%，其地面则只占土地的1.57%。

董时进说：“本表所示与共产党人所说的土地集中情形，迥乎不同。共产党不能亦不肯说出确实亩数，而只用一些‘地主’、‘富农’等空泛模糊的名词，以淆惑听闻。照此表，则一千亩以上者可勉称为大地主，即使将他们的土地全部分出来，亦何济于事。”

梁漱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方进行乡村调查，他指出，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下，有土地的人占多数。他写道：“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数人都有土地。……（郑平）全县90%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过有些人的地很少罢了。这情形正与河北定县——另一乡村工作地区——情形完全相似。定县则有《定县社会调查》一巨册，此中有关此问题之报告，据其报告，分别在不同之三个乡作调查：……结论如下：一，90%以上人家有地。二，无地者（包含不以耕种为业者）占10%。有一百亩以上者占2%，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51-152页，香港集成图书公司出版，1963年）

1980年代末期，几位学者在进行农村社会文化调查时，在浙江省北部找到了一些土改时期的宝贵资料，其中就有1951年5月村民张榜公布的各户田地占有

情况的原始表格。例如，在海宁县，土改前在全县范围内，有76%的土地分散在构成农村户数总数86.4%的中农和贫农手中，仅有11.6%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们调查的陈家场行政村，68%的土地分散在占总数83%的中农和贫农手中，而仅有1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曹绵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江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第25-2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这份真实的土地占有分布表格，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土改前中国的土地，并不是如中共所说的“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手上。”

《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说：“民国时期中国耕地若以14亿亩计算，人口以4.5亿人计算，那么人均拥有的耕地则为3.11亩……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与其他国家相比属于很低的一类。”（第10—11页）。作者列举了欧美南美等21个国家，其平均人均耕地为11.37亩。

本书（《血红的土地》）主要采写的是川东土改。那么，川东的地主平均有多少土地呢？《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在《解放初四川土地改革及其意义》一文中披露：“土改结束后，地主每人平均从14.59亩下降为1.47亩。”，这就是说，那些被说成“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下的“剥削阶级”——地主们，平均只有十几亩土地。而这个14.59亩的平均数，是全四川省的，川东地区大多是贫瘠山区，地主们的平均亩数，应当更低。

正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绝大多数地主们也没有多少地，于是，在划地主和分土地时就乱来，把拥有土地比该村平均数多一点的中农的土地也拿来分，成汉昌说：“例如在晋绥解放区老区，在被平分的土地总量中，40%是抽动中农的，河曲、保德、兴县三县抽动中农土地的比重45%以上，还有的地区竟有高达80%以上的。”（《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第607页）

中共在虚构了一个“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同时，又指出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

在中共造反闹革命时，中国的确存在着贫穷，也的确落后。但，这是由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残酷剥削”造成的吗？

《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一书说：“近代以来中国的耕地面积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相反还表现出了停滞式下降的趋势。从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中，中国人口增加了31%，而同一时期全国的耕地总面积仅增加了1%，从1893年到1933年的4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23%而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第11页）。

中国的人口，从秦汉到明清2000年间，增长了约20倍，其中从汉到明一千五六百年间，中国人口无大变化，历朝人口最多时只有五、六千万，中国人

口猛增始于清朝前期，前清近百年间，人口翻了一番多。乾隆五十年期间，再翻一番。以后45年间，又净增一个亿。

下面是我国古代几次重要的人口统计数字：

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59594978人。

754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52880488人。

1066年(宋仁宗治平三年)，2909万人(不包括边地政权人口)。

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5883万人。

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60692856人。

1741年(清高宗乾隆六年)，143411559人。

1790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301487115人。

1835年(清宣宗道光十五年)，401767053人。

(注，此数字来自笔者讲授《中外文化交流史》课程时借来的一本参考书，写此文时一时未找到该书。)

学者赵文林等在《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以研究的数字表明，在清代两百余年间，人口从明代的不足一亿猛增到四亿多(405.484，单位：百万)，激增的速度前所未有。

正是由于清朝人口猛增，导致了人均土地和人均口粮大减。吴慧先生对中国历代粮食产量进行了深入和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列出了两张表。其中一张表如下：

西汉末	人均原粮	993斤	成品粮	597斤
唐	人均原粮	1256斤	成品粮	665斤
宋	人均原粮	1159斤	成品粮	605斤
明	人均原粮	1118斤	成品粮	626斤
清中叶	人均原粮	628斤	成品粮	350斤

这张表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到清中叶，人均占有粮食数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人口迅猛增长。由于人口数量猛增，耕地面积的增加跟不上人口的增长，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农村危机的情势也越发明显了。

所以，成汉昌在《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说：“人口与耕地数量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及农业产量的减少，是造成中国近代农村危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18页)另外，他还指出，民国时期，农村的一个矛盾“主要是农

业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结果。”（第12页）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矛盾不是中共说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其贫穷落后的原因主要也在于此，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

综上所述，可以用董时进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

“共党基本理论的谬误，事实的虚假和共党的真实意图，这是共党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所在。”

